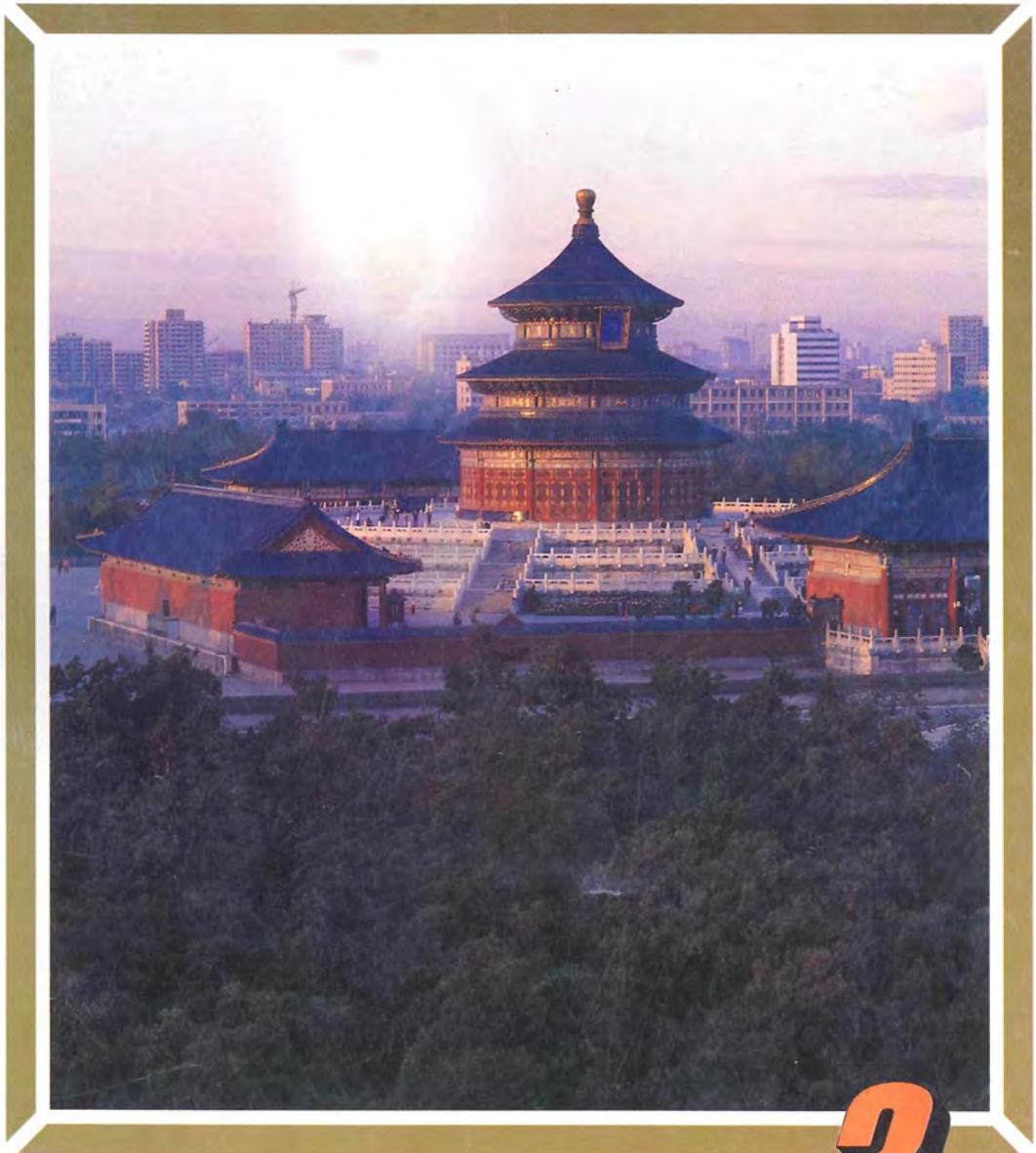


北京文博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1998 3

修复白塔寺山门



① 1998年3月21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陪同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视察白塔寺。

② 1998年元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陪同市委副书记李志坚视察白塔寺。



③ 1997年12月2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与西城区区委书记刘志华在腾退白塔寺文物建筑及用地交接文本上签字。



重建白塔寺风貌



④ 复建中的白塔寺山门。

⑤ 白塔寺副食商场下挖出的山门前台明，长12米。



⑥ 1996年维修白塔时发现明代修塔用的铁錡，长17cm宽2cm，厚0.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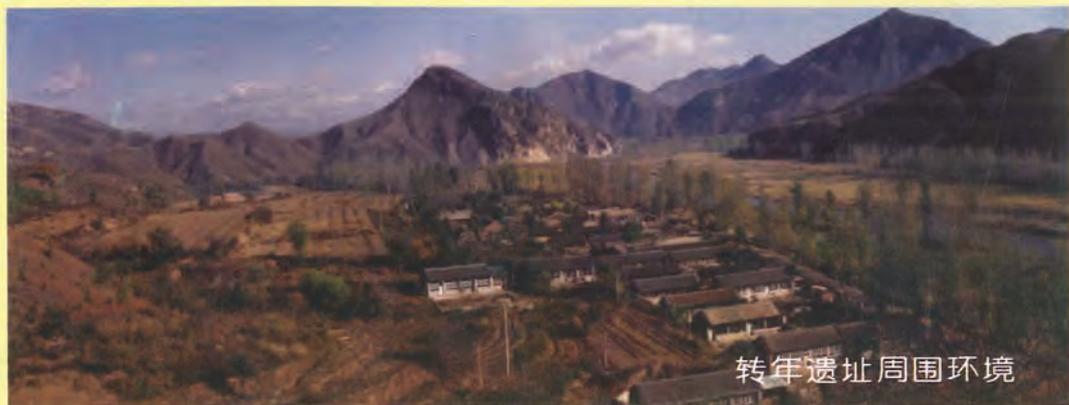
⑦ 复建中的白塔寺山门，倒座房和钟鼓楼。

(摄影：魏三纲)



(彩一)

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



转年遗址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1992年史前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第二级阶地上。调查时农民正在平整土地，文化层堆积已被推土机铲掉1-2米厚。从遗址断壁和考古钻探情况分析，遗址南北长140米，东西宽4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原文化层堆积厚3-4米，可分四层：第一层耕土层；第二层灰色土，包含少量商周时期的陶体；第三层黄色土；第四层灰黑色土，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考古人员在平整土地的地表，采集了大量石制品和几件夹粗砂陶片，并及时进行了抢救性试掘。为了进一步搞清转年遗址的文化内涵，1995年秋和1996年春考古队又进行了正式发掘。总共揭露面积500多平方米，获得了一批令人振奋的考古新材料。遗址以崭新的文化内涵，无声地告诉人们，这是目前华北北部山麓的沟谷盆地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早于兴隆洼文化、上宅文化，并早于中原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这无疑是北京地区自上宅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发现以来，史前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

初步统计遗址出土的文物遗物18000余件。它们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细石器有：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雕刻器和碎屑；磨制石器有：石斧、石磨棒、石

磨盘和石容器残片；陶器的种类简单，仅发现筒腹罐和孟等残片，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均，质地疏松，硬度较低，陶土中夹有大量石英颗粒，陶片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面粗糙，外表面经打磨，较为光滑，



△ 细石核



△ 细石叶

有很多陶片内外表面颜色不一，有的外表灰褐色，其内壁红褐色或褐色；有的外表褐色，其内壁黑色并有炭痕。陶器的纹饰，除个别口沿外施附加堆纹或凸钮装饰外，均为素面陶。从陶片断面观察，可看出片状贴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表现了早期陶器的特征。出土的石器中，以典型的细石器最引人注目，不仅制作精细，数量也较多，尤其是楔状型、锥状型细石核以及细石叶和圆头刮削器等，是具有中石器时代特征的典型细石器工艺传统。石磨棒和磨盘也具有早期石器的特征。小石斧和石容器多选用石质硬度较低的石料磨制而成。总之，转年遗址的文化面貌十分鲜明独特。

转年遗址是北京地区新发现的一种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该遗存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筒形罐是北方文化区的代表器物，而直腹平底陶盂的出土，又说明它与磁山文化有某种联系。尤其是与陶器共存的石容器和大量的典型细石器，在北京地区还是首次发现。虽然，发现时遗址已遭受较大破坏，但是发现后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并进行了科学发掘，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用一般发掘方法不能获得的资料，我们在发掘中选择重点探方采用了水洗法来提取微小遗物。因此，转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收获还是比较丰富的，为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增添了新的资料。

过去，在门头沟区清水河畔马兰阶级上，发现东胡林人墓葬，根据墓葬的出土层位以及人骨有轻度石化的一些特征，推测其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但缺少文化遗物，仅随葬一件螺壳项链、一件骨镯、两残蚌壳制品和几件打制石片。因此，北京地区到底有没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疑问。镇江营一期文化类型的发现，为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镇江营一期约两个C14年代一为距今 9040 ± 270 、另一个距今 8030 ± 180 年。前者偏高可能有误差，后者校正后达8800年以上，这说明镇江营一期文化类型的年代很可能在距今9000—8000年之间，证明北京地区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

文化遗存。

在这令人欣喜的时刻，转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又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该遗址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和夹砂陶，清晰地展示了早期文化的面貌。而丰富的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存，更是北京地区前所未见的，二者共存同一遗址，更加显示出它相当早的时代特征。转年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已测的两个C14年代数据，一个距今9200年，另一个距今9800余年，如果经过树轮校正以后，它们均达10000年左右。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圆头刮削器



△刮削器



△尖状器



△磨制石器



△石磨棒

遗存之一。

目前，华北地区与转年遗址年代相当的仅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一处经过发掘，但南庄头发现的石制品比较贫乏，陶片也为数不多，而转年遗址却有较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转年遗址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与陶器共存。这对解决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农业的产生及制陶术的发明，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石容器的出土，对于探索新石器时代是否有陶器与石容器的共存阶段，提供了新资料。在目前发表的资料中，只有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和迁西县东寨遗址出土过石容器，它们的年代比转年遗址要晚二千年以上，而且共存陶器已具有一定制作水平。初步观察转年遗址出土的陶片，有的陶片确能看到多层粘贴的痕迹。但有的陶片都看不出分层现象，而且有个别陶片夹的大砂粒几乎与陶片厚度相等，此种陶片不太可能采用泥片贴塑法，也无泥条盘筑的接合痕，这是否意味着转年遗址的陶器采用了“直接成形法”，还是有别的原始成

形方法，只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转年遗址没有发现明显的房址，但从地层堆积情况分析，这只能是古人类制造石器和生活的场所。大量石制品中石核、石片、石屑较多，成型石器较少，说明其有石器制造场的性质。与石制品分布相对集中在一起的木炭渣和陶器，尤其是有些陶器内壁残留的炭痕，又证明这里曾是人们生活的场所。

总之，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不仅对认识北京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探讨北方地区人类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制陶术的发明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和线索。（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平谷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怀柔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郁金城 李超荣 杨学林 李建华）



△陶盂



△陶罐底残片

北京文博



目 录

(1998年第3期)(总第十三期)

考古与文物

- 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 郝金城、李超荣(5)
尖首刀分期研究 王纪洁(17)

古都风貌

- 对历史文化街区管理保护问题的探讨 孔繁峙(27)

文物保护

- 金中都城水关遗址木结构腐朽检查和防治方案
..... 张厚培、范军、刘秀英、王平、籍和平(31)
严防内盗,保文物安全 郝东晨(37)

北京史地

- 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 黄春和(41)
尊孔、祭孔及北京国学孔庙 沈平(48)
府学胡同36号院谈往 刘之光(53)
谈《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和余燊昌 王晓静(57)

专题研究

- 白塔寺周围环境整治纪实 王辅宇(61)
略谈复建中的白塔寺 王春城(69)
漫谈《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 秋石(71)
妙应寺白塔与具六神通殿 伯祚(74)

博物馆学

- 读觉生寺《大钟歌》质疑
——浅析明“永乐大钟”成因 赵润华(77)
雍和宫藏传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主题和特色 黄崇文(82)

文物鉴赏

- 漫谈古代博局纹铜镜 程瑞秀(86)
溥心畲绘画艺术及鉴定 陶继红(93)

资料信息

-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十)
..... 孔繁云、王大成(96)
北京市文物局 1998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王辅宇(98)

封面、封底：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北京天坛(摄影：杜泽泉)

封二、彩插一：恢复白塔寺山门 重建白塔寺风貌

彩插二、三、四：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

封三：中埃友谊地久天长

——中国援建埃及工程开罗世界公园“中国园”落成记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李学勤、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梅宁华、廖静文、王世仁、曹子西、齐心、
马希桂、秦公

编委会委员：王丹江、王光镐、孔繁峙、刘建业、成大生、张宁、张展、陈平、陈旭、季华、荣大为、赵迅、赵其昌、
郑广荣、晋宏逵、徐明、韩永、葛英会、傅公钺

主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魏伯涛、张岩 美术编辑：张秀玲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BEIJING WEN 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1998

Contents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ew Achievements in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of the Beijing Area

..... by Yu Jincheng and Li Chaorong(5)

A Study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Pointed Knives by Wang Jijie(17)

VIEWS OF ANCIENT CITIES

A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Cultural Blocks

..... by Kong Fanshi(27)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A Plan for the Examin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ecay of Timber Structures on the Sites of Water Passes in the Middle Capital of the Jin Dynasty

..... by Zhang Houpei *et al.* (31)

Safeguard Cultural Relics Against Internal Thieves by Hao Dongchen(37)

BEIJ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A Complementary Study of Master Tongli's Deeds in the Light of the "Notes on the Avalokitesvara Hall of the Yanfu Temple at the Lianhua Valley, Da' an Mountain" from the Liao Period

..... by Huang Chunhe (41)

Reverence for Confucius, Sacrifice to Him and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Confucius Temple in Beijing

..... by Shen Ping (48)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 36 Compound in Fuxue Lane

..... by Liu Zhiguang(53)

Yu Qichang and the Stone Inscription "Notes of the Yu Ancestral Temple in Beijing"

..... by Wang Xiaojing(57)

MONOGRAPHIC STUDIES

Notes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

..... by Wang Fuyu (61)

- On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in Reconstruction*
 by Wang Chuncheng (69)
- On the "Exhibi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Iconography of
 Ten - Thousand Buddhas" by Qiu Shi (71)
-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and Juliushentong Hall in
 the Miaoying Temple by Bo Zuo(74)

MUSEOLOGY

- Queries on *The Song of Great Bell* of the Juesheng
 Temple: A Study into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the "Great Yongle Bell"
 by Zhao Runhua (77)
- Display Art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Gallery in the
 Yonghegong Lamaist Temple
 by Huang Chongwen (82)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On the TLV Pattern of Ancient Bronze Mirrors as a
 Chessboard Design by Cheng Ruixiu(86)
- Pu Xinyu's Painting Ar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
 Works by Tao Jihong (93)

DATA AND INFORMATION

- Catalogue of the Epitaph Rubbings from the Beijing
 Are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Informa-
 tion Center,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X)
 ... by Kong Fanyun and Wang Dacheng(96)
- Chronicl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Event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2nd Season, 1998)
 by Wang Fuyu(98)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u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 - chairmans:

Mei Ninghua, Liao Jin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Wang Danjiang, Wang
 Guanghao,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Ning,
 Zhang Zhan, Chen Ping,
 Chen Xu, Ji Hua, Rong
 Dawei, Zhao Xun, Zhao
 Qichang, Zheng Guan-
 grong, Jin Hongkui, Xu
 Ming, Han Yong,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 - in - 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
 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
 sue:** Chen Xiaosu, Wei Bo-
 tao, Zhang Yan

Art Editor: Zhang Xiuling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北京地区 旧石器考古 的新收获

————— 郁金城 李超荣 —————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时间最长的时期,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人类的体质,还是文化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火的使用,石器工艺的改进,骨角器的应用,艺术品的出现及意识形态的发展等,充分反映了人类从出现伊始,便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发展。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完整的历史。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尤其是上古史在世界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典型意义。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面目。北京作为当代中国的首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她特殊的地位。举世闻名的“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在周口店地区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北京人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之多,用火遗迹之丰富,石制品数量之大,哺乳动物化石种属之众,时至今日同时代遗址仍与其相比,而且在北京人遗

址的周围又发现了 20 多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其中包括 7 处旧石器文化遗址。^①由于周口店丰富的化石材料和文化遗存及大量的研究成果,1961 年 3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90 年代前多集中在周口店地区,但对其它区县的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开展得很少。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地区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分布,探索北京人时期及其后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 1990 年开始,对北京的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房山、石景山和海淀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初步调查表明:北京地区除周口店外也曾有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人类劳动、生息过,迄今为止已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旷野地点或遗址 38 处。(图一、表一)

部分遗址进行发掘,并对一些地点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使得人们对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有了新的和较广泛的认识,受到有关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现将近些年来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作一综述。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 1 处,即位于密云县北部山区上甸子乡的黄土梁地点。处

于潮河右岸的第三级阶地。已发现石制品 50 余件,其中 16 件出自地层,36 件采自地表,后者从原料、加工技术和类型分析,均与地层出土者一致,似可以认为它们是从地层中被侵蚀出来的,暂把它们和地层中出土者视为同时代制品。这些石制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10 件。这类标本的特点是人工痕迹少、多不连续、零星分布、其上或为断裂面或遗有碎屑疤,很难



图一、北京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把它们归入石核类,但不排除它们是打片不成功的石核。它们中最大的一件长 158、宽 140、厚 53 毫米,最小的一件长 45、宽 43、厚 20 毫米;8 件标本长度在 50 毫米以上。

(2) 石核单台面者 3 件,双台面者 9 件,天然台面的 2 件,打制台面的 10 件,其中 7 件采用交互打击法进行打片。石核的原料全为安山岩,主要以卵形砾石为素材,先向一面打击,用第一片疤作台面,再作反向打片,如此反向地进行打片。从其侧面观,成一曲折的脊,有时与交互的砍砸器颇难区分。因为它们无再加工痕迹,故将其定为双面石核。本类标本相当粗大,7 件石核的长度在 100 毫米以上(最大石核长 207、宽 106、厚 41 毫米),4 件石核的长度在 60—95 毫米间,在 60 毫米以下者只有 1 件,其石核长 41、宽 66、厚 22 毫米。石核的形态多不规则,仅一件较规整。这件标本呈柱形,由不同的两个台面打片。从石核上保留的砾石面较大,厚度颇大,石片痕不多等分析,石核利用率不高,产片率较低(图二:1—3)。

(3) 石片 19 件。天然台面者 4 件,素台面者 8 件,有疤台面者 7 件。石片上的打击点和打击泡比较清楚。因原料的质地不佳,其上的半锥体不清楚。石片形态较规整,呈梯形、三角形,但也有一些石片的背面保留有不同程度的砾石面。最大的一件长 172、宽 138、厚 18 毫米,最小的一件长 27、宽 43、厚 15 毫米,长度在 100 毫米以上者 2 件,50—90 毫米者 8 件;35—49 毫米 5 件,4 毫米以下者 4 件。从最大的 2 件石片分析,其上的打击点粗大而散漫,打击泡显凸,表明可能是用碰砧法生产的(图二:4—6),其余的石片应是用捶击法生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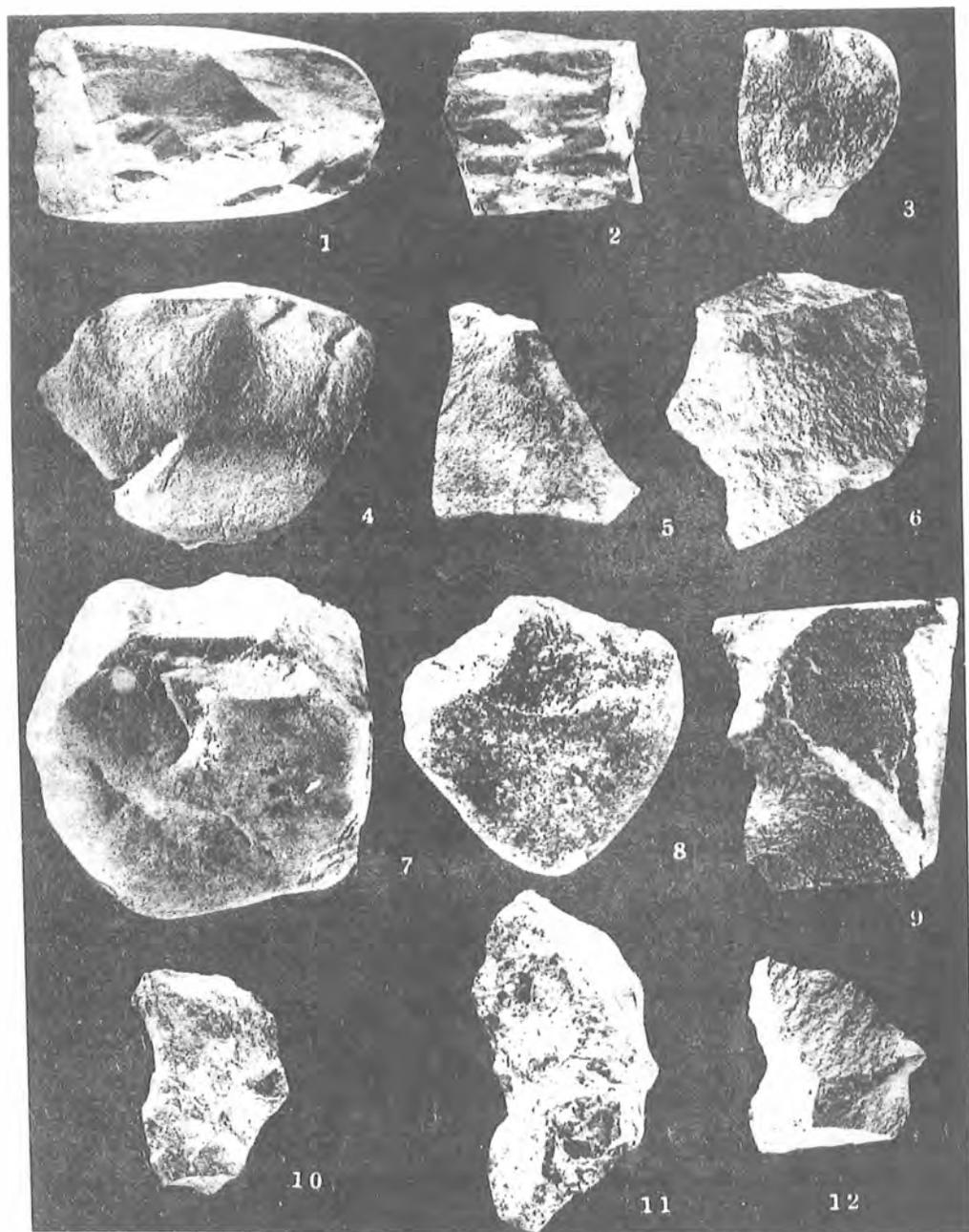
(4) 刮削器 4 件。单凹刃 3 件(图二:9—12),单凸刃 1 件。素材全为石片,石器加工方式有向背面向腹面加工者各 2 件,修理工作多粗糙简单。最大的刮削器长 88、宽 80、厚 30 毫米,最小的长 50、宽 34、厚 26 毫米。

(5) 砍砸器 5 件。均为单刃砍砸器。素材采用大小不等的砾石和石块。砍砸器都是锤击法修整成的。其加工方式均为向背面修理,加工比较粗糙。器身都保留有不同程度的砾石面。最大的 1 件石片长 178、宽 176、厚 71 毫米,最小的 1 件长 90、宽 58、厚 43 毫米,有 3 件标本的长度在 100 毫米以上(图二:7—8)。

根据地貌位置和所在的地层,依地质学家的意见暂时把这一地点的地质时代定为中更新世,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由于该地点发现的材料少,很难对其特点作准确的记述,但可归纳如下几点:1) 石制品的原料简单,质地欠佳,以安山岩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脉石英等。2) 打片采用锤击法,偶尔可能采用碰砧法,但产生石片形制规整的多。石核的利用率较低。3) 制作石器的素材,砍砸器用砾石和石块,刮削器则采用石片。4) 石器修整采用锤击法,加工方式以向背面为主,比较粗糙、简单。5) 石制品比较粗大,大多数标本长度在 60 毫米以上,在 40 毫米以下者数量极少,大体可以看到这个地点的石制品以大中型的为主。6) 与北京周边地区(包括河北、辽宁)已发现的旧石器比较,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者,石制品多是小件的,砍砸器的作用随时代而减弱。与周口店地区比,跟北京猿人文化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加工方式上,均以向背面加工为主。本地点未找到砸击石片,可能与地点类型不同和石制品原料供给差异有关,也可能与工作做的不够有关。从石制品以大、中型为特点的方面考虑,则与北京猿人文化早期者更接近些^②,也与辽宁本溪庙后山的石制品^③有更多的比较点。由文化上的比较论之,石制品的研究结果支持该地点的考古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共发现 18 处。平谷县:马家坟;密云县:松树峪;怀柔县:



图二、密云黄土梁石制品

1-2 双台面石核
3 单台面石核
4 天然台面石片
5 素台面石片

6 有疤台面石片

7-8 砍砸器

9-12 单刃刮削器

(1, 4, 7 为 1/3. 2, 3, 9 为 1/2. 5, 6, 8, 10, 11, 12 为 2/3)

帽山、四道穴、西府营、七道河、长哨营、宝山寺、转年南梁和鸽子堂；延庆县：茶木沟、路家河、沙梁子、古家窑、辛栅子、三间房和河北村；门头沟区：王坪村。500余件石制品分别出自红石坎河、安达木河、汤河、白河、古城河和清水河的第二级阶地后缘。帽山、松树峪和宝山寺地点伴出有犀牛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碎片。比较丰富的遗址是马家坟、帽山、菜木沟和路家河等地点。

马家坟地点位于平谷县东部约21公里处，红石坎河右岸的第二级阶地，已找到石制品26件，其中出自地层19件，脱离层位7件。石制品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3类。石核3件，其中2件为单台面石核，1件为双台面石核。石片计18件，大多数是小型的，重量在5克以下的有8件，6—15克的有5件，16克以上的有5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重1054克，最小的一件仅1克。石片角大者为 123° ，小者为 96° ，一般在 101° — 122° 之间，18件石片分为天然台面、有脊台面、素台面、有疤台面、修理台面和缺失台面石片6类。石器计5件，均为刮削器，素材全为石片。其中单凹刃刮削器3件，单直刃1件和单凸刃1件。修整石器的方式主要是向背面加工（图三）。综观马家坟地点的石制品可归纳有以下性质：1）石制品的原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2）依石片分析，打片主要采用锤击法，偶尔使用砸击法。3）加工石器的素材均为石片，加工方式采用向背面和腹面两种。4）石器以小型的为主，长度一般在40毫米以下。马家坟遗址的时代从地层学分析，文化遗物出自红石坎河第二级阶地的褐黄色砂质粘土中，故该地点的地质时代可暂定为晚更新世的早一阶段，即考古学时代的旧石器时代中期^④。

帽山遗址位于怀柔县喇叭沟门乡帽山村小学西约100米处。石制品出自汤河第二级阶地的褐黄色土中。该地点发现文化遗物14件，4件出自地层，10件出自地表。其中石核5件、石片4件和石器5件。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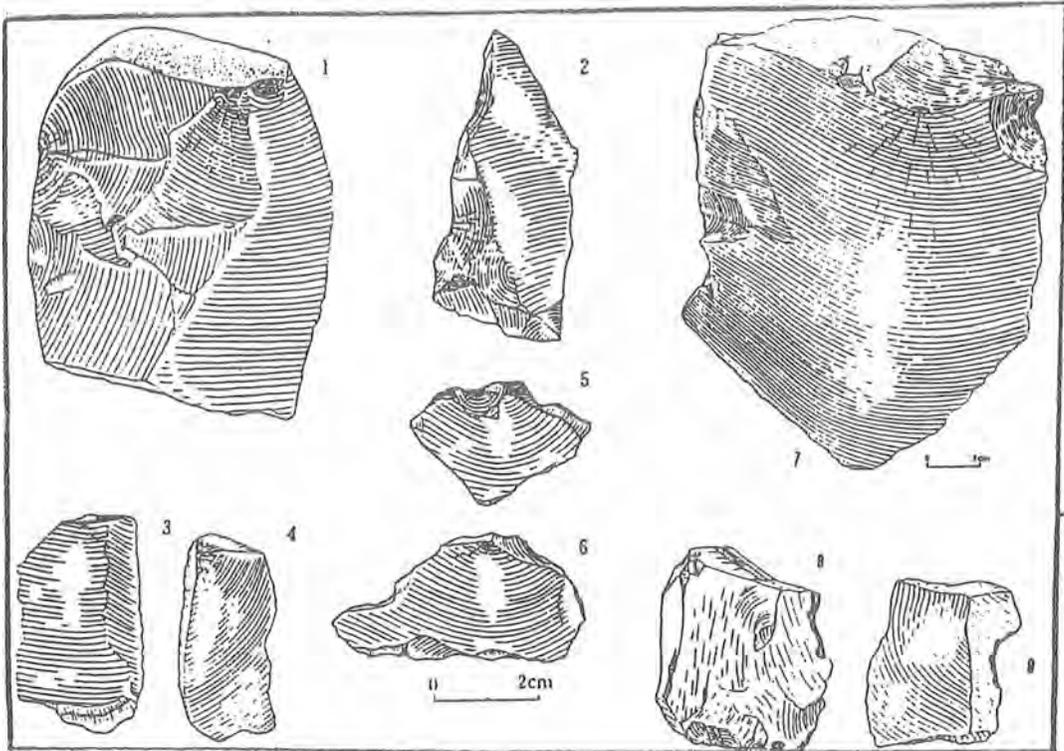
犀牛牙齿化石。石制品原料以安山岩为主。标本大多保留天然面。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图3）石核素材主要为砾石，打片台面全部为砾石面。石核上也都保留有不同的砾石面，由此看石核利用率比较低，依台面的数量分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两种。石片依台面情况分：天然台面、素台面和有疤台面三种。其中一件出自地层的石英岩素台面石片，长48、宽54、厚12毫米，腹面的半锥体和打击泡微凸。（图四：2）。另一件用大石片加工成的单刃砍砸器，长98、宽80、厚22毫米，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刃缘不平齐，呈弧形。还有一件单直刃刮削器，长65、宽57、厚17毫米，系用石片在其左侧靠近台面处由腹部向背面加工而成。

四道穴旧石器地点位于怀柔县喇叭沟门乡四道穴村西公路边。9件石制品采自汤河第二级阶地，其中2件出自黄土层，7件采自地表。石制品中石核和石片各4件、石器1件。

从帽山和四道穴地点的地貌、地层分析，其地质时代应属于晚更新世，这些旧石器地点的第四纪堆积物在厚度上虽有差异，但它们都出露在基本相同的高度，而且组成物质和层次划分类似，可以看作同一时代。晚更新统以黄土及下的砂质粘土及砂砾层为代表，帽山地点的石制品出自汤河第二级阶地的黄土和砂砾层，并出土犀牛化石。由此把上述地点划为晚更新世早期，即考古学年代旧石器时代中期。^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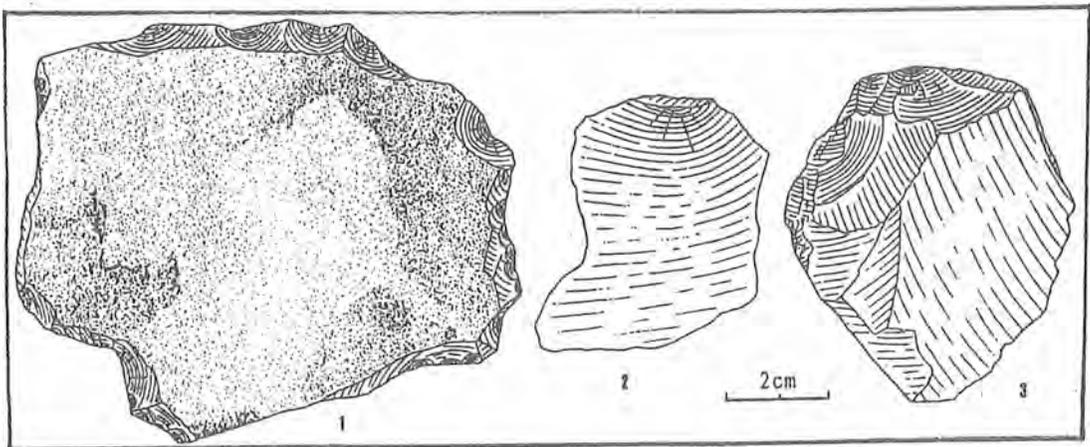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城区和郊区都有发现，共计19处。这些遗址包括平谷县的罗汉石、马家屯、上堡子、刘家沟、海子、洙水、小岭、豹峪、甘营、夏各庄和安固；密云县东智北；怀柔县杨树下和东帽湾；延庆县的佛峪口；门头沟区西胡林和齐家庄；西城区西单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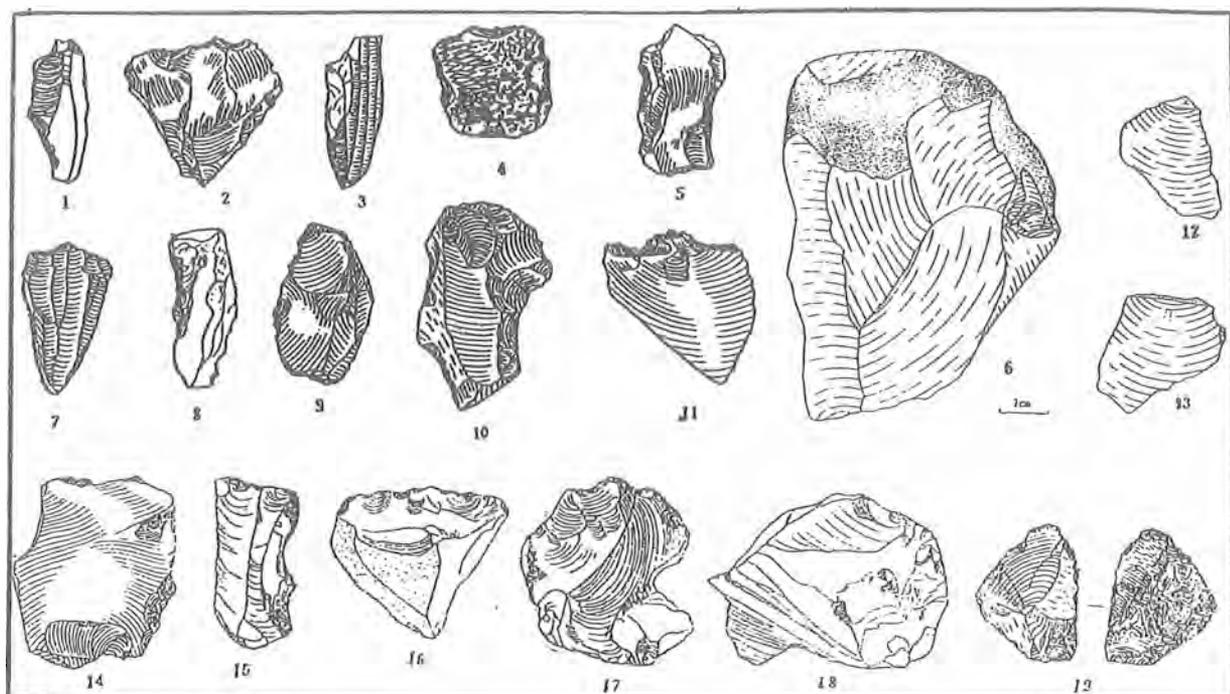
图三、平谷马家坟石制品

- 1 双台面石核 2 单凹刃刮削器 3 天然台面石片 4 素台面石片
5 单凸刃刮削器 6 有脊台面石片 7 修理台面石片 8-9 单凹刃刮削器



图四、怀柔帽山石制品

- 1 砍砸器 2 素台面石片 3 单直刃刮削器



图五、平谷县和门头沟区石制品

3、6、7、18:石核,12:天然台面石片,13:素台面石片,19:尖状器,其余为刮削器。

(1、8:甘营,2:洙水,3、5:马家屯,4:罗汉石,6:西胡林,7:小岭,9、10、19:

安固,11:海子,12、13:齐家庄,14:豹峪,15、16:夏各庄,17、18:刘家沟)

银大厦;东城区王府井的东方广场遗址。

平谷县 11 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共 82 件^⑥,其中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1 件,石核 11 件石片 41 件、刮削器 28 件。尖状器 1 件。这些石制品原料以黑色燧石为主,还有脉石英和石英岩。剥片技术主要采用锤击法,偶见间接法,第二步加工不排除采用压制技术的可能性。石器大多是小型器,一般尺寸在 30 毫米左右,而且石片较多,石器类型也比较简单,有的地点还存在着典型的细石核(图五)。

在门头沟区仅发现西胡林和齐家庄 2 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出土文化遗物有石核和石片等(图五)。

东城区王府井的东方广场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8 月,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东城区文物管理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

进行了遗址发掘和重要遗迹迁移保护工作。遗址位于东长安街北侧、东卓三条、王府井大街和东卓北大街之间的东方广场工地中心。遗址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在施工单位一建工集团大力配合下,揭露面积 780 平方米。出土标本近 2000 件,编号标本 1500 余件。其中石制品 700 多件,有石核、石片、石屑、石锤、石钻、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原料以燧石为主,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骨制品有骨核、骨片、骨器,有些骨片上有人工砸击和刻划的痕迹,还有些骨制品和石制品上附着赤铁矿粉。丰富的用火遗迹有烧骨、烧石、木炭和灰烬等。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鉴定有:牛、马、鹿、兔、鸵鸟等。经炭—14 测定的数据之一,遗址年代距今 24030 ± 350 年。依据已有的材料分析,它应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临时活动的营地。

遗址发掘出土的较丰富文化遗物和从地层中获得的各种信息,对深入开展遗址

的综合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距今 2 万多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发现于国家首都中心区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对研究北京市区的史前史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平原地区古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有意义的证据。从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类型看,它与北京猿人文化关系密切。丰富的用火遗迹的发现也是继山顶洞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对石器的初步研究表明,石制品都是小型的,主要是用锤击法生产的,偶尔用砸击法,石器以石片为素材,且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和以背面加工为主等。这表明北京从五·六十万年前到二万年前在文化上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在遗址中出土的骨器和人工刻划痕迹的骨片是继山顶洞发现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在华北地区亦不多见。它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器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四、几点认识

如上所述,自 1990 年以来,使我们对北京市范围内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有了一些新认识。

(1) 这些发现填补了中间区的准空白,提供了较丰富的古人类旷野类型遗址的信息。

北京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始于房山周口店,很长时间的的工作集中于此。该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3 地点,中期的第 3、4、15 和 22 地点,晚期的山顶洞人地点。^⑦进入 80 年代,在北京以东环渤海地区也有古人类劳动、生息、子孙繁衍的遗迹,在燕山南麓坡脚下发现了若干地点,如:河北迁安县的爪村^⑧、玉田县的孟家泉^⑨、滦县的东灰山和昌黎县的淳泗涧^⑩,再向东是辽宁的锦州市沈家台^⑪。古人类在北京西部的周口店绵延不断地劳动生息是早为人知的,但在 90 年代以前燕山前缘地区唯独北京市的有关旧石器时代古

人类活动信息知之甚少。通过我们近些年来来的工作,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石制品地点达 38 处,从而填补了从北京西侧到河北省东部的一小块空白区,并且初步看到了燕山南坡的旧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能有个别地点石制品与其两侧地区所发现者略有不同。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90 年代以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除朝阳双桥出土的古菱齿象下颌骨上有砍痕外^⑫,均为洞穴遗址,旷野遗址则没有发现过。经 90 年以来工作,如上述我们在山区河流阶地和平原地区发现旧石器早、中、晚期的旷野遗址 38 处。从已发现的材料看,地点比较多,而发现的石器数量并不多,但也有个别地点例外。每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不多,可能是旷野遗址类型特点的反映,它们多是临时性活动场所,流动性大,与久居的洞穴遗址形成了明显的差别。黄土梁地点的石制品个体多粗大,似与众不同。这个差异与其把它看作一个区域文化类型,不如把它看作是与人活动有关,符合旷野活动的特点。

(2) 增加了旧石器时代承上启下的新材料

从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来看,过去该区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研究工作薄弱,只限于周口店的 15、22、4、3 地点,虽已积累了一些材料,现新发现旧石器中期旷野遗址 18 处。虽然材料不多,但大体可以看出,旧石器工艺基本上继承早期石器工艺的技术,与周口店地区已属于旧石器中期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周口店地区外,发现的 18 个地点的文化的一般性质可归纳如下:制作石器的原料以安山岩为主,另外还有脉石英、石英砂岩和燧石等,打片技术采用锤击法,偶尔也可能使用砧砧法;加工石器的素材主要为石片,这是以石片工业为主的工业;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比较精细,且以向背面

黄土梁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



马家坟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



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



加工为主。以上这些特点除原料受地区限制之外,其余特点都可以从北京猿人的石制品中找到可对比的资料。与周口店第15地点等的石制品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我们未发现砸击制品,实际上周口店第15和第4地点的石制品中砸击产品极少,砸击技术明显衰落。诚然,在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制品中无砸击制品,既可能与遗址类型有关,也可能与工作做的不够深有关,故它的有无尚不能看成文化上的重要差别。

(3) 文化的延续和文化的交流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部分地区克服了原料质劣的影响,加工出精美的石器。细石器工业出现后,逐步改变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石器工业的格局。文化交流加快了石片石器工业进一步的改变,促进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北方大体存在着三种较重要的工业:第一种,以小石器为代表的工业。第二种,细石器工业。第三种,细石器与小石器共存的工业。^①在环渤海地区的燕山南坡此时存在着这三种工业。第一种工业类型如山顶洞的石制品及河北迁安村的石器。第二种工业类型如河北昌黎县停泗涧地点,该地点发现细石核和细石叶,石器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和雕刻器次之,石器小,加工精细。第三种类型可以河北玉田孟家泉和滦县的东灰山地点为代表,在其组合中存在大量的小型石制品,但也包含少量的细石器工业制品。北京地区新发现的石制品说明,该区已知的有两种石器工业:17处工业可能属于第一种工业类型——小石器为主的工业;平谷的马家屯和小岭2处石器地点可归于第三种工业类型——细石器和小石器工业。这或许说明两种工业存在文化交流。以小石器为主的工业在北京地区分布广泛,应是主要工业。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文化和迁安瓜村的石制品组合,无论从打片技术、加工方式、石器类型和大小

都非常接近,反映出文化上的密切关系^②。如在山顶洞、峙峪、迁安瓜村和东方广场均发现有砸击制品,在山顶洞、峙峪和东方广场出土有人工刻划痕迹的骨片和骨器,在东方广场和山顶洞发现有赤铁矿粉。

(4) 为探讨北京地区古人类生活环境与经济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

古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古生态环境。自然环境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影响和制约着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从38处地点发现的文化遗物的研究,大多数无冲磨和风化的痕迹,由此似可认为大多数标本是原地较快埋藏。目前大多数石器地点发现的标本比较少,可以推测它们可能是古人类临时性的宿营地和活动场所。当时的人类活动在河岸和丘陵地区,并在附近制作生产工具,进行采集和狩猎,短期停留后离去。

北京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展工作,利用新的方法,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①张森水《周口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周口店精神》《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

②斐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辽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庙后山——辽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李超荣 郁金城《北京平谷县首次发现旧石器》《文物春秋》1994年第4期。

⑤李超荣 郁金城《北京怀柔发现的旧石器》《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

⑥郁金城 李超荣《北京地区旧石器的新发现》《北京文物与考古》1992年第三辑。

⑦吴汝康 吴新智 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⑧张森水《河北迁安县瓜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⑩河北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昌黎涿酒细石器地点》《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⑪张镇洪《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9卷2期。

⑫黄万波《记北京双桥古菱齿象下颌骨上的

砍痕现象》《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2期。

⑬张森水《环渤海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⑭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表一 北京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一览

序号	地点名称	地理位置	发现时间	材 料 摘 要	时代
1	马家坟	平谷靠山集乡	1990年	石制品26件(19件地层,7件地表),其中石核3件,石片18件,刮削器5件	中期
2	罗汉石	平谷靠山集乡	1990年	石核2件,石片5件,刮削器3件(地表)	晚期
3	马家屯	平谷韩庄乡	1990年	石核2件,石片12件,刮削器6件(地表)	晚期
4	上堡子	平谷靠山集乡	1991年	石核1件,刮削器1件(地表)	晚期
5	刘家沟	平谷靠山集乡	1991年	石核1件,刮削器1件(地表)	晚期
6	海子	平谷韩庄乡	1991年	石片4件,刮削器1件(地表)	晚期
7	洙水	平谷韩庄乡	1991年	石片1件,刮削器1件(地表)	晚期
8	小岭	平谷南独乐河镇	1991年	石核1件(地表)	晚期
9	豹峪	平谷南独乐河镇	1991年	石核1件,石片3件,刮削器2件(地表)	晚期
10	甘营	平谷南独乐河镇	1991年	石片3件,刮削器4件(地表)	晚期
11	夏各庄	平谷夏各庄乡	1991年	石核1件,石片1件,刮削器3件,具有人工痕迹小石块1件	晚期
12	安固	平谷夏各庄乡	1991年	石核1件,石片2件,刮削器6件,尖状器1件(地表)	晚期
13	黄土梁	密云上甸子乡	1990年	石制品50余件(16件地层,34件地表),其中石核24件,石片19件,刮削器4件,砍砸器5件,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10件	早期
14	松树峪	密云太师屯镇	1990年	石制品5件(1件地层,4件地表)	中期
15	东智北	密云溪翁庄镇	1990年	石制品22件(8件地层,14件地表)	晚期
16	帽山	怀柔喇叭沟门乡	1991年	石制品14件(4件地层,10件地表),其中石核5件,石片4件,刮削器1件,砍砸器4件;犀牛牙齿化石1枚	中期
17	四道穴	怀柔喇叭沟门乡	1991年	石制品9件(2件地层,7件地表),其中石核1件,石片4件,刮削器1件	中期

18	西府营	怀柔叭沟门乡	1991年	石制品 12 件(4 件地层, 8 件地表), 其中石核 4 件, 石片 9 件, 刮削器 1 件, 砍砸器 1 件	中期
19	长哨营	怀柔长哨营乡	1991年	石制品 6 件(5 件地层, 1 件地表), 其中石片 4 件, 砍砸器 1 件, 石核 1 件	中期
20	七道河	怀柔七道河乡	1991年	石制品 7 件(地表)	中期
21	宝山寺	怀柔宝山寺乡	1992年	石制品 3 件(1 件地层, 2 件地表)	中期
22	转年南梁	怀柔宝山寺乡	1996年	石制品 4 件(地表)	中期
23	鸽子堂	怀柔宝山寺乡	1996年	石制品 1 件(地表)	中期
24	杨树下	怀柔宝山寺乡	1996年	石制品 3 件(地表)	晚期
25	东帽湾	怀柔汤河口镇	1996年	石制品 1 件(地表)	晚期
26	菜木沟	延庆沙梁子乡	1992年	石制品 387 件(260 件地层, 127 件地表)	中期
27	路家河	延庆靳家堡乡	1992年	石制品 27 件(11 件地层, 16 件地表)	中期
28	沙梁子	延庆沙梁子乡	1992年	石制品 12 件(5 件地层, 7 件地表)	中期
29	古家窑	延庆千家店乡	1993年	石制品 10 件(1 件地层, 9 件地表)	中期
30	辛棚子	延庆千家店乡	1993年	石制品 6 件(1 件地层, 5 件地表)	中期
31	三间房	延庆花盆乡	1993年	石制品 1 件(地层)	中期
32	河北村	延庆花盆乡	1993年	石制品 1 件(地层)	中期
33	佛峪口	延庆张山营乡	1993年	石制品 2 件(地表)	晚期
34	王坪村	门头沟色树坟乡	1993年	石制品 2 件(地表)	中期
35	西胡林	门头沟军响乡	1993年	石制品 1 件(地层)	晚期
36	齐家庄	门头沟齐家庄乡	1993年	石制品 2 件(1 件地层, 1 件地表)	晚期
37	王府井 东方广场	东城区	1996年	标本 1500 余件, 其中石制品 700 余件, 还有骨制品和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及用火遗迹	晚期
38	西单中 银大厦	西城区	1997年	石制品 1 件(地层)	晚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尖首刀分期研究

王纪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北方地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尖首刀开始铸行,它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之一。尖首刀之名来源于清代古钱学家李佐贤的《古泉汇》,因其“刀形上锐,故以尖首刀名之”,后世约定成俗,但其正式称谓仍是刀化。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现已发表的尖首刀出土记载共有 15 起,总计 5000 多枚,其中以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最多(见尖首刀出土简表)。本文拟尝试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尖首刀进行分期研究,借以阐明尖首刀的起源与发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分期与各期特征

1. 类型

尖首刀没有统一的面文,个体相对同时期其他刀币来讲较大,形式更接近原始青铜削刀。按其形状、大小将其分为甲、乙两个系统。

甲系统:尖首刀形体很大,厚重,样子独特,形制迥异,按刀首锋锐程度分为 A、B 两型。

A 型:这类型尖首刀的刀首呈斜坡式,凹刃,弧背,弯曲度数较大,刀柄有两直纹止于刀身处。按其形制的不同,可分四式:

I 式:弧背,起脊,脊两侧各有一道棱线。刀尖不锐,底边钝而内凹,不磨刃,身、柄分界明显,环作扁片状,柄上各两道直纹。面背无文。

通长 17,刀首最宽处 3.2,环径 2.15 厘米(图一:1)。

II 式:形体较大,弧背较 I 式略甚,凹刃,刀刃无廓,刀身长,刀柄短窄,柄面背各有两条直纹,刀环呈圆形或椭圆形。多数无文字。

通长 16—17.5,刀首宽 2.5—3,环径 2—2.4 厘米(图一:2、3)。

III 式:形体比 II 式略小,仍为弧背凹刃,刀首变窄,刀刃无廓,刀身较 II 式短,刀柄较 II 式长,刀柄面有两条竖直纹,柄背有的仅有一条直纹。多数有面文,多为单字或符号。

通长 15.5—16.7,刀首宽 2—2.4,环径 2.2cm,重约 15—16 克左右(图一:4、5)。

IV 式:与 III 式形制基本相同,体形较 III 式略小,背弧度变小,刀身变窄,刀柄细长,刀柄有的面有两条而背有一条直纹。多数刀币有面文,以单字居多。

通长 15.5,刀首宽 2,环径 2.1 厘米,重 13 克左右(图一:6)。

B 型:称之为针首刀^①,又称锐锋刀^②。其特点是刀首锋利且细长,呈内凹状,刀刃有外廓,刀柄面背仅有一条直纹。依据形制可分为两式:

I式:形体窄小,刀首尖长内凹,刀刃椭圆形,刀刃弧度大,多刀面有钱文。

通长 14,刀首宽 1.8—1.9,环径 1.3 厘米,重 7 克左右(图一:7)。

II式:形体与 I 式大致相同,但刀尖较短,刀刃弧度不大,刀背基本挺直,刀柄和刀身变宽。

通长 14.5,刀首宽 1.9—2.0,环径 1.4 厘米,重 9 克左右(图一:8)。

乙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尖首刀和甲系统有着明显的不同,不似甲系统尖首刀粗大,制作也较之精致,总体是刀身变窄,刀背弧度变小。按形制差异可分为 4 式:

I式:体形较大,弧背内凹,刀首为斜坡状,刀刃无廓,刀柄面背各有两条直纹,刀环为圆形或椭圆形,刀身素面无文。

通长 16—17,刀首宽 2.3,环径 1.9—2.5 厘米,重 18 克左右(图二:1)。

II式:刀首微内凹,刃部有弧度,面背均有两条直纹,环一般作圆形或椭圆形。面、背无文者较少,大多铸有钱文,或在面、或在背,位置不定,但以面上铸钱文者较多,也有无钱文者。

一般通长 15—16.4 厘米,重 11.1—19.3 克(图二:2,3)。

III式:体形较 II 式略小,刀首内凹呈弧线,锋部尖锐,刀背弧度小近似直背,刀脊虽然隆起,但已明显变薄,刀柄面、背上各有两条直纹,刀环为圆形,大多铸有钱文,位置以刀身中部略靠下为多。钱文种类增多,有符号、数字和单字三种。

一般通长 14—15.5,宽 1.8—2.3,环径约 1.8cm,重 11.6—20 克(图二:4,5)。

IV式:形制较小,背部较直,刀首略短,刀尖稍钝,刀首内凹,刀首与刀刃外廓相交处成圆角状,刀柄略宽,刀环作圆形,铸造精致。大多铸有钱文,钱文书法浑圆雄健,钱文有数字、单字和符号三种。

一般通长 14—15,刀首宽 1.8—2.1,环径 1.6—1.8 厘米,重

12—16 克(图二:6,7,8,9)。

2. 分期:

根据以上我们对尖首刀的分类和型式划分,参照与尖首刀共存的其它文物,可知其逻辑发展顺序为:

甲 A I 式 → 甲 A II 式 → 甲 A III 式 →

甲 A IV 式 → [乙 I 式 → 乙 II 式 → 乙 III 式 → 乙 IV 式]
甲 B I 式 → 甲 B II 式

在甲类尖首刀中, A I 式——A III 式联系紧密,可划分为一组;甲 A IV 式与甲 B I 式、甲 B II 式,和乙型尖首刀关系密切,这几种型式可划分为一组。

第一组:甲 A I 式、甲 A II 式、甲 A II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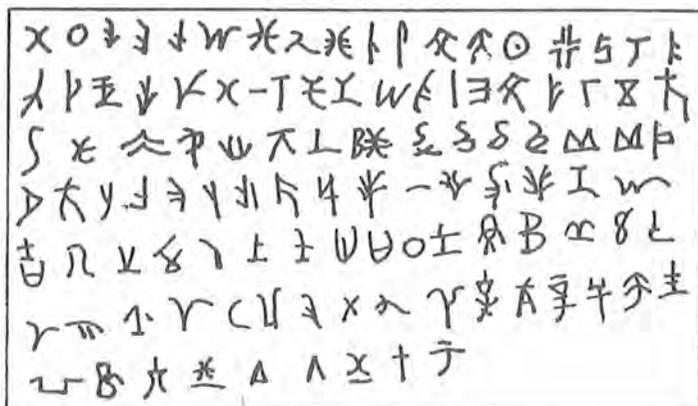
第二组:甲 A IV 式、甲 B I 式、甲 B II 式、乙 I 式、乙 II 式、乙 III 式、乙 IV 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尖首刀的年代顺序关系是,第一组为第一期,第二组为第二期,第一组的年代比第二组要早。这个分期因材料所限,各组刀币中窖藏占绝大多数,所以不能准确反映尖首刀发展全貌。但通过以上对尖首刀考察的结果,可以看出尖首刀形状演变的连续性(图三)。

3. 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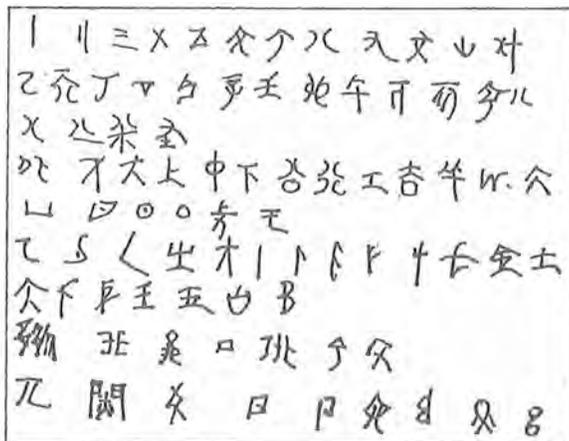
第一期:总体特征是刀尖较短,刀柄的面背均有两直纹,钱文多半一字。通长 14—17 厘米,重 16—18.5 克之间。

面文(背文)包括:



第二期:刀身较短,刀尖特长,刀柄较窄,环一般成椭圆形,多半有钱文。通长13—15厘米,刀首最宽1.8—2.1厘米,重一般在15—16克之间。但甲BⅠ式比甲BⅡ式重量较轻。

面文(背文)包括有:



一期尖首刀多出土于燕山南北地带以及太行山东麓地区,第二期尖首刀多出土于河北中部、东北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期尖首刀演变到二期尖首刀时地望的变化。一期尖首刀出土地点大多是古代戎狄族活动范围之内,其形制和第二期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将第一期的甲系统尖首刀统称为戎狄系统尖首刀。乙Ⅰ式尖首刀是从甲AⅣ式尖首刀演变而来,在演变过程中,燕文化味道开始增加,北方民族特色逐渐减少,形体变小,刀刃、刀背弧度变小,其出土范围亦在真正意义上的燕国统治区域内。所以,我们称乙系尖首刀为燕文化系统尖首刀。乙系尖首刀更加注重实际使用效果,使其更适合燕国商品经济生活和铸造技术(图四)。关于甲B型尖首刀(针首刀),一般出于今张家口地区。我们认为甲B型是甲AⅣ式尖首刀的直接延续。它是甲系统尖首刀势力渐弱,乙系统尖首刀势力增长时期,甲系统尖首刀使用者铸造的一种体重较轻的刀币,与乙系统货币持有者进行贸易活动。

4.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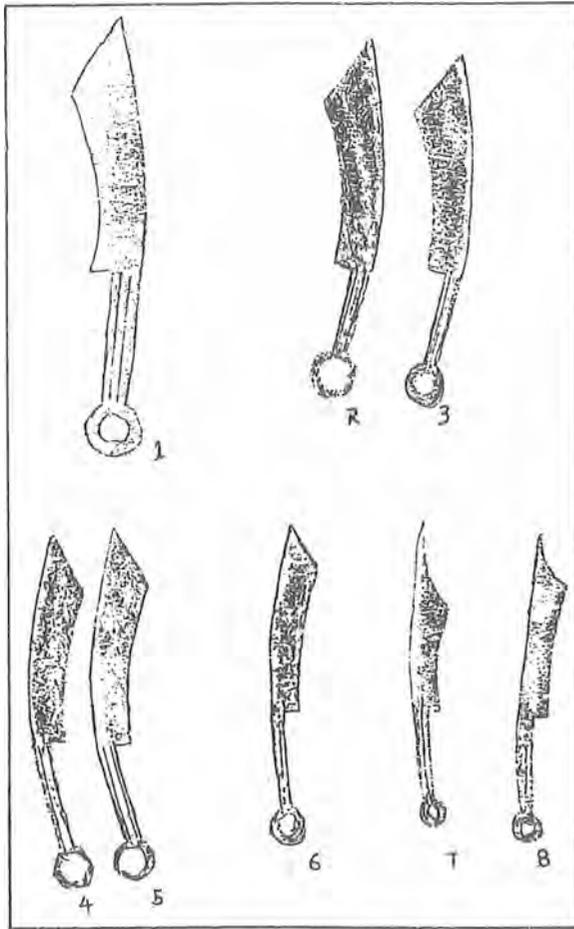
关于尖首刀最早的铸行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文献记载几乎没有,所以人们对它准确的始铸年代说法不一。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为此作了不懈地研究,郑家相先生认为“尖首刀开始铸于西周初,甚至在战国时期还在铸行”^③。王毓铨先生认为“尖首刀是晚期的”^④,彭信威先生则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刀化”^⑤。朱活先生认为“尖首刀铸行的上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从其文字及形制来看,铸行的上限可以推到春秋战国之际”^⑥。可见,关于尖首刀币的始铸时间大家众说纷纭,这也是研究燕国刀币不容回避的问题。

第一期:

1977年秋至1982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三汲古城遗址进行勘察^⑦。在城内的居住遗址一号、二号均出土尖首刀,共56枚,其中主要出土于一号遗址,二号遗址下层也有少量发现。包括本文的甲型AⅡ式、甲AⅢ式、甲AⅣ式、乙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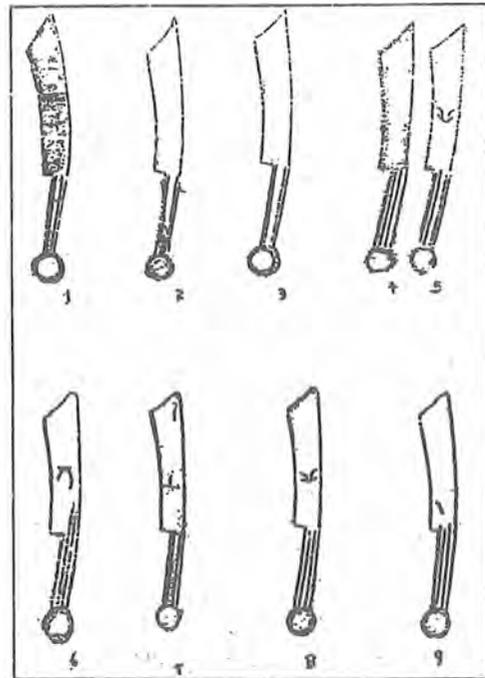
从城内各处遗址所收集遗物分析,其中一号遗址下层出土的乳头足低平裆粗绳纹灰陶鬲、细绳纹窄沿灰陶盆、黑色折肩大陶尊等,其时代应为春秋时期。二号遗址下层出土有倒塌的房墙、磨光石凿、陶网坠、灰陶钵,其年代约为战国早期。上层出土有短颈喇叭形圈足座豆、平底圈足碗、房顶泥块等物,可分析上层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因为尖首刀主要出土于一号遗址,二号遗址下层也有少量出土。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这批尖首刀至迟在战国早期就早已开始通用了。因为发掘报告中未指明尖首刀出于一号遗址上层或下层,所以我们还不能准确判断其流通的上限,但肯定要早于战国早期。

1985年至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延庆县境内葫芦沟、西梁堽、玉皇庙三地发掘了25000平方米的山戎文化遗存,清理出墓葬500余座^⑧。在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晚期墓中出土了少量尖首刀。其标



图一

- 1、甲 A 式尖首刀
- 2、3、甲 A 式尖首刀
- 4、5、甲 A 式尖首刀
- 6、甲 A 式尖首刀
- 7、甲 B 式尖首刀
- 8、甲 B 式尖首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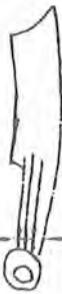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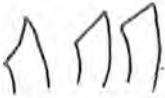
图二

- 1、乙式尖首刀
- 2、3、乙式尖首刀
- 4、5、乙式尖首刀
- 6-9、乙式尖首刀

		Ⅰ式	Ⅱ式	Ⅲ式	Ⅳ式
甲系统	A型				
	B型				
乙系统					

图三 尖首刀分期图

图四 戎狄系统与燕系统尖首刀比较图

	形制	刀首	柄与环	刀身
戎狄系统				
燕系统				

本 YHM44:5 属甲 A I 式,还伴随有青铜削刀的出土。

发掘者推测葫芦沟、西梁堅和玉皇庙三处墓地的年代上限,可能在西周、东周之际或春秋初期;年代下限,根据葫芦沟和玉皇庙两处墓地晚期阶段墓葬出土的泥质灰陶折肩罐、高柄浅盘豆和高领壶的制法与型式,推测可能已至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所以,我们认为,这批尖首刀行用的下限年代至迟年代为春秋晚期,它的始铸时间还要更早。

综合三汲古城及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来分析,第一期尖首刀的流通时间至迟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考虑到货币要有一个流通过程,它的始铸时间还要早一些,可能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第二期:

1982年,河北蒿城县北楼村发现一批窖藏尖首刀,共29枚^①,原储藏于一泥质灰陶罐,陶罐已毁。其宽大者属乙系Ⅲ式,窄小者属乙系Ⅳ式。1978年,北京市延庆县香营公社辛庄堡村出土窖藏尖首刀1350枚,分属于乙系Ⅱ式、乙系Ⅲ式、乙系Ⅳ式^②。1992年,河北遵化出土尖首刀,属窖藏性质^③,其形制与我们的乙系Ⅱ式一致。1986年,辽宁凌源出土的尖首刀与我们本文中所述乙系Ⅳ式相一致^④。

1989年秋末,河北容城县罗河村东,出土一批尖首刀^⑤,属本文中的乙系Ⅱ式,同时出土还有其它器物,其中有铜戈3件,1件铜戈上有铭文“燕侯载之萃锯”。《六国年表》索隐古本《竹书纪年》于成公下云:“按《纪年》,成公名载。”可知燕侯载应为燕成公,在位于公元前454——前433年。因为这批东西是窖藏性质,缺少明确地层关系,无法准确断代。所以只能大概推测,乙Ⅱ式尖首刀通行于战国早期。乙系Ⅱ式,在形制上与乙系Ⅰ式、乙系Ⅲ式及甲BⅠ式、甲BⅡ式大体相似,因乙系Ⅲ式及乙系Ⅳ式是由乙系Ⅱ式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们的铸行年代肯定晚于乙系Ⅱ式。平山三汲古城出土甲AⅣ式、乙Ⅰ式尖首刀,上文讨

论其流通年代下限为战国早期。1966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郎井村村东出土尖首刀五刀背面泥范^⑥,属本文中的乙Ⅳ式尖首刀。范面平整,上刻五枚尖首刀背面铸腔,刀化铸腔14.4—14.5,刀首宽1.8,环径1.4—1.6厘米。据我们调查研究,迄今为止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乙系统尖首刀数量最大,由此证明燕下都是当时乙系尖首刀最大的使用地。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处,北依北易水,南临中易水,北、西、西南有山峦环抱,东南面向华北大平原。它是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进取和防御赵、齐的军事重镇。关于燕下都的年代,其发掘者认为始建于春秋晚期^⑦。《水经注·易水》所记载的“昔燕文公徙易”的燕文公应是公元前554—前549年在位的燕文公。此时,北方戎狄各部强大,对蓟都构成威胁,为摆脱戎狄包围,燕被迫迁都。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后^⑧,燕国的北部疆域才日趋巩固,故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应从文公徙易开始。文公徙易后,并改易为燕下都^⑨,更不徙都。按常规分析,文公迁都后,不可能一到新地就马上开炉鼓铸燕明刀,上述尖首刀范的出土,亦说明文公徙易之后最初一段时间还是以一期尖首刀为货币行用。故,我们大体可以判断第二期尖首刀始铸于春秋晚期。

二、尖首刀和长城内外民族活动的一些关系

研究尖首刀必定牵涉到这些刀币的主人即文化和族源的一些关系问题。由于尖首刀上不铸国名或地名,因此,人们对其国属和创制者多有异词。马昂在其《货币文字考》中认为“尖首刀为赵国所铸”,还有说“尖首刀应是春秋、战国之际,可能为早期中山国使用的货币”^⑩。但更多的专家还是认为是燕国所铸,在此前提下又有“燕币初铸之制”^⑪、“可能是燕国长城以南一个地区的特殊的刀化货币”^⑫、“燕国境内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所铸或是‘殷遗’,‘夏遗’的铸

币^⑧”几种说法。从发现地点看,今见一期尖首刀多出土于燕山南北广大地区(如北京的延庆、河北的滦平)以及太行山东麓(如河北的灵寿),而平原地带即燕国的中心地带,却未见一期尖首刀出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殷周之际,在冀北、内蒙古南部的长城广大地带,活动着经济类型和文化习俗相近的北方少数民族集团,他们统称为戎或狄或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獯、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北方诸戎之分布。这些戎狄之族,多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⑨,但也有一部分是从事农业定居的。到了西周时期,燕山南北成了周初燕国的封地,来统治这一地区的殷代遗民和地方上原有之诸民族。

近年来,在北京房山琉璃河揭露了大面积的西周墓地和车马坑,从随葬的一批带有“匿侯”铭文的青铜器可知,西周初,燕文化确实已分布在燕山南麓的广大地区,从而证实了《史记·周本纪》所记“封召公奭于燕”的历史是可信的。

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言,春秋战国时期在燕的北方有东胡和山戎,山戎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是燕统治下的一个不小的政治集团,从其相对地理位置看与一期尖首刀的出土地点大致相当。

文献中有关山戎的记载,按成书年代,以《春秋》为最早。《春秋》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左传》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谷梁传》记:“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燕、周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以伐矣”。

《国语·齐语》记载的更为详细一些,桓公曰:“吾欲北伐,隧北伐山戎,刺令支孤竹而南归……。”

《管子·封禅篇》齐桓公“北伐山戎过孤竹”。

《管子·大匡篇》“桓公乃北伐令支,孤竹,遇山戎”。

《史记·匈奴列传》“山戎越燕而伐齐,齐懿公(前706年)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另外,《史记》的《齐世家》、《燕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也都有关于山戎的记载。

而且,仔细考究,山戎一词由来久远,《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五帝记》:“北山戎、发、息慎。”

以上史料证明,春秋早期活动在燕国北部的山戎相当强盛,时有“病燕”、“越燕伐齐”的事情发生。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以前^⑩。

山戎为当时诸戎之一,名称的由来可能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山戎的本意是有山地之戎的意思,畜牧和狩猎是其重要的经济内容。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太行山以北军都山、燕山地区含直刃青铜短剑墓葬及其它考古遗存的较多发现,和一批这类墓葬的科学发掘与清理,“山戎文化”的标题便屡屡见之于报^⑪。特别是北京延庆、河北滦平、平泉、怀来北辛堡等地山戎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古山戎的活动范围大致有了了解。其活动地域在华北平原北端,燕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区。具体来说山戎活动的区域是自西南向北而又东南,呈一个扇面形铺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它的活动范围,其西部到张家口地区的坝下,北部至河北省丰宁县,东到七老图山左右,其南部至燕山南部延庆县西拨子地区^⑫。从上述文献上考察,山戎的活动地域亦大致在此范围内。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早中期活动在燕国北部的山地丛林地带的山戎族相当强盛。他们经常随身携带各种铜刀、铜剑出没于山林之中。考古发现,山戎在其兴盛时期,其社会贫富差距已相当悬殊。在山戎族墓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墓随葬品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差别。再从墓地规模来看,大小也不相同。

山戎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与中原交接地带,其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就使其经济在以畜牧为主业的情况下,狩猎、山林采集、原始种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货币起源时指出:“货币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们的所有物,都在动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让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其它的可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换”^⑧。山戎族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为其货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均以发达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青铜削刀为典型代表,三处墓地共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近百件,青铜削刀 130 余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型式多样。发掘者将 I、II 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 I、II 式青铜削刀归属于早期阶段;III 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年代略晚,认为 IV 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 III 式青铜削刀,以及尖首刀,则属于较晚或晚期阶段^⑨。由于尖首刀和青铜削刀共存于同一墓地,二者之间在型式演进轨迹上,又有序可循,而且并非孤例(图五)。III 式青铜削刀与出土的尖首刀在形制上极为相似,刀体轻薄,弧背,起脊,脊两侧各有一道棱线,尖首内弧,刀尖不锐,底边钝而内凹,刀柄分界明显,柄部两侧各有两道棱线,脊背宽厚。故我们有理由推断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刀币——尖首刀,源于山戎日常必备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一期尖首刀即为仿削刀形制制成的。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考古所发现的山戎文化面貌,文献史料记载山戎活动的年代、地域和周邻文化的关系,与一期尖首刀铸行情况颇为相合,因此,一期尖首刀最早应是山戎民族所铸造的,是山戎金融活动的产物。

二期尖首刀出土的范围与一期有所不同,河北易县燕下都^⑩、承德^⑪、遵化^⑫、天津宝坻^⑬、辽宁凌源^⑭等地出土较多,这些地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燕国境内,而一期尖首

刀的出土地区却未见到二期尖首刀出土。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尖首刀的铸行是从燕国的北部向燕国境内南部及东北部发展的。从一期、二期尖首刀不同的出土地望,我们可以勾画出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缩影。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既是一个农牧交错的气候带,又是一个文化交流带,更是一个政治地带,自商周以至秦汉,这个地带一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在春秋时期,燕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它的下面还有少数民族,子民还是当地土著民族,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有自己的部族聚居区。燕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正如有的专家所说:“如果回溯 2000 年前,站在八达岭往南一望,是燕人之野,往北一望,就是放牧的山戎”^⑮。山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与燕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必然之事。

考古发现,在一些山戎墓葬中出土的铜礼器和陶器,能明显地看到燕文化和中原其它文化的痕迹。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出土的鼎、盘、鬲、舟、缸等青铜器,大多来源于燕或中原地区,这是山戎民族与邻近地区汉族文化发生接触并进行文化交流的实证。在山戎墓地我们还发现出土有燕国及中原各国的早期铜铸货币——铜贝^⑯,这说明山戎和周边国家很早已有商品交换往来。他们为了和燕进行商品交换而仿制本民族最常用的削刀工具,铸成尖首刀来为自己的贸易活动服务。从所出土的一期尖首刀来看,上面没有固定的面文,一般文字均是不可识的符号,记地名的绝少。所以,一期尖首刀最早是山戎族所铸,当时燕国还没有控制这种货币,这也是为什么一期尖首刀出土数量少的原因。通过对一期尖首刀的出土地点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其流通渠道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所以河北灵寿古城出土第一期尖首刀晚期型式也较多。

到春秋中期的偏晚阶段,燕国经济有所增强,原有的贝化已远远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由于燕所受到的山戎文化影响较大,必然吸收山戎族的文化内容,正是在这

种特定的环境下,燕国所采用的币制形式必须兼顾到畜牧业和农业民族间的关系和利益,山戎族粗犷豪放的尖首刀形制铸币比较容易为燕地的农业民族所接受。这种铸币形制被燕吸收和利用,成为燕国境内最早的刀币。可以说,尖首刀在开始为地方性的货币,后来发展为国家性质的铸币。尖首刀从一期到二期的发展,反映出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融合。

①⑤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②俞棫:“辽东锐锋刀考释”,《泉币》1994年第24、25期。

③郑家相:“上古货币推究”,《泉币》第6期。

④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第84和85页。

⑥②朱活:“谈山东临淄齐故城的尖首刀化——兼论尖首刀化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⑧②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期。

⑨高英民:“河北藁城出土尖首刀”,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⑩高桂云:“建国以来北京出土先秦货币综述”,《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⑪⑩刘震、刘大方:“河北遵化出土尖首刀”,载《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⑫范品清:“辽宁凌源县出土一批尖首刀化”,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⑬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发现三批燕

国货币”,载《考古》1994年第5期。

⑭⑮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⑰《左传·昭公元年》,见《春秋左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194页。

⑱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7期。

⑲陈应祺:“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⑳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齐鲁书社,1979年。

㉑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第84页和第85页。

㉒《史记·匈奴列传》。

㉓朱志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

㉔《北京晚报》1986年2月13日第1版,“延庆发掘出山戎墓葬百余座”。《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二篇《青铜时代》第五章《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期。

㉕张秀荣:“古山戎考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期。

㉖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75页。

㉗承德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承德县出土战国钱币”,《文物春秋》1989年第4期。

㉘韩嘉谷:“天津地区出土的刀币”,《中国考古学会论文集》第2期。

㉙范品清:“辽宁凌源出土一批尖首刀化”,《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㉚佟柱臣在北京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成果讨论会上的发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期。

尖首刀出土简表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数量	出土性质	资料来源
延庆县军都山	1985年	少量	墓葬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辑
延庆县香营公社辛庄堡	1978年	1350枚,30公斤	陶瓮窖藏	葛建军:《关于燕国刀币若干问题的辨析》,《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9

石家庄东部汉常山遗址	1963年	一枚钱	遗址	《文物》1964.6
遵化娘娘庄乡上峪村	1986年	16公斤,清理出528枚	窖藏	刘震、刘大方:《河北遵化县出土一批窖藏燕国刀币》,《考古与文物》1994.5
河北兴隆县陡子峪公社沥水沟	1979年春	藏刀币五千余枚,较完整2350枚,尖首刀5枚	窖藏	张双峰:《河北兴隆发现窖藏明字刀》,《文物》1985.6
易县燕下都		1854枚,较完整和钱文清晰者1196枚		《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年
平山三级古城	1977—1982	56枚	居住遗址	《河北平山三级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5辑
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砖厂	1985年秋	百余枚,文管所只征集到3枚		《河北容城发现三批燕国货币》,容城县文物保管所,《考古学集刊》1994.5
承德				郑家相:《关外出土尖首刀拓本叙言》
滦平县虎什哈公社炮台山		一枚	墓葬	《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3年
藁城县北楼村	1982年	92枚	窖藏	高英民:《河北藁城出土尖首刀》《中国钱币》1987.3
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杖子大队第九生产队	1974年9月28日	943枚	陶罐窖藏	范品清:《辽宁凌源县出土一批尖首刀》,《考古与文物》1980.3
辽东				俞棣《辽东锐刀考释》,《泉币》1944.24、25
宝坻县牛道口村西北	1980	25枚	遗址	《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宝坻县文化馆,《考古》1991.7
咸阳秦都故城辛庄堡	1962年	出土货币140枚,其中尖首刀1件,仅存刀首	窖藏	《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窖址和铜器》,《考古》1974.1

(作者为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干部)

对历史文化街区 管理保护问题的探讨

孔繁峙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作用及 当前存在的问题

首都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还是具有建都 800 余年历史的古都,国务院于 1982 年把北京列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北京除集中保存有大量的体现北京历史文化传统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外,还有一批具有北京历史文化传统特色的街区,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街区,不仅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北京城市历史传统和文化,而且在当今时代还继续为北京城市的物质文明、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通知》要求,在 1990 年经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

市第一批 25 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使一批具有体现古都风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反映浓郁的古都民风 and 民俗特色的街区得到了保护。七年以来,在首都兴起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公布,在北京古都风貌的保护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维护了故宫周围区域的传统环境及旧皇城区的传统特色。如故宫周围的南长街、北长街、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景山前街、景山后街、景山东街、景山西街、陟山门街、东华门大街、西华门大街、文津街等 14 条街区,被公布为历史街区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这一区域的新建工程,减少了建筑过高、体量过大的现代建筑对故宫周围环境的影响,使故宫及景山周围形成了一圈起衬托作用的以传统建筑和绿色树林为主的时代空间和历史环境景观,对其外侧不断出现的大型现代化建筑起到

了景观的过渡作用。

2. 保持了部分老北京传统商业街的原有格局,使代表老北京商业区的琉璃厂东街、琉璃厂西街、前门外大栅栏商业街区等大体保持了原有的胡同、街道的走向和传统商业店铺的建筑形式。

3. 保留了重点反映老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平房区,如公布为历史街区的南锣鼓巷、地安门内大街、西四北一条至八条胡同平房区等,这一地区的原有街道、胡同、沿街传统建筑基本保持了原有格局。近两年,东城区政府会同市文物管理部门共同对地安门东大街至鼓楼东街之间的数十条胡同及平房中成组的四合院进行了整治、维修,恢复了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四合院民居的传统景观,使整个街区保持了浓厚的地方特色。

4. 保留和具有老北京地区特色的历史街区。有独具特色的国子监街、东交民巷、牛街、什刹海沿岸及周围传统建筑区域、阜成门内大街、颐和园至圆明园区域。特别是国子监街经过几年来不断的整治、维修工作后,保留和恢复了传统的民居门楼、老铺门面和丰富变化的建筑形式、高低错落的天际轮廓及宽窄相间的街道空间,再现了其历史文化的生活气息。

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危旧房改造工程在旧城区的全面铺开,其建设规模之大、建设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却相对滞后,突出反映在:

1. 在首都城市建设的整体发展中,对历史传统街区的保护工作重视不够,公布历史街区以后,还缺少相应的管理规定,保护管理责任不明,措施不利,个别街区内还新建了一些与原有传统格局、建筑风格不协调的新建筑,如南长街、南池子大街特别是熙和园至圆明园大街等都出现了形式不同的新建筑,还有著名的传统街区——牛街,在区域性的危房改造中出现了体量较

大的新式住宅楼。以上情况,致使街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特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 部分街区沿街房屋因使用功能的变化(多改为店铺、门市等),其维修大多不适当地采用了红砖、洋瓦、大理石墙面、铝合金门窗、镜面琉璃等现代化装修材料;有的沿街乱搭乱建;沿街建筑上任意设立广告牌、灯箱;挤占道路、空间,建设棚亭等临时建设,破坏了历史街区的传统特色。

3. 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建筑普遍缺少必要的维修保养,大部分街面的民居建筑只使用不维修,使得很多老宅院的砖雕石刻残缺、破损,木质构件糟朽、脱落,墙面、瓦顶风化严重,也影响了历史街区的原有景观,急需进行维修保养工作。

二、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建议

1. 要及时制定历史街区的保护管理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在全市公布实施,使全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管理工作有法可依,由市规划局、市文物局联合依法实施管理。在具体掌握上,要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原有格局;维持现有传统建筑所形成的街区建设高度,保持历史街区传统特色的总体风貌,在规定的范围内,不得随意新建、改造,不得随意改变街面建筑的使用性质,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项工程,都要同街区整体建筑高度、传统建筑的布局密度、外观、材料、色调、技法等方面保护一致,以维护文化街区的原有风貌。

2. 研究制定和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规划。全市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和即将确定的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务院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条街区在因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城市历史沿革的特定地位,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个性,它们的存在是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更是古都风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制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要从历史文化街区

整体风貌的保护出发,突出各条街区的历史建筑特色,明确街区的保护、管理范围,提出整治的目标,根据街区的建筑类别,有针对性的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北京旧城保护的实际情况,建议根据每条历史文化街区的不同类别的建筑,提出如下规划管理要求:

一类建筑:为历史文化街区中具有文物价值的(政府部门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如南、北长街,南、北池子大街。景山东、西街就有宣仁庙、皇史宬、福佑寺、太庙、普济寺、凝和庙、大高玄殿等十余处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交民巷大街的各国使馆建筑都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南锣鼓巷四合院平房区、西四北一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区都分布有十余处市级和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对此类建筑的规划管理,其维护工程应按国家文物法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即根据各项文物建筑的国家级、市级、区(县)级的保护等级,分别由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区文化文物局批准,文物单位内部的临建项目,应由市规划局、市文物局依照有关文物保护的规定联合审批。

二类建筑:为历史街区中经全市文物普查登记注册的、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此类建筑还未被政府部门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全市共有7千余项,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于历史文化街区之中,此类建筑同样属于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建筑,只是暂时没有确定级别,随着时间的发展,登记注册的文物建筑将逐步被确定为区(县)级文物。对此类建筑只能维修保护,而不能拆除或随意改建,应按原形制维修、保护。

三类建筑:为历史文化街区中建造年代较近但其建筑形式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传统建筑。此类建筑多建造于民国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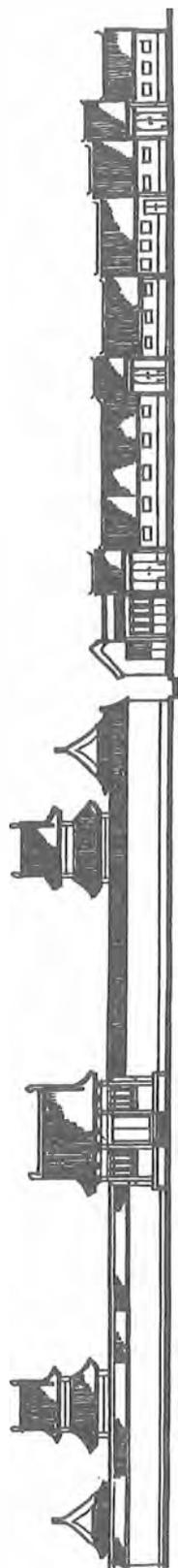
其建筑主体部分仍有保留价值,对这类有一定特色的建筑应予以保护。对其规划管理,可允许在保护其建筑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维修或复建。

四类建筑:为历史文化街区中不具有历史、艺术价值而且保存状况较差的一般性传统式建筑。此类建筑多为建造于建国前后的四合院民居,无显著的建筑特色,在规划管理上,允许在不影响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景观及风貌特色的前提下,可以对此类建筑进行大修或者拆除重建,其沿街建筑应按传统形式复建。

五类建筑:为历史文化街区中后期添建的各种现代形式的建筑,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历史文化街区拆除古建筑而陆续添建的新式建筑,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格格不入。如在原建筑基础上新建的商店、门市部、机关、工厂大门、公共厕所等,此类建筑往往是采用白瓷砖、洋瓦顶、琉璃橱窗等各类现代化建筑材料,对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造成了较大影响和破坏。在规划管理上,对这类建筑原则上应创造条件逐步调整、拆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恢复历史街区中原有传统形式的建筑。

按以上建筑类别,还需逐步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的详细规划。根据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关于要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城市的传统,保护古都风貌的要求,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历史街区的建筑类别实施管理,以减少当前房地产开发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冲击。同时,要认真总结和推广东城区整治国子监街的经验,制定计划,对现有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受到损害的地段进行治理整顿,逐步恢复街区原有的传统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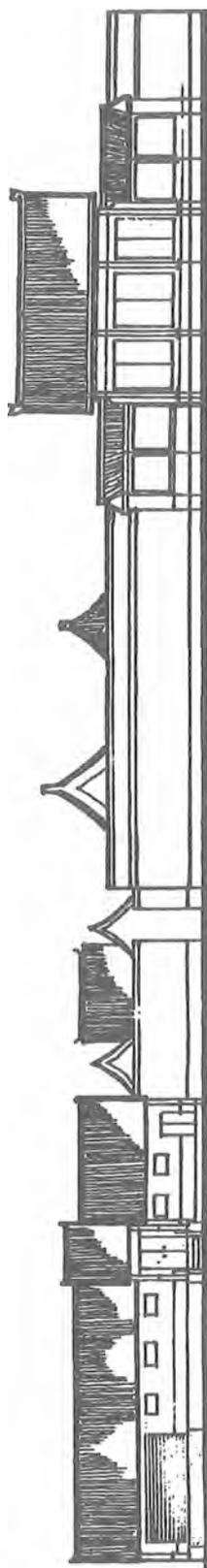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1类建筑

孔庙与东侧(1类与3类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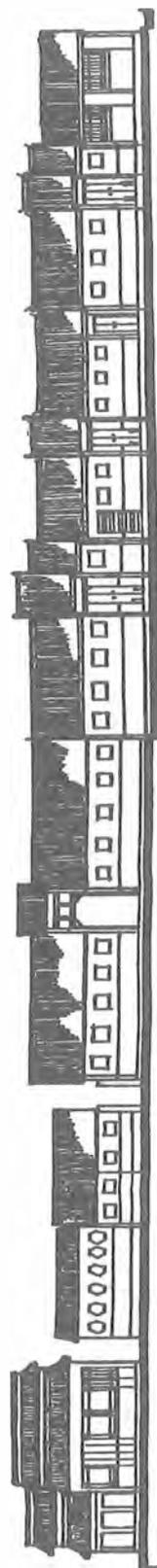
3类建筑



4类建筑

国子监与西侧(1类建筑与4类建筑)

1类建筑



5类建筑

4类与5类建筑

4类建筑

国子监街北立面建筑类别示意图

金中都城水关遗址木结构腐朽检查和防治方案

张厚培 范军 刘秀英 王平 籍和平

摘要 本文叙述了通过多次实地检查和试验所获得的水关遗址木结构腐朽状况和严重程度;着重指出木腐菌以及木质化学分解是木构件败坏主要原因;亟待治理并提出了基本防治方案。

一、金中都城水关遗址及其木结构

水关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金中都城水关遗址位于北京右安门外,距今 840 余年。因它处在当时都城南面城墙之下,城内河水经此流入护城河(今凉水河),故称为南城垣水关。目前,金中都城遗址除几段城垣残址外,多已荡然无存。金中都城水关是遗址保存中最大的一处,且在都城城垣的关键位置,因而成为金中都遗址的重要标志。它的发现被评为 90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之上建立“辽金城垣博物馆”。将遗址妥为保护并展出。

1. 水关的构成

遗址基础部分平面呈]形,南北全长 43.4m,过水涵洞长 21.35m,宽 7.7m,由 4 部分组成:

- ①过水涵洞底部的地面石;
- ②涵洞部位两厢石壁;
- ③进、出水口两侧的四摆手;

④残留的夯土城墙。其中,两厢石壁墙长 18.7m,宽 3.7—3.8m。北面入水口两侧摆手长 9.2—9.3m;南面出水口两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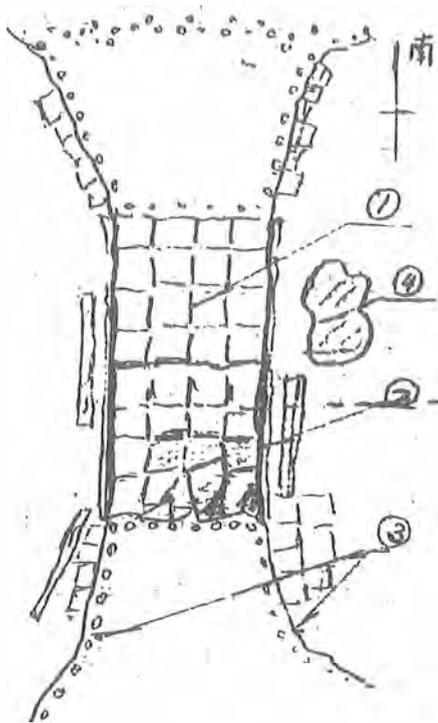
摆手长 9.4—9.5m(见水关示意图)。

2. 水关基础建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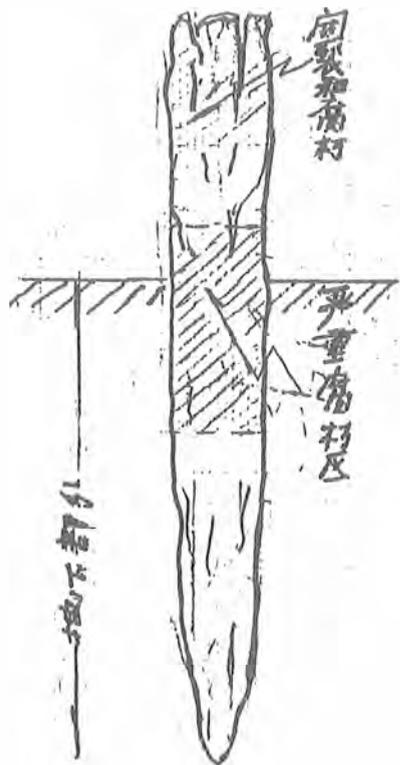
解剖挖掘中发现,水关遗址涵洞部位最下层钉有一排排的木地桩,地桩之上铺设衬石枋,木桩与衬石枋采用卯榫结合固定。衬石枋上铺盖地面石和两侧石板墙,地面石采用铁钉穿过孔眼钉在衬石枋上,同时石板之间用银锭榫结合并利用两厢石壁挤紧,抗拒水流对过水石板的冲击。在木地桩之间空隙均以碎石碎砖和砂土逐层夯实。另外在紧挨过水地面南北两端钉有一排密集的擗石桩,在出水口的南端出口处钉有相互交叉两排木桩以固定地基。实际表明这种水关基础结构历经数百年仍能保持恒定位置。使河水通过城墙顺利的流出城外。

3. 水关建筑的木结构

水关主要是木石结构建筑,建造这一宏大工程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根据挖掘报告和我们调查,遗址现有的木结构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类。①木桩,可分为擗石桩和基础木桩(木地桩)。现有的擗石桩主要沿着四摆手的条石墙及过水地面石的南北两端分布,计有 220 余根。它们靠近石壁和地面石,减少河水对堤岸和地面石的冲击,维护两岸石壁和地面的稳定。擗石桩的桩身部分露出地面,另一部分埋在地里。直径在 18—22cm 之间,桩身高达 2m;基础木桩至今仍埋藏地下。分布在过水地面石下



水关示意图



木桩腐朽部位示意图



图一、细胞壁被破坏分离



图二、细胞腔滞留大量分解产物

和两厢部位。据挖掘报告,此类木桩直径在 1.35m 与 1.1m 之间,根据与其相连的衬石枋推算,数量约 1500 根。②衬石枋,分为三部分。一部处在过水地面石板下,与地桩卯榫相接。已查明大方 17 根,尺寸为长 8.6m,宽 0.55—0.6m,厚 0.3m。另一部分在涵洞两岸呈南北向铺设,计有 14 排大方,材积约 29m³。第三部分在四摆手石板下,共 24 排。目前,我们能看到两厢地面木方 11 根,过水石板裸露 1 根以及四摆手部位个别衬石枋裸露的侧面。

表一 瓣石桩(地表段)现状

序号	腐朽、开裂情况	根数	百分率%	检查总数
1	严重腐朽和开裂	39	19.0	205
2	中度腐朽和开裂	24	11.7	205
3	中度腐朽和严重开裂	46	22.5	205
4	腐朽但外形完整	12	5.9	205
5	严重腐朽且外形不完整	22	10.7	205
6	严重开裂至外形不完整	15	7.3	205
7	断裂或残头	47	22.9	205

主要情况包括:①由于腐朽和开裂等原因 205 根木桩中已有 47 根腐断或折断,占检查数 22.9%。在地面齐头处材质已严重腐朽,强度丧失。②挖开土层后木桩历经 3—5 年暴露在空气中,其中 37 根(18%)由于腐朽和干燥造成粉碎性开裂。木质稍用力即可剥落,难以维持其自己状况。③部分木桩计 82 根(40%),虽然其外层腐朽和开裂但能保持住中心部位强度,维持住自身稳定状态。④部分木桩仍生长白色菌束和子实体。

2. 衬石枋和枋下基础木桩

处在过水地面石下之衬石枋,呈东西向平铺在基础木桩上,计 17 根。每枋之下有 9 根基础木桩,两排衬石枋之间还钉入一排 9 根木桩,与衬石枋一起承托地面石。因此总计基础木桩 297 根,为了检查掩埋石板下木构件状况。掀开过水地面西北角两块石板,土层表面显露出薄片状菌层。开挖两枋之间长约 4m,深约 1.3m 的方洞。显露衬石枋的部分侧面和两根基础木桩。

二、木构件现场腐朽检查

1. 瓣石桩

逐根检查进水口(即水关四摆手的北面)瓣石桩 93 根;出水口 112 根。检查包括测量木桩地上部位尺寸高矮、材身腐朽程度,有无自身支撑强度和接地部位(扒开土层 3—5cm)腐朽程度和端部开裂状况。现将腐朽和开裂状况分类列在表一。

衬石枋侧身布满菌丝,采用空心钻和小刀分别在衬石枋上钻取和挖取小块木样,表层 1.5—2.5cm 严重腐朽但内部材质较坚硬。从基础木桩上取样,情况却迥然不同,木材水渍渍的,表层 2—3cm 褐色腐朽,可以轻易挖取,强度微弱。其内层(深达 5cm)看似健康木质本色,但木质可轻易一块一块剥离,其强度也大大丧失。经显微电镜观察其细胞壁已严重破坏(图一、图二)。其腐朽情况在显微镜观察一节中予以讨论。

3. 两厢大木枋

共计检查东厢 5 根,西厢 6 根。东厢 5 根中编号 11[#]和 13[#]的侧身已呈后期严重腐朽,深度 1.5—4cm,局部已达 6cm。其它 3 根,表层腐朽开裂,但内部木质尚好。

西厢 6 根中,编号 4[#](长×宽×厚=7.0m×40cm×23cm)表层腐朽呈碎木块状;开裂贯穿全身。侧面重腐,强度丧失;编号 6[#](长×宽×厚=7.1m×43cm×23cm)表层腐朽开裂,呈粉碎状,其它四根

表层腐朽开裂,侧身腐朽 3—4.5cm,整体木质强度较好。

据“考古发掘资料”称在进出水口两岸也钉有地桩,在地桩上紧密排列着 7 根南北向的衬石枋。这些木枋因压在石板之下,未能检查。仅从外露的侧身观察,木质褐色腐朽严重。

4. 木腐菌生长状况和初步鉴定

检查辮石桩的过程中,发现木桩背靠土壁和接地部位、裂缝处和潮湿处生长菌束和少量子实体。挖开的木桩桩身不少根状菌束相互牵连,且在邻近木桩间交叉生长。塑料薄膜包裹用于观察试验的木桩放在室内(室温 15—17℃),约半月材身表面生长片状的白色菌层。表明这些腐朽且潮湿木桩一旦气候稍暖,木腐菌就迅速生长繁殖并向周围蔓延。

为了查明辮石桩整个材身腐朽和含水率情况,从材身上轻轻剥取菌层和子实体,在室内通过纯化培养,初步判断此类木腐

菌属担子菌纲多孔菌科(Polypora ceae)。主要是皱孔菌(Merulius spp.)同时还有少量的地窖菌(Coniophora spp.)

5. 木桩试样锯剖检查和含水率测定

从现场挖取一根辮石桩。按地上部分(约 50cm)、地表部位(65cm)及往下部分截成上、中、下三段,每段锯截下厚度 1.5cm 圆盘 2—3 个,留作测定含水率之用。上段端头 20cm 严重褐色腐朽,强度丧失,锯截时木质呈碎块;中段由外向内 4—6cm 严重腐朽,下段外层 1.5—2.5cm 严重腐朽,强度丧失。这种情况与现场检查的木桩腐朽情况非常类似,如木桩腐朽部位示意图所示,上段头部腐朽加开裂,中段地表上下 50cm 处,潮湿和腐朽严重。我们将它划为腐朽严重区。将上、中、下段截成的 2—3 个圆盘,按外、中、内三层锯成 1.5×2cm 小试块,采用烘干法测定木材含水率。其各段含水率平均统计见表二。

表二 木桩(编号 17[#])含水率测定(烘干法)

17 号	长度 cm	含水率(平均)	外、中、内层含水率
上段	50cm(地上部分)	130.5%	88.5%(外);150%(中);153%(内)
中段	65cm	205—238.1%	差别微小
下段	70cm	207—210%	差别微小

外层厚度 0—3cm;中层 3—6cm;内层 6—9cm。

表二含水率情况表明,木桩处在极其潮湿状况,特别是地下部分木材水分超出木材自身重量的两倍。产生这种状况原因据我们分析,这些木桩早在 800 年前就夯筑在河水之中,后经掩埋覆盖,但仍在河床低洼位置。原地积水不散,四周的地下水又不断往此地渗透;加之沙质土壤,地下积水渗透更趋严重。木桩的潮湿就显而易见。1990 年开挖以后,辮石桩部分露出地面,接触空气,木质水份向外挥发,木质干燥。木桩桩身在不同部位会出现不同情况。其一,木桩的接地的北靠土壁部位木

质容易腐烂,频频滋生发育木腐菌的子实体(俗称蘑菇),特别是 7、8、9 多雨季节。虽然含水率超过 150%以上,木腐菌也是不易滋生的。但是木段的外层水分仍在不断蒸发,含水率逐渐降到一定的范围内木腐菌就能适宜生长,加之土壤内含有丰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为木腐菌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物质,同时木腐菌较空气中多而复杂,木质疏松且多孔。菌丝和孢子通过空气、土层和木材多种孔道滋生发展。其二,木桩的顶部会发生开裂,顶部的木质水份蒸发较快,虽然木桩下部的水份可以由上迁移,但速度受到高度的制约变得缓慢。特别是冬天的干燥季节(11—2 月),顶

端水份的蒸发与下部迁移失去平衡,就导致木质严重开裂,特别在材质脆弱和疏松的薄弱部分常造成多方向粉碎性的开裂。

6. 木桩树种识别和电镜观察结果

四摆手瓣石桩的大小,长短并不很规则;而衬石枋因承受地板石和河水冲击力,均采用尺寸硕长粗大(816mm×0.6m×0.3m)的木方铺设。大方又与基础木桩榫卯固定。表明金代工匠用材和加工考究。从衬石枋和木桩取样,进行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观察,衬石枋属落叶松,瓣石桩属云杉树种,落叶松和云杉皆为耐腐抗蛀的树种。基础木桩试样中如前述充满大量水份,内层虽呈木材本色,但强度丧失,可用手剥离。干燥时材身发生大开裂和皱缩,木质手捻成粉状。经电镜观察,细胞腔内出现大量的分泌物,是由细胞壁分解和“崩溃”产生的。经与国外有关研究报告分析比较,这种木质的分解与木腐菌寄生破坏不同,是一种化学分解。即长期的浸泡在水中,木材的化学成份半纤维和木质素发生水解,分子链断裂,细胞壁分解产物大量滞留在细胞腔内。总之,它与生物败坏造成的腐朽不同,是一种化学分解变化。

三、基本结论

1. 瓣石桩腐朽开裂严重

根据检查统计,205根瓣石桩中,严重腐朽齐地处断裂或头部开裂难以成型的有84根,占41%;部位木桩82根(占40%)能保持自身稳定状态,但头部腐朽开裂,接地部位由于长期潮湿,菌丝滋生感染,腐朽已深至3—6cm。据已往地下遗址温湿度记载,在北京7、8、9月潮湿闷热多雨季节里,温度常处在19—28℃,湿度RH62—85%范围,此类温湿度最适宜木腐菌滋生发展,这类病腐木面临三种不良后果。一是木桩接地处腐朽断裂;二是腐朽后发生粉碎性开裂,保持不了自己的形状。三是木桩的地

下部分腐朽由外向内,由上往下发展,长期下去也将丧失强度。

两厢的大木枋由于开挖以后暴露在空气中,正面已腐朽龟裂。侧面严重腐朽深达2—3cm;过水地面衬石枋下基础木桩属于水泡木类型,木质既受到木腐菌侵袭;又长时期浸渍水中化学成份发生水解,一旦暴露空气,腐朽和开裂同时发生,木桩很难保持原状。

2. 木桩严重腐朽原因

从检查木桩腐朽情况来看,木桩和衬石枋腐朽是受到木腐菌的严重侵害引起的。木腐菌和霉菌在开始阶段同样发生菌丝和菌斑;但木腐菌菌丝可深入到木质内部,分解木材中纤维素和木素,破坏木材强度并能发展成子实体(蘑菇)。而霉菌只是附着木材表面,对木材强度影响轻微。

一般来说,木腐菌最适宜温湿度是在18—25℃,RH60%—80%范围。地下遗址滋生发展的木腐菌系多孔菌科中的皱孔薄菌属、地窖菌属。这类木腐菌以木材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为营养成份,对木材有极强的腐朽力。

3. 亟待治理和防护

水关遗址中的木材属于生物有机材料,和石质、粘土和细砂等无机材料相比,更容易腐烂和败坏。水关的关键部位涵洞和四摆手使用大量的木桩和衬石枋。这些木构件从用材加工、夯筑工艺到木石结合构造,都充分体现了当时水工建筑的进步和成就,具有宝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木结构,就没有水关文物。现在检查结果表明已有41%木桩或腐烂断裂或因干燥引起开裂,治理腐朽及开裂已是迫在眉睫的了。

四、水关木结构腐朽及开裂治理方案

1. 治理原则和整体方案

对木桩的治理工作,既不能改变木桩现状位置,又不能损坏现有木桩尺寸大小,保护其现有强度和色泽。鉴于木桩普遍腐朽和开裂,防治技术以化学方法为主,同时适当改善木桩置于土壤的恶劣环境。使木桩能长期的保持下去。考虑到木桩的地上部分严重腐朽和开裂,埋于地下的木构件,其腐朽程度又有区别,将治理方案分为二期。第一期治理地上木构件;第二期治理在地下部分,包括改善置于土壤的恶劣环境。

2. 防治技术

1) 防治药剂和深度处理技术

防治药剂应具有杀死现有木腐菌能力,同时予以木桩长期防止木腐菌侵害的能力,即打上“预防”针,使木桩获得长期的保护效果。在现场效果试验的基础上,选用木材所研制的 OPA—1、OPA—2 及 WP—2 药剂配方。其深度处理技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 ①吊瓶注药处理;
- ②浸渍密封扩散处理;
- ③真空加压处理。

真空加压处理可以达到较好深度,但须在车间进行,由于木桩和木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朽和开裂,不宜移动,一般不宜采用真空加压处理。

2) 环氧树脂胶结和补强

采用环氧树脂等配方胶结剂,胶补裂缝及加固木桩,防止木质(特别是端部)继续开裂和脱落,维持其现状。

3) 开挖和垒砌堵渗防潮沟

由于埋置木桩的沙土非常潮湿,导致木材含水率很高。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环境,同时还要保持其遗址挖掘时现状。须沿着卵石木桩的分布开挖和垒砌暗沟。暗沟深 1.0—1.5m,宽约 0.5—0.7m。采用砖和水泥垒砌。保持木桩中下部一定的干

燥环境。暗沟表面施以防腐处理,沟槽上部离现有地面 20—30cm 处加上盖板,上面铺盖原来砂土,以保持目前埋置现状。

4) 防治效果

由于遗址的木构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朽和开裂,木质强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40% 以上的木桩或腐烂或严重开裂难以维持现状;同时,有一部分地下木桩木质既有生物败坏又存在长期水解造成的化学破坏。治理难度很大。国内对于建筑木结构虽有一定的防腐技术,但对地下挖掘的病腐木还缺乏成功的经验。但是遗址木结构也具有良好的防护条件,一是建立了博物馆,处于室内再不会经历风吹雨淋,光照降解;二是室内的温湿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制约,木桩以及木枋的腐烂发生发展基本掌握。其三,特别是现有的露出地面的木桩(卵石桩)均不承重,只需维持它们自身的强度,这就给治理带来有利的条件。根据我们多年防治木结构技术和经验,采用现有的化学药剂和处理方法,防止木桩等木构件继续霉变和腐朽是有把握的。依据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地上和墙体木结构防治的经验,对于这类病腐木经过上述杀防木腐菌处理及有关环境措施,木结构防治,维持其原状可以达到 30 年以上,实施第一期防治处理工程,预计防止地上木桩败坏保持现状可达 5 年乃至 10 年以上。

参考文献:

1. 金中都水关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辽金城垣博物馆藏。
2. 成俊卿主编:《木材学》,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5,第 794—802 页、第 873—882 页。
3. 罗威尔·R. M. 《木材考古》(Archeological Wood.) 1988,第 35—67 页。

(作者为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科研人员及辽金城垣博物馆馆长和馆员)

严防内盗，保文物安全

郝东晨

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存在了几千年，它仍将继续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全过程，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决定了人们同盗窃犯罪做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所谓内盗，是指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对本单位所实施的盗窃行为。它比外盗更危险，更难防范，俗话说：“家贼难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内盗的类型

内盗同属本单位的人，但因所处的地位和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具体类型也有差异。根据他们在单位的工作职责可分为监管自盗、守卫自盗、非责任内盗和内外勾结盗窃等四种。

1. 监管自盗 这种自己窃取自己所保管的财物的人，称为监管自盗。他们都是利用财务和物资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或有意制造漏洞而实施犯罪的。

监管自盗，对他们自己来说，具备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作案方法容易、时间充足，又可以精心伪装，不容易暴露；不利的一面是把柄被人捉到，“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外盗作案后可以远走高飞，而监管自盗想逃则十分困难容易

被顺藤摸瓜地揪出来。

2. 守卫自盗 守卫自盗的客观条件有两个：一是具备同重点财物接触的条件。他窃取仓库里的物品可以利用保管员下班后把门钥匙挂在墙上或藏在抽屉里的漏洞，把钥匙拿到手，就能够任意出入库房，露天场地的重要物资，守卫人员可以伸手可及；二是单人守卫，无人监督和制约，整个单位的财物都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别人防他，而他不必防别人。

3. 非责任内盗 单位的职工对自己工作使用、保管或守卫的财物不去自我窃取，而是去窃取别人负责使用、保管或守卫的财物。这种窃取他人负责的财物的，称为非责任内盗。非责任内盗是安全性较大的一类，不易留下把柄。因此，企事业内部非责任内盗的人数最多，危害性也大。他们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到处走动，窥探易盗物存放的部位防范的漏洞，他们不但夜里作案，而且可以以工作为掩护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他们可以利用合法身份的外衣，把窃来的物品大摇大摆的从单位的大门搬出去。他们作案后，如果没有人证，暴露的可能性很小。

4. 内外勾结盗窃 内盗分子对单位内部的财物，想实施偷窃时，但因主观或客观的某种原因，在不能亲自实施行动时，可以勾结外部的盗窃分子来作案，达到坐地分

赃的目的。

二、内盗的特点

1. 熟悉窃取对象的品种数量和存放位置 内盗分子通过日常生产或工作机会、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条件,很容易掌握易盗物的品种、数量和存放部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路线可以入室和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窃取。外盗只有踩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内盗作案不但可以省去专门踩点这道程序,而且通过合法身份既可以掌握情况,又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以了解保险柜里现金为例,外盗只能原则地知道柜里有现金,但不知道确切的数目,作案时发现金库空着,就会枉费心机白劳一场。内盗分子则可以知道今天从银行取回几千几万的现金,当夜作案能够准确无误,可以手到擒来。

2. 掌握守卫人员活动规律和弱点 内盗分子在本单位工作,日久天长,通过自然观察,可以从守卫人员的活动规律中找到空隙或弱点,设计出理想的行动时间和作案时出入的路线。内盗分子可以利用守卫人员距离守护对象远,夜间入睡的具体时间,巡逻中的空隙时间,某人漏岗等漏洞为内盗分子所利用。

3. 了解内部财物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财物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内盗比外盗可以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多得多。内盗作案可以利用物资数量控制不严的漏洞,伺机窃取;他们可以利用仓库白天不上锁或者虽然上了锁但钥匙可以轻易被别人拿到手的漏洞进行盗窃;他们可以利用出入门检查制度的松懈,将财物带出单位。内盗分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窥知和利用财物保管制度上的漏洞,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4. 单人作案多 内盗分子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作案,虽然成功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一旦败露,不利的因素更大。对内盗分子来说,问题在于既能窃得财物,又不致于败露。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案的方法得当

外,知情者越少越好。办法就是参加的人要少而精,单个人作案最保险。

5. 具有外盗作案的全部条件 内盗分子具有合法身份掩护的优越条件,无疑对偷窃带来很多便利。内盗分子可以把外盗的翻墙越室、撬门窗、破箱柜的手段拿来为己所用,利用夜间或星期日、节假日潜入内部,将财物窃到手。内盗分子采用外盗作案方式,既容易得到财物,又可以减少危险性。

三、文物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1. 文物无账 这种文物管理方式既没有帐目,也没有登记册簿,所有文物往库里一扔了事。这种单位确实存在着,而且决不是个别的。比如某艺术馆,1981年至1984年,被内盗刘某盗去价值8万多元的8幅名画。作案分子刘某说:“分配我管理名画时,领导上只是指给我一间储藏室,满屋都是字画,既无通风、除虫等措施,也没有任何登记手续,大家都心中无底,所以我放心大胆地偷。”这是典型的混水摸鱼的现象,如果单位领导给他的是一池清水,他是决没有胆量下去摸鱼的。

2. 文物和账目单人管理 文物管理员和文物帐目管理员由一人担任,严重违反了文物管理的起码制度。两个人本应是互相监督的,领导却把他们合二为一,这样,既可以把文物直接偷出,又可以偷梁换柱以假替真。1984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虹江仓库的字画被盗。字画仓库保管员陈某,利用这种合二为一的权力,先后采用造假账、报损、“顺手牵羊”等手段,作案数十次,盗走价值57万多元的120幅名画。陈某作案长达一年之久,但公司领导毫无察觉。

3. 钥匙管理混乱 人们往往重视文物本身的管理,又置铁门铁窗铁柜子,又装报警设施。但却放松了对库房门钥匙的管理,内盗分子可以轻易拿到库房钥匙利用合法身份光天化日之下进库偷盗文物。

1988年某博物馆重要文物被盗,问题就出在钥匙管理上。保管员齐某利用该部门钥匙管理混乱的漏洞,轻易拿到宗某的库房钥匙盗走六件金器(均为珍贵文物)。

4. 入库制度不落实,单人可以自由出入库房 不要说重要的文物库房,就连一般的商品库房也应该二人以上同时出入,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可有的单位出入库制度定的非常细,而且也都非常正规的张贴在墙上,可就是没人按规定去做,制度形同虚设,单人出入库房的现象已习以为常,无人纠正。如某大学图书馆,三百余件文物(其中不少是珍贵文物)被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5年的一天,该图书馆维修电路,星期天留下该馆工作人员贾某值班以监督修电路的工人。贾某独自一人看着满书架、满柜子的文物,不禁眼馋,于是,他就找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经卷带回家。一次成功,便激起了更大的私欲,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利用值班或一个人入库给读者取资料的机会偷走各种文物三百余件。领导丝毫没有察觉,直到学校因工作需要调用其中某卷经卷时,才发觉丢失的不止一部经卷。

5. 值班人员素质差,又无严格的值班制度作保障 上班时间,单位的人员较多,将文物从库房或展厅拿出来再带出单位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夜间和公休日只有少数人员值班的情况下就不是很难的了。特别是值班人员本身是个内盗分子,偷文物就如探囊取物一样。今年八月份的一天,河南省南阳市一博物馆两名职工郭某和李某在馆内值班,郭某有意偷取正在展出的文物,便找理由让李某离开博物馆,之后,郭某偷出六十余件珍贵文物到广州出卖。

6. 文物交接和定期清点制度形同虚设 文物的账、卡、物三者一致是文物安全存放的基本要求。单位的领导要通过文物的入库制度、出库制度和定期清点制度以及保障上述制度严格落实的监督制度来实现三者的一致性。然而问题就出在无监督制度

或监督不力上面。某文物商店,在调用一件珍贵文物时,发现该文物和其他两件文物一起不翼而飞。门窗没破,箱柜没损,而且每天夜间都有值班人员看守,不用公安人员下结论,一般人都会断定这是一起内盗案。经调查得知,该文物从别处移至此处保管已经一年半的时间,先后换了三个保管员,交接手续和每半年一次盘点的手续齐全,而且都是按规定签的字。然而,客观事实是三个保管员在相互交接时都没有清点实物,在每半年一次的盘点中也都没有清点实物,只是按规定在单子上签上名字而已。结果,本来可以追究一个保管员的责任,却要面对三个保管员,在三个人里查出一个;本来可以审查不超过半年的人员来往和值班情况,却要审查一年半的有关情况。大大增加了侦破工作的难度。

四、防文物内盗的措施

1. 设置文物库房要充分考虑防内盗的因素 建设一个结构坚固,布局装修合理,基本设施齐备的文物库房,不仅是防外盗的需要,也是防内盗所必需的。博物馆的藏品种类繁多,体积和形质各异,要求所存放的环境也不一样。因此,建设库房和装修库房要最大限度的满足文物本身的需要。切不可忽视文物存放的客观要求,把库房结构搞得千篇一律,不管什么样的文物都往同样的库房里边装。尽量做到文物需要什么样的格局,库房就设置成什么样的格局。铁门铁窗不单指外边的大门大窗,也应包括里边的小门和小窗。尽量做到一类文物放在一个库房,一个库房只有一名保管员负责,任何一个保管员都不能轻易接触到其他保管员所保管的文物。不论是外边的大门还是里边的小门都应用双锁,而且要严格坚持用门封和锁封。

2. 严格建账、建卡、建档和定期清点制度 文物在入库的同时,都要建立文物总账和分类账,填写文物卡片,建立包括有文字说明的照片和文物专档,做到一物一档。

文物总账要按照文物入藏时间的先后顺序,逐件编号,逐件上账。文物编号一经确定,不可再改动,不能重复,不能遗漏。文物分类账要按文物品类上账。一种品类的文物,按年代顺序上账。档案、账目、和文物应该三权分立,一人一职,不得兼职。档案和账目应分别存放在具有防火防盗功能的保险柜里。百货商店的普遍商品每月还要清点一次,何况文物,更应建立严格的清点制度,决不能走过场或弄虚作假。这种清点应包括保管员个人的定期清点,部门负责人的不定期清点和馆领导的抽查性清点。每次清点都要认真填写专用表格并要妥善保存。

3. 对库房钥匙要严格管理 外盗分子通常采用撬锁、破坏门、窗或在墙上挖洞等手段进入文物库房。而内盗则多采用钥匙管理上的漏洞私自拿到钥匙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文物窃走。如果保管员责任心不强,什么时候丢失的都说不清楚。所以说对钥匙的严格管理是防止内盗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单位库房展厅的数量,应分别设置专门存放钥匙的钥匙房或钥匙柜,要有可靠的安全设施。钥匙房或钥匙柜要有文物保管员以外的专人管理。将钥匙领取和送还的情况进行严格的登记。文物库房和展厅的钥匙严禁带出单位大门。

4. 严格保管员出入库制度 为确保文物的保管安全,三员制约制度最为有效。三员是保管员、账目员、公证员。都应是专人专职,不应互相替代。文物数量较少的单位,公证员可以由单位的行政领导兼任。只有保管员、账目员和公证员都到场,才能够开门,缺一不可。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库房。文物的清点、晾晒、出库、入库都要有三员共同在场、共同负责。保管人员须认真填写《库务日志》,登记入库时间、人员、事由、出库时间。记载库房藏品的出入情况及当日重要事项。《库务日志》由保卫部门和业务部门统一制作、编号,用完后由

保卫部门保管。库房内不准带入私人物品。

5.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监督 文物库房应安装报警探测系统和电视监控系统。如果保管员入库正常工作,应提前通知报警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控制室工作人员关闭报警系统,开启电视监控系统,监视保管员的工作情况。有条件的还可将保管员的工作情况全部录像,将录像带妥善保存。如果控制室没有接到保管员的通知,报警系统处于警戒状态,任何人入库都属非法侵入。这样,内盗分子即使能拿到库房钥匙也不敢随便进入库房,所以能有效的起到警示作用。

6. 抓好值班警卫队伍建设 说起值班警卫人员的职责,一般人都会认为他们负责在夜间和节假日期间本单位的安全。很少有人明白,值班警卫人员不仅要确保夜间和节假日期间单位的安全,还要保障在工作时间内本单位的安全。他不但要防外盗,还要防内盗。对值班警卫这个集体而言,还要防止他们这个集体中某个成员的监守自盗。也就是说,他们要对文物实行24小时的监护。不能有任何部位和任何时间出现失控现象,使内盗分子无隙可乘。可见,值班警卫队伍素质的高低,对一个单位的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位聪明的领导者,都不能不把值班警卫队伍的建设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首先,要选择道德品质好、思想作风正、责任心强、身体健壮的人从事值班警卫工作。其次,要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要把给予他们的政治经济待遇同要求他们所承担的艰巨任务相适应。再次,要制定严格的操作性较强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定期或不定期对他们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和纠正,对不称职的人员,果断进行调换。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保卫处处长)

辽

《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

通理实行补考

黄春和

通理是北京房山石经辽代后期刻经的重要发起人,辽沙门志才曾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①对其刻经情况作过详细记载,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志才塔记未予交待,亦不见别的史料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房山石经的研究者们。本刊1997年第三期刊登了包世轩先生《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一文,是对通理生平事迹的首次发现和刊布,它不仅弥补了房山石经研究的空缺,而且必将推动房山石经和北京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以下简称《观音堂记》)对通理事迹的记载又过于简略,尤其是对他创刻石经的事迹只字未提,留有诸多缺憾;辽沙门志才《塔记》称通理一生德业,“俱载宝峰本寺造行碑中”^②,很显然《观音堂记》的记载不是通理一生实行的完整记录。笔者往岁一直十分钦佩通理刻经的愿力和成就,留意于他的生平事迹搜集,搜得一些零星资料,现结合《观音堂记》的记载,对其一生重要实行略作补充考证,以求正

于包先生及诸位方家。

一、通理师承

据《观音堂记》记载,通理一生先后师事两位佛门尊宿,一位是宝峰寺崇谨:

……生有异表,幼而神俊。肆居宝峰寺崇谨为师,七岁遇恩得度,本名义从。^③

一位是永泰寺某守司徒:

幼岁曾伏二虎,百法为业,十六启讲,后习性相,靡不圆通。永泰寺守司徒欲摄为资师,资道合,方改今号。自兹左右,扞衣无倦。二十三岁从师门下。^④

可见,崇谨是通理的剃度师,通理七岁从其出家。永泰寺守司徒是其得法师,通理于十六岁时得其器识,随侍左右,扞衣无倦,终于在二十三岁时从其得法。通理从守司徒得法后,德业大进,“宗天皇太后、道宗皇帝见重,特赐紫袍,号通理焉”^⑤。很显然,永泰寺守司徒对通理影响较为重要,是决定其一生修学和成就的重要师承。遗憾的是守司徒只是当时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封

爵,并非一个具体僧人法名,受封守司徒之僧人为何许人呢?《观音堂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一是这位僧人在当时僧界地位极高,受到了朝廷对僧人的最高封爵——守司徒;二是这位受封守司徒的僧人是永泰寺僧人;三是这位守司徒活动时间据通理从其得法时间推测大致应在辽兴宗和道宗之时。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在《全辽文》中可见一条与之相关的记载:

……今□立之道□□奉行以我建塔之主沙门善隐,及迴□门资讲经论前都总□□□沙门善仙、及张□蒙民□□□□□师贡士衡李智祥□张士郎等,可以顺天子之高怀,契如来之圣意者,实其人也。□以有生天本师。大师者,俗姓齐氏,本永清县求□里齐公之季男也。自为幼童,天分灵异,不为鬻发。尔后厌居俗室,志乐空门,出家礼燕京天王寺三藏为师,遇恩受具。以后四□□□□未及行□□□律论迴出人间,大传于世。自后回礼永泰寺□守司徒疏主大师为师,口试经受具。……我师享年七十有五。……天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缘终示□……。^⑥

这条记载里不仅出现了“永泰寺守司徒”,而且还多出了“疏主”这一新的佛教学衔。那么,这位号称“疏主”的永泰寺守司徒是不是通理的得法师永泰寺守司徒呢?首先从正慧与通理参礼永泰寺守司徒时间看。通理得“永泰寺守司徒”器识在他十六岁时,依其生年推算应为1065年,即辽道宗咸雍元年。正慧参礼“永泰寺守司徒疏主大师”之后即纳具戒,由此看他当时应为20岁^⑦,依其生卒年推算,他参礼的时间应为1061年,即辽道宗清宁七年。可见通理与正慧参礼的时间仅隔四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永泰寺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位受封守司徒的僧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慧《遗行记》中称正慧是“回礼”,说明此前就已参礼过了,这样二人参礼时间就更为接近。由此分析看,他们所参之守司徒应为一入。其次从通理与正慧的门资看。正慧门资从其《遗行记》看,有善隐,善仙等,与通理门

资“善字训名”^⑧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通理与正慧在法脉上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联系到正慧与通理同参一师的经历,正慧亦应得法于永泰寺守司徒。既然通理与正慧所参师父同一,那么通理之师“永泰寺守司徒”的“疏主”身份应无疑义了。

“疏主”是一个佛教教职或称学衔。在佛教史上,对佛教经典的诠释有论、疏、钞等不同体裁的形式。论是对佛经的诠释;疏是对经、论等的全面、详细疏通;钞是对论、疏等提纲挈领式的诠释。若某一大师在某一方面造诣精深,表现出众,便会被誉为“论主”,“疏主”或“钞主”。号称“疏主”的这位永泰寺守司徒应是一位对佛教经论阐释极有造诣的佛学大师。这样,“疏主”的身份又为我们求证守司徒真实面目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

辽大安三年(1090年),高丽僧人义天^⑨自宋归国撰成《新编诸宗教藏录》(简称《义天录》)3卷,书中收录辽僧佛学著述58部,251卷。这是关于辽代佛学著述最早和最多的记录。此书于近代传入我国,目前已成为了解辽代佛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文献。考古发现主要有:1957年发掘整理的房山石经辽代刻经,^⑩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47种辽代写刻佛经,^⑪1976年河北丰润天宫寺塔发现的10种辽代刻写佛经。^⑫立足于这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看看是否能发现永泰寺守司徒疏主大师一点蛛丝马迹。

查寻的结果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意想和期望。在应县木塔发现的一部《略示戒相仪》卷末署有“燕京永泰寺崇禄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集”。据此题记提供的“守臻”之名,在《义天录》中亦可见守臻著述的记录,除《略示戒相仪》外,还有《释摩诃衍论通赞疏》10卷,《通赞科》3卷。^⑬根据《义天录》这一记录,我们又在木塔发现的佛经名目中见到了他所著《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下和《科》卷下重要物证。特别是在木塔本卷末署有“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⑭等重

要题记。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永泰寺守司徒守臻大师。这位守臻大师既是永泰寺僧人，也是守司徒，同时又是一位谙熟佛教义理，擅疏经论的佛学大师，与我们寻觅的“永泰寺守司徒”在宗教地位、佛学造诣和寺属上完全相符，应当是我们寻找的对象。但最后尚需核实一下守臻活动的时间以及他与通理之关系。

守臻活动的时间，据其疏作《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可以推定。《释摩诃衍论》是一部诠解《大乘起信论》的佛教大乘论著，由龙树菩萨造，兰陀筏提译。^⑤唐时相继有人对此论作注，但“或兴或坠，历于数朝”。^⑥至辽时道宗皇帝对此论“尤切探颐”，^⑦首先敕令乐山崇仙寺（衙署“大辽医巫闾山崇禄大夫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赐紫沙门”）志福为之作注，撰成《释摩诃衍论通玄钞》4卷，道宗亲自为之作“《引文》”。^⑧紧接着，又令中京报恩寺僧法悟（传教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诠圆通法大师赐紫沙门）为志福钞作疏，撰成《释摩诃衍论赞玄疏》5卷，《赞玄科》3卷，《大科》1卷，道宗亦亲为作序，并命“编次入华龕（《契丹藏》）”。^⑨时为辽清宁八年（1062）。守臻所撰疏作不知是否领受了道宗皇帝之命，但可以肯定与道宗的提倡密切相关。从其疏作名称看，他是对志福和法悟二人著作的通解。所谓“通赞疏”应是“通玄赞玄疏”的略称。由此可见他撰疏的时间应在志福和法悟二人之后，具体而言他作疏时间上限应为辽清宁八年，即法悟“赞玄疏”撰成时间。应县木塔发现守臻疏作卷末题记“辽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这个时间应是其完成疏作时间的下限。这个时间离清宁八年相隔10年，若从法悟于清宁元年领命作疏至八年完成的进度看，这个时间应为守臻疏成时间。守臻作疏的起始和终结时间的上限和下限既已确定，为辽清宁八年至咸雍七年，说明这个期间守臻活动在水泰寺。通理正是于此期间参礼永泰寺守司徒的，他参礼的时间是咸雍元年（1065年）。他参礼的守司徒史料未见第二位，应为守

臻无疑。另外，据守臻完成疏作时间推测，守臻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年龄上应已届中年或暮年，而当时的通理尚不满二十岁。从二人年龄之相差看，守臻为通理之师也是合乎实际的。

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终于见到了《观音堂记》“永泰寺守司徒”的庐山真面目，他就是辽道宗封为崇禄大夫、守司徒，赐紫袈裟，被当时佛教界推为“疏主”的水泰寺守臻大师。

二、通理续刻房山石经

通理一生最光辉的业绩是发起续刻房山石经，并取得巨大成就。他的刻经情况辽沙门志才所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有较详细记载：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缙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其余德业，俱载宝峰本寺遗行碑中。师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兴无缘慈，为不请友。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仕庶道俗，入山受戒。巨以数知海会之众，孰敢评之？师之化缘，实亦次之。方尽暮春，始得终罢。所获施钱，乃万余缗，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明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铸经两纸。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题名目录，具列于左。未知后代，谁更继之。又有门人讲经沙门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碑经未藏，或有残坏，遂与定师共议募功。至天庆七年，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⑩

由志才碑记看，通理于大安九年（1093）正月通过“开放戒坛”，筹集资金，届暮春时，将募得银钱万余缗交与门人善定办理刻经。时逾一载，“钱已费尽”，刻经告竣，共刻石经四千零八十片，经四十四帙。

至天庆七年(1117),其另一弟子善锐见经碑未藏,恐有残坏,又与善定共议募功,于寺西南隅“穿地为穴”,以藏石经,同时亦将道宗施资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藏于其中。穴上立塔,“刻文标记”。志才记载通理发起刻经及其弟子办理刻经与藏经的经过是相当清楚的。1957年夏,中国佛教协会会同文物部门根据天庆七年所撰《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提供的“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①的记载,找到了藏经地穴所在,经掘开地穴,发现了埋藏八百余年的辽刻石经,同时还有金代刻经,总计达一万零八十二片,^②为研究辽通理刻经提供了重要物证。

通理刻经数量巨大,蕴藏丰富,价值突出,为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汇集和保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的刻经业绩在《观音堂记》中却只字未提,要不是志才塔记称其一生德业,“俱载宝峰本寺遗行碑中”与《观音堂记》称通理“肆居宝峰寺,崇谨为师”,志才塔记载善定、善锐为通理弟子与《观音堂记》载通理“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两处互为应证,我们真无法相信和肯定两种史料所说通理究竟是否为一人。所幸的是《全辽文》收录的《崇显大师坟塔记》中也记载了通理刻经之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旁证。记曰:

师讳崇显,俗姓李氏,安次县崇福里人也。岁近韶乱,有异常童,进止施为,皆出家相。始年二十一,礼当县□□□义隆法师为师,勤奉左右。……大安初,豁然大悟曰:“市朝名利,水月空花,究之非真,在人成累。”遂罄捨衣盃,赈贫施乏,无复遗余。退访孤征,首抵王家岛。先有通理策师,止住于此。师授以达磨传心之要,一见情通,事无重告。至八年,结心相与,返诣西峰,驻锡于石经山云居寺,与师同办石经……^③

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不仅记载了通理刻经之事,而且明确点出了通理法名“策师”,证明(《观音堂记》)中“通理恒策”与志才塔

记中通理是一而非二,无疑是通理刻经的重要旁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记载还向我们提供一条通理刻经的新信息,即通经发起刻经的时间——辽大安八年(1092)。这个时间与通理大安九年“开放戒坛”前后相续,顺乎实际。这个时间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通理刻经,尤其是理解其刻经进度极有帮助。我们知道,通理刻经速度在房山石经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期年之内便刻出经碑四千零八十片。崇显坟塔记提供的这个时间足以说明通理刻经在募集资金前就已开始。据志才塔记记载通理“开放戒坛”募集资金,然后交与门人善定具体办理的程序分析,通理在大安八年开始的刻经应着重于选定经本、校勘经本,筹集各类人力及分工和安排等一系列筹备工作。房山云居寺发掘的通理刻经经过整理、研究表明,他的刻经有着十分完备的组织机构,其中包括校勘、书经和刻经的各类专业人员,计划周密、分工细致;仅“一部《智度论》总有七十八人次参加书刻”。^④无可置疑,这些周密的安排应是在大安八年时通理等人细心策划的。基于崇显坟塔记的这一记载,我们对通理刻经神速之疑虑或许可以消解一些,同时对其刻经过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三、通理驻锡地——永泰寺建置

通理一生足迹从史料记载看有宝峰寺、延福寺、永泰寺、云居寺,王华岛等处。但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永泰寺。永泰寺是通理得法和弘法之地,同时从守臻、通理、正慧、崇显等辽代高僧在此活动之情形看,它当时应是燕京佛教义学的弘传重心。可是如此重要的一座佛寺,在史料中却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颇有些令人不解,同时更越发使人想知其真实面目。鉴于史料记载之不全,这里着重考证它的建置所在。

关于永泰寺建置,现知最早的记载是明人孙承泽所撰《春明梦余录》。该书记曰:

天庆寺原辽之永泰寺，金大安中兵毁，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宣德中重修，后有高阁可望天坛。僧舍有李龙眠画罗汉十六轴。^⑧

天庆寺在清初尚存，《日下旧闻考》对它有记载：

· 天庆寺今存，在药王庙西，罗汉像则无考矣。^⑨

药王庙何在？《帝京景物略》记载了它的具体方位：

天坛之北药王庙，武清侯李诚铭立也。左碑文，恭顺侯吴惟英书也。^⑩

根据这些记载推测，永泰寺似应在今天坛西北金鱼池一带。

由上记载看，永泰寺历史沿革和寺址似乎已非常清楚了，无需再作考证。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永泰寺在辽金史料中一直未见专门记载，为何到时隔几个世纪的明朝突然有了如此明确的记载呢？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虑，笔者找到了《春明梦余录》的出处——元王恽撰《元大都创建天庆寺碑》。兹录碑文如下：

国家鼎定金燕，教隆内典。故精蓝胜利，庄严宝界，金碧相望。永泰寺肇基自辽，弥陀者，永泰之别院也。大安兵烬，废徹不存，鞠为茂草者五十余年。至元壬申，有僧雪堂始来结庵而主之。先是，师越在云朔，尝假息间，有以天庆名所栖而告之者。初不喻其故，既而观光大都，駉马高唐郡王出重币易是院为师驻锡之所。建甲申冬，皇孙噶玛拉出货泉二千五百缗泊名骡二，仍谕留守段桢、詹事丞张九思即所居庀徒葺事。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门闾庖福宾客之所，略皆完美。始于乙酉之春，成于丙戌秋仲。役初作，掘地得废钟，所刻天庆二字，考之盖有辽建号也。事梦既协，即为新寺名额。师为普仁，字仲山，姓张氏，雪堂其号也。世为许昌人。^⑪

由王恽碑文记载看，天庆寺始建于辽，原名弥陀院，为辽永泰寺的别院，辽大安时毁于战火，此后荒废达五十余年。元至元九年（1272），山西僧人普仁雪堂抵大都，駉马高

唐郡王出币购得废址，请雪堂驻锡；至元二十一年（1284），皇孙噶玛拉又出货钱二千五百缗，并令留守段桢、詹事丞张九思负责重兴寺宇。工程从至元二十二年开始，至元二十三年即告竣。因建寺时从基址掘出一口旧钟，上铸“天庆”铭款，为辽末天祚帝年号，于是便以它作为新寺名额。比较王恽碑记和《春明梦余录》“天庆寺条”记载，二者关于天庆寺辽毁元兴沿革之记载完全一致，《春明梦余录》关于天庆寺记载源于王恽碑十分明显。但是细读王恽碑记，我们不难发现《春明梦余录》却忽视了王恽碑记中一句十分重要的语句，即“弥陀者，永泰之别院也”。“别院”又称“分院”或“下院”，是主寺之分寺和属寺，弥陀院既为永泰寺的别院，而天庆寺是在弥陀院的旧址上兴建的，所以只能说天庆寺是辽之弥陀院，而说“天庆寺即辽之永泰寺”显然是张冠李戴，乖离了元碑本意。《春明梦余录》这一误记后来不断为史家袭用。但其间也有细心明眼之人，清末以考证著称的陈宗蕃在其所著《燕都丛考》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孙记的错误：

孙承泽言天庆即辽之永泰，考之王恽撰寺碑略云，永泰事肇基自辽，弥陀者永泰之别院，至元乙酉重建是院，掘地得废钟，刻“天庆”二字，即以名额。据此，则天庆为永泰别院也。^⑫

综上考证分析，天庆寺为永泰寺的说法不能成立。偌大一个北京城，永泰寺又究竟在何处呢？无望之中，笔者记起往岁读《日下旧闻考》时，在“归义寺条”下有一段关涉守臻大师的记载。该记载没有指明守臻为永泰寺僧人，现在已经考知，或许能窥得一点线索。兹节录如下：

归义寺在善果寺西，辽刹也。天王殿前一碑，无撰书人姓氏，额题弥陀邑特建起院。碑文称寺肇自清宁七年，买徐员外地，遂为归义寺，畚书寺基墙垣寻尺以及佛像经藏之数。碑阴首书疏主忏悔师守司徒纯慧大师，马紫沙门守臻，本行僧绿检校司空精修大师，赐紫沙门智清，次载邑众姓名

……^④

这段记载是于敏中引自《倚晴阁杂抄》的。录文中的“疏主忏悔师守司徒纯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⑤无疑就是我们前面考证的通理之师——永泰寺守臻。他的名字出现在“弥陀邑特建起院”碑的碑阴之首；而首题其名的碑石又何以出现在“归义寺”废址上？其中隐含之关系，值得注意。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于敏中于此记后所作的一段按语：

善果寺之西半里许有菜圃，辽碑在焉。《倚晴阁杂抄》谓其地即归义寺，以碑考之，似别为一寺，而归义寺乃在其北也。碑乃乡人众建者，绝无文理，无撰人姓名，字亦半剥落，就其可见者读之，中数行叙买地契券以归义寺为北至，不云地即归义寺也。倚晴阁杂抄云，买徐员外地遂为归义寺，想亦因碑无文理而误读耳。碑阴姓名今亦半剥落矣。^⑥

据于敏中的这段按语所说，《倚晴阁杂抄》的作者也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弥陀邑特建起院”碑记买地之事，并非为归义寺而买，而是“以归义寺为北至”。从于的按语看，他亲见了辽碑，并作了仔细辨读，他的说法应是可信的。于称“以碑文考之，似别有一寺”，这另外之寺又为何寺呢？推考起来，应非永泰寺莫属。因为“弥陀邑特建起院”碑暗含着与永泰寺极密切的关系。欲明其隐含之意，我们需要从辽代民间信佛组织——邑社入手。

邑社是辽代一种十分流行的民间奉佛组织，其形式是信徒们自愿组织起来，一般号称有千人，共同承办佛教功德事业，藉以蓄积功德，祈福消灾。其成员有邑主、邑子等。邑主一般是邑社的发起者，一般由僧人充当，参加的邑子大多是邑主劝导的弟子或信徒。一般来说，邑社都有固定的寺属，而邑主就是该寺的寺主。如云居寺谦讽大师“结一干人之社”，目的就是为了重兴云居寺；^⑦盘山祐唐寺寺主为构寺中“讲堂”，发起邑社相助，终成其愿。^⑧史料记载，云居寺邑子们“施有定额，纳有定期，贮于

寺库，补兹寺缺”，^⑨更足以说明邑社与寺庙的隶属关系。由此可见，辽代邑社是以寺庙僧侣为中心，以争取世俗社会支持的一种特殊组织。

根据辽代邑社的形式与特点，我们再来分析“弥陀邑特建起院”碑，应不难理解它的内容和隐含之意。毫无疑问，“弥陀邑”是信奉阿弥陀佛的一种邑社组织；“弥陀邑特建起院”碑是“弥陀邑”这个邑社“特建起院”功德的芳名记录，其具体内容应当是弥陀邑的邑子们共同施钱购买“地契地券”；既为邑社，应有邑主，其碑阴首题的“赐紫沙门守臻”应为邑社的发起人无疑。这些内容明确了，它的隐含之意也就昭然若揭。基于邑主守臻我们已考知他是当时永泰寺高僧，那么，弥陀邑应当是附属于永泰寺的邑社，弥陀邑邑子们共同施钱买地之义举应是在寺主守臻的劝导下为永泰寺所作的功德。反之，如果依于敏中引《倚晴阁杂抄》所说，“弥陀邑特建起院”碑所在地为归义寺，弥陀邑所作之功德是为归义寺而作，那么邑主就应当是归义寺寺主，但史料未见守臻与归义寺有何关系。显然理亏。此亦可证《倚晴阁杂抄》所记错误。

另外，据元王恽《元大都创建天庆寺碑》记载，辽时永泰寺有别院名弥陀院，从寺名看应是一座崇奉净土的道场，而“弥陀邑特建起院”中的弥陀邑也应是崇奉阿弥陀佛净土的邑社。二者崇奉内容一致，由此亦可窥见“弥陀邑特建起院”与永泰寺有非同一般之关系。

至此，如果上面的推考无误的话，永泰寺建置基本可以确定了，它应在传统所说的归义寺位置上。据《日下旧闻考》“归义寺在善果寺西”和“善果寺在今广宁门大街北巷内”^⑩两条记载推考，永泰寺应在今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核桃园东街一带。

①②⑦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金辽文》卷11。

③④⑤⑧为便于参考，又蒙包先生见告，原录文文字及标点有误，故特重录原碑文《大辽燕京西

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中通理实行如下：

永泰寺内殿忏悔主通理大师者，师讳恒策，字开玄，姓王氏，上谷矾山县新安人也。世袭农业，家积纯善。父名保寿，母名刘氏。昆季三人，第三爱子也。生有异表，幼而神俊。肄居宝峰寺，崇谨为师。七岁遇恩得度，本名义从。

幼岁曾伏二虎，百法为业，十六启讲。后习性相，靡不圆通。永泰寺守司徒欲摄为资师，资道合，方改今号。自兹左右，衲衣不倦。二十三岁从师门下。宗天皇太后、道宗皇帝见重，特赐紫袍，号通理焉。至于涿州，讲罢之日，杖锡孤征。暨至于此，结茅薙草，宴居林下；精进弥勤，心通转益；笃爱此山，朝夕无倦。五京缙素响师道风者，若葵心向日；谄决心疑者，如蚁之慕口；暂预瞻仰者，莫不消殃而致福；亲承垂训者，咸得去危而获安。可谓清凉热烦，增福之田者矣。

主上闻风，宣请为内殿忏悔主。由是外缘四备，隐志难成。坚请下山顺缘赴感，复加检校司空，牢让不受。至于永泰寺开讲，五京缙侣闻风而至，龙象学徒日不减三千之数。踞登孔雀座，启鑿玄开，玉尘挥而性相融，宣玄机叩而箭锋相拄；涌泻玄河之辩，□□乃根之机。可谓问难云兴，洪钟普应；随问应酬，疑云风卷；一口宣扬，众心开悟，□□施为成大化焉。造梵行直释三卷，记文四卷，□有遗文盛行于世。

至寿昌四年戊寅岁二月十三日寅时入灭。是时，奉圣巨桥折为两断，二岸旅人拥堵无数。其中神人太叫，唱师入灭之期，语报舍灵，用表征祥之应。寿五十，腊四十二。荼毗之日，无云雨雪，状若天口，焰门似紫莲，光明交错。双睛不烬，颌齿犹存。灵骨舍利分葬四处，各起灵塔。度菩萨戒弟子一百五十余万；皇储已下及百官等八十余人；公主、国妃已下等五十余人，并礼为师。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剃度门徒四十八人。师之灵异弥德不可具陈云尔。

⑥《忏悔正慧大师遗行记》，《全辽文》卷 11。

⑦佛教规定僧人出家年满 20 方可纳具足戒。

《四分律》卷三十四曰：“不应授年未满二十者具足戒。”

⑧义天，俗姓王，名煦，高丽文宗王第四子。出家后受封佑世僧统。北宋元祐元年（1086）自宋返国，携所求佛典一千余卷，又旁求契丹、日本等撰述，积二十年之力，整理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总五千零四十八卷，刊行四千部，此即高丽续藏经。

⑩⑫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云居寺之研究》P88。

⑪⑬《山西应县木塔发现辽代珍贵文物》、《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 年第 6 期。

⑭《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 年创刊号。

⑮《义天录》卷 3。

⑯⑰⑱道宗《释摩诃衍论通玄抄引文》，《全辽文》卷 2。

⑲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序》，《全辽文》卷 8。

⑳行鲜《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白带山志》卷 6。

㉑《崇昱大师坟塔记》，《全辽文》卷 11。

㉒任杰：《房山石经〈大智度经论〉整理记》，《房山石经之研究》P15。

㉓《春明梦余录》卷 66“天庆寺”条。

㉔《日下旧闻考》卷 58。

㉕《帝京景物略》卷 3。

㉖《日下旧闻考》卷 58 引王恽《元大都创建天庆寺碑》。

㉗陈宗蕃《燕都丛考》第 6 章《外五区各街市》。

㉘《日下旧闻考》卷 59 引《倚晴阁杂抄》。

㉙应县木塔发现的《略示戒相仪》署款称“通慧大师”，此处则称“纯慧大师”。从《倚晴阁杂抄》的可信度看，应以木塔的《略示戒相仪》所署为准。

㉚《日下旧闻考》卷 59“于敏中按”。

㉛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白带山志》卷 6。

㉜李仲宣《祐唐寺创建讲堂碑》，《全辽文》卷 5。

㉝《日下旧闻考》卷 59“归义寺”条。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保管部馆员）

尊孔、祭孔及北京国学孔庙

沈平

孔庙(文庙)是中国古代各州县必设的机构之一。与佛庙、道观不同,它非民间所创,祭祀也非民间祭仪,是我国古代诸多祭祀中与统治者的政治思想统治最密切的手段。北京孔庙是全国第二大孔庙。通过山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研究,透过祭孔现象,可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根源,以及中国社会的种种形态。

一、尊孔与祭礼

“祭祀”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是件大事。而被列入国家祭祀范围的对象,更是具有历史的,政治的重要意义。如首都北京的“九坛”“八庙”,列祖列宗,山川日月等等。它们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紧密相连,是政治统治、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佛”、“道”、“儒”中,只有儒家的始祖孔子,被列入国家祀典,香火绵延二、三千年不绝,甚至“新文化”“五四”运动兴起,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1947年北京孔庙仍在官祭孔子,今日的台湾地区,每年也在官祭孔子,而不是我们前几年搞的所谓“祭孔乐舞表演”。

公元前379年,孔子去世。第二年鲁哀公将山东曲阜孔子故居五庙“岁时奉祀”,此为最早的孔庙。据《史记》载: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曲阜以太牢

祀孔,开皇帝祭孔的先例。此后的二千多年间,孔庙遍布中国大陆,据统计,到清末,全国计有孔庙1500多座。

从文物角度研究尊孔、祭孔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礼仪制度,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尊孔推向极至。此后二千多年里,古代中国孔子在思想界处于至高无尚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与之相适应的山东孔庙的建设也不断加组升级。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特权地位不断提高。汉代以后,每个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思想上的统治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都首先在曲阜搞祭孔、朝圣的仪式,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力扶植三孔。据统计,从鲁哀公祭孔起,到清末的三千二百多年间,帝王祭孔达196次之多。^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曲阜祭孔始于西汉晚期。此后,曲阜一直是历代祭孔的中心,这种局面一直沿续到清末。

汉元帝继位于汉初元元年(前48年)下诏封孔子十三世孙孔霸为褒成宣尼公,并“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这是帝王给孔子后裔封爵和建立祭孔制度的开始。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到曲阜“以太牢祠圣师”;^②延光三年(124年)汉安帝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③永兴元

年(153年)汉桓帝下诏,为孔子“特立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负责管理孔庙,并规定孔庙的祭祀、管理、修缮费用都由国家支付。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一度玄学盛行,孔子的学说受到冷遇,祭孔和孔庙的建设也相应减少。唐初,重新树立孔子的思想为统治思想,尊奉孔子为先圣。开元初年皇帝下诏,在全国州县“皆立孔子庙”(文庙),封孔子后代为“褒圣侯”。唐玄宗李隆基时掀起一个尊孔的高潮。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把曲阜孔庙修成“闕宫霞敞,正殿岑立”^④的规模。

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把孔孟学说发展成为程朱理学。尊孔、祭孔的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北宋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亲赴曲阜祭孔;宋太宗又下诏修建孔庙;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亲到曲阜祭孔,“靴袍再拜”“祭以太牢”。^⑤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天禧二年(1018年)又下诏“大扩圣庙”、“凡增广殿庭、廊、庑,三百六十间”,^⑥曲阜孔庙的现存规模就是那时大体确定下来的。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又将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宗愿改封为“衍圣公”,世代相袭。

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特别是金、元统治者在刚刚建立政权之初,并不懂得尊孔、祭孔。但很快就采用了以汉制汉的措施,其中主要成分就是利用孔子的理论和文化加强思想文化建设。金章宗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⑦下诏修建孔庙正殿,并找来一个孔子后裔,封为“衍圣公”,出现了南宋和金朝一南一北二个“衍圣公”的局面。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至圣文宣王”。

明清两朝,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封建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尊孔、祭孔也达到历史的最高潮。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即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派遣官员专程前往曲阜祭孔,宣传承认孔府的地位“俱如历史旧制”。与此同

时,召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到南京。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致信孔克坚称:“尔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于世,经数十代,每每宾职王家……”。^⑧此后朱元璋把“衍圣公”的官员从三品升为二品,又升到一品,并拨给二千顷祭田和五百户佃户,同时拨巨资修缮曲阜孔庙。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重修孔庙并亲自撰写了《孔子庙碑》碑文中说明了尊孔祭孔的重要教化意义:

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圣治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师以达天下,并建庙学,遍赐经籍,作养士类,仪文之备,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孙,袭衍圣公,秩祖一品,世择一人为曲阜县令;立学官以教孔、颜、孟三代子孙;常幸太学,释奠孔子,竭其严敬,尊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也”。

明朝的尊孔祭孔确实如碑文中所说“超乎往昔”,历代“未有如斯之盛”。其作用和意义也如朱元璋在《为礼祀岳镇海读免祀杂神专崇孔子御碑》中说:“孔子阐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

明朝对曲阜孔庙的修缮,大小有三十多次,可见其尊孔的重视程度。同时,明朝还规定:“凡建学必立孔子庙,而以颜、曾、思、孟为配,其余孔门诸贤皆列于从祀。此国朝定制”。^⑨

清代满族要建立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必须取得汉族的支持,故清朝统治者仍然坚持和继承孔孟的精神,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础。顺治元年(1644年)山东巡抚方大猷在《恭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提出尊孔、祭孔“古来启运之主,尽有崇祀之法”。摄政王多尔袞立即批示“这本内所开各款,俱应相沿,期于优渥,以成盛典”。^⑩顺治二年(1645年)给孔子加封了最后一个封号“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亲自去曲阜祭孔,对孔子行三

跪九叩首大礼,并说:“朕今亲旨行礼,尊崇至圣,异于前代。”^⑩雍正七年(1729年)修缮曲阜孔庙,雍正皇帝亲自规定:“文庙正殿、正门用黄琉璃瓦,两庑用绿琉璃瓦,黄瓦镶边”,“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⑪乾隆皇帝从乾隆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48—1790年)先后九次亲临曲阜孔庙祭孔。^⑫

二、国学孔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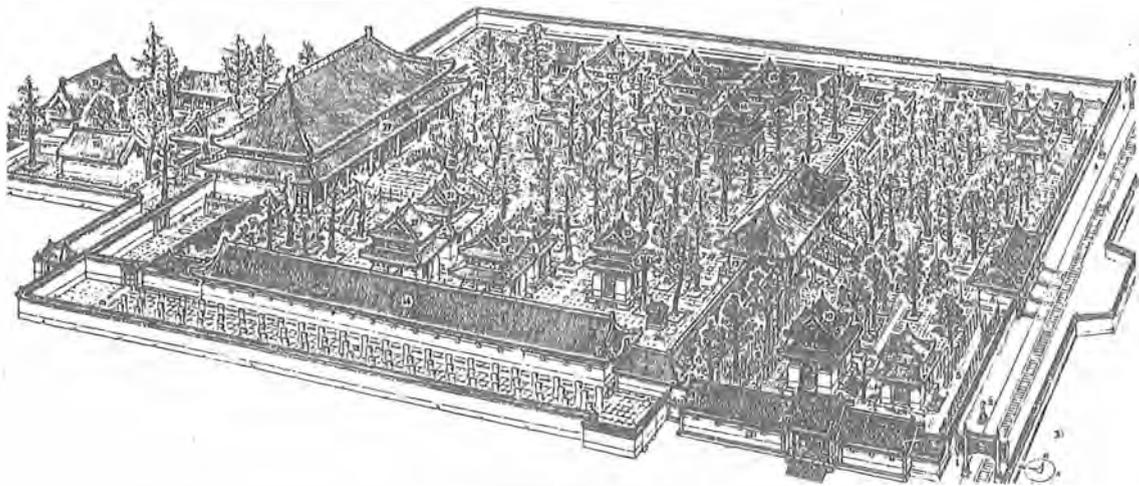
山东孔庙的祭孔活动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尊孔、祭孔的“正宗”。而包括北京孔庙在内的各地孔庙只是一个城市(地方)中必备的“官办”祭祀庙宇之一,而且孔庙往往与州学、府学、县学是一个组合。北京的国学孔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代表性的组合。

元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先圣庙”。^⑬这是目前最早的北京孔庙的文字记录。唐幽州时期,城内应有孔庙,但那时的孔庙属民间范畴,故今日无记载,也没有发现遗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唯用汉代故事,执事官则其公版执手版,丁祭变服始于此。元世祖定都北京后,至元

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设立国子学。^⑭之后,元成宗铁穆耳于大德六年(1302年)创建孔庙。大德十年(1306年)营建国子监。国子监的地址和当时兴建的孔庙相毗邻。常有文章称孔庙与国子监是“左庙右学”,是所谓“礼制”,现尚无文献根据,但庙学合一古已有之。所谓“凡始立学者,必设奠于先圣先师”。^⑮这里讲的先圣先师不单指孔子一人,而是泛指古代的圣贤。汉魏以后,曾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确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从此成定例。

北京孔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孔庙同国子监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这是文化教育所能作用和祭祀仪礼等方面区别于山东曲阜孔庙,更具京师政治、文化中心的特色。

太学和尊孔的主张都源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源于董仲舒;同时,董仲舒向朝廷建议兴建太学:“养士之道,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⑯此后二千多年太学一直是封建中央政府设置的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学校祭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始于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立有宣尼庙,各地郡学内也都立孔颜庙。



北京孔庙全图

- ①国子监街牌坊 ②下马碑 ③“钦赐学会” ④先师门 ⑤进士题名碑 ⑥明英宗太学碑及碑亭 ⑦宰牲亭 ⑧井亭 ⑨神厨 ⑩道光九年平定回疆告成太学御制文碑 ⑪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先师庙碑 ⑫神庠 ⑬大成门 ⑭东虎、西虎 ⑮—⑯明清碑亭 ⑰焚帛炉 ⑱大成殿 ⑲黜奸柏 ⑳—㉑崇圣祠 ㉒十三经刻石

元以前历朝首都太学、孔庙的组合关系不详,从元大都始,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清亡。

北京国学孔庙的密切关系,从祭祀、功名、建筑三方面可看出其的统一性。

祭孔在古时并不是最重要的祀典。在宫廷,虽然祭孔列入国家祀典,但同祭天、祭地、祭社稷、祭太庙、祭历代帝王等重大祀典相比,都显得逊色。

《社祀·曲礼》:“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象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被后人祭祀,在中国古代是必然的。

《礼记》所载立学祀典有“释奠”、“释币”、“释菜”三项。“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帛)奠享,这不是常行之礼。“释奠”,设荐俎饌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礼仪。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即作为学礼,也是祭孔礼,仪式日趋繁琐。

学校祭孔,始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立有宣尼庙(孔庙)。祭孔时,设轩悬之乐,用六佾之舞,牲牢器具依上公之例。佾,是古时乐舞的行列。春秋时使用的乐舞中,天子为八佾,每行八人;诸侯六佾,每行六人;大夫四佾,每行四人;士二佾,每行二人。佾舞代表一定等级,严禁僭越。孔子曾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⑩在唐以前,祭孔一般用六佾之舞。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孔子被封为文宣王,仲春、仲秋祭孔时曾用八佾之舞。唐宋以后,祭孔用帝王之礼。明清三际或用六佾,或用八佾,没有定制。洪武至成化年间一直用六佾,成化十二年(1476年)“增乐舞为八佾”。^⑪孔子塑像可以穿皇帝衣冠。到嘉靖时,又废除孔子所封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八佾天子之礼的规格。清顺治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用“六佾”之制,光绪三十二年,诏定祭孔为“太祀”,用八佾之舞,行帝

王礼。

祭天、祭地、祭祖每位皇帝都亲祭,也有大臣代祭。而祭孔则多是外出巡幸时在山东曲阜孔庙进行,康熙、乾隆南巡时都多次去曲阜孔庙祭孔。元明清三朝皇帝到北京孔庙祭孔都是去“视学”,即所谓“临雍”结合进行的,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临雍”。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上丁“临雍”。清代自康熙以后,每一位皇帝即位照例要到国子监讲学一次,并赐匾一方。清乾隆皇帝“临雍”的次数比较多,现北京孔庙内碑有记载。孔庙有“乾隆四年临雍记事碑”、“乾隆十四年释奠诗(碑阴)”、“乾隆二十四年释奠诗”、“乾隆三十四年释奠诗”、“乾隆四十九年御制辟雍闾水记碑”等等。《大清会典事例》记乾隆三年(1738年)“临雍”情况:“弘历三年三月二日,亲诣辟雍,释奠于先师孔子,升堂进讲,嘉与诸生,阐明圣教之本原,帝制之盛轨。”国学孔庙的组合从孔庙现存众多的碑刻中也可可见一斑。

国学孔庙的碑刻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重修庙碑、功德碑;二是进士题名碑。重修庙碑和功德碑有14块;明英宗建太学碑、清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先师庙并颁周彝器瑜旨碑、清光绪九年平定回疆告成太学御制文碑、清康熙二十五年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清康熙二十八年御制四子赞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御制文碑、清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御制文碑、雍正六年躬祭文庙御制诗碑、清乾隆四年临雍纪事碑、清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御制文碑、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御制文碑、清乾隆四十一年平定西金川告成太学御制文碑、清乾隆三十四年重修文庙御制文碑。14块碑中,告成太学碑、建太学碑共7块,这些本应立于太学国子监院内的碑却立在孔庙院内,是否这两座院落是不分彼我。

与庙碑情况相似的是进士题名碑。进士题名源于唐代雁塔题名,以后历代相沿。元代定都北京后,于皇庆二年(1313年)开

科取士,中进士者将姓名刻碑上立于孔庙。明代又磨去元碑字,刻明代进士名,因此,孔庙除在清代康熙年间挖掘出3块元碑外,孔庙现存进士题名碑均为明清两代。计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明代进士题名碑77块;清顺治三年起(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清代进士题名碑118块;元、明、清合计198块,记载了51624名进士姓名、籍贯及名次。进士题名碑立于孔庙寓意着“学而优则仕”,及对先师尊崇。这些进士虽然并不都是由国子监培养出来的,在明代初年,由监生做官的还都出自南京的国子监,他们大多数还是通过国学或州、府、县学的途径而进入仕途。进士题名碑也是对国子监学子的激励。

国学孔庙位于元明清三朝内城,建筑面积很大。孔庙依制,主要建筑有大成殿,东西配殿和崇圣祠;国子监比孔庙占地大,主要建筑有辟雍、泮池、彝伦堂及绳愆、博士、典籍四厅和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和御书楼、敬一亭等。明清时期,监外尚有斋号多至600余间。国学孔庙两组建筑一墙之隔,有门相通,在两组院落之间有一夹道称“埂F垣”。国学孔庙两组组合二而一的建筑采用黄琉璃瓦的最高建筑等级,雄据北京城一隅。依照礼制,二者的功能也是一致的。学与仕、儒家的思想反映在庙学合一的建筑格局上,是种完美的结合。庙学结合成为一种通制,在全国很普遍,就在北京另有一处明清顺天府学也是与文庙在一起。今东城府学胡同尚有文庙大殿和府学旧址。

三、孔庙的衰落

尊孔、祭孔与国学孔庙,是中国古代封建时期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物资形式也是时代的象征,随着封建制度的

解体,这些内容和形式也必然被淘汰,而不是更新。

尊孔、祭孔与国学孔庙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国内战争、还是朝廷更迭,儒学与孔庙都处于官方的位置,长盛不衰。孔子学说长期盘踞在至尊的地位,尊孔、祭孔在维系封建统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二千多年古代社会的稳定因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也给了孔子儒学及国学孔庙以巨大的冲击。中间曾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搞的尊孔、祭孔的闹剧。“五四”运动给了儒学和孔庙以致命的打击。国学解散了,祭孔也时断时续,到四十年代末最后终止了。

研究尊孔、祭孔与国学孔庙要注意的是它们是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思想现象,而不是宗教现象,与古代诸神的祭祀,与佛道教祭祀,与祖先的祭祀都有显著的区别。对此,我们只是通过孔庙这一载体,保存、研究这一传统文化,“继承”、“宏扬”、“发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①《曲阜观览·帝王祭庙考》

②《后汉书·孔僖传》

③《后汉书·安帝纪》

④唐大历八年《文宣王庙新民记》碑

⑤《宋史·真宗纪》

⑥《阙里志》

⑦《金史·熙宗纪》

⑧《孔氏宗谱》明成化刊本

⑨《吴县志》卷二十六上;《文庙》

⑩《孔府档案》七九之三

⑪昭代丛书《出山异数记》

⑫《曲阜县志》雍正七年上谕

⑬《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七,《礼部·中祀》

⑭⑮《元史·选举志》

⑯《礼记·文王世子》

⑰《汉书·董仲舒传》

⑱《论语·八佾》

⑲《明史·乐典》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府学胡同 36 号和交道口南大街 136 号两院房屋毗连,当初本属一人的宅第,实是一宅两院。因而收二合一,于 1984 年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此两院同为清代晚期建筑,其布局形制《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已略有所述,此不再赘述,仅将略知的沿革和传说事实介绍于后。

一、清末兵部尚书志和的宅第

《天咫偶闻》：“(麒麟碑胡同)巷北为志尚书和第,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后有土山,山上树数围,后墙外即顺天府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兵部尚书志和,住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此宅极广,分路东、路北两部分。”二书分别记述了宅第的范围、位置,与现今所见是相符的。只是两院门户均有改变。

另外,80 年代初文物工作队去该院调查时,当时院方负责总务的同志曾提及该院有志和的老房契,(惜当时未曾一观)进一步证实该院是志和原宅第的一部分。

二、志和其族、其人

志和属满洲费莫氏。费莫氏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其族宦宦辈出,代有名人,诚如《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言:“其族代有传人,四世凡有大学士数人。计乾隆朝有温福,嘉庆朝有勒保,道光朝讷尔经额,咸丰朝有文庆,光绪朝有文煜。故其家有一印,曰‘三代四大学士之家’。其实有五人焉。”《朝野杂记》却忽略了,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温达溢文简也属费莫氏。以上均属费莫氏族人,其中只有武英殿大学士文煜为近支,是其叔父。

文煜居宅位于帽儿胡同,宅侧有园名可园,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园中有“可园记”石碣一座,为志和撰文,文中有“余家自高、曾以来,世以清白受国恩,吾祖光禄公治谋滋大,先考荣禄公,历官台鼎,家无积私,士林称焉。叔父继之,由西曹出任监司,荐至方伯,所至有廉名。……”最后落款为“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第三侄男志和谨记。”从此记中明确了志和和文煜的叔侄关系。

志和父文蔚，《清史列传》有传，言及其父（即志和祖父）名富兆，曾任福州副都统。文蔚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年间自侍讲学士晋至署左都御史，后以参赞大臣督剿英吉利海船不利革职。咸丰初起用为驻藏大臣，后授奉天府尹。咸丰五年（1855年）亡故。

志和本人，受其祖上余荫，很早就已发迹。咸丰二年进士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一路风顺，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咸丰十一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此后，同治、光绪间转任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光绪五年（1879年）晋左都御史，六年迁理藩院尚书，七年迁兵部尚书至光绪九年初受弹劾而被革职，旋死亡。

三、志和宅第与增旧园两不相属

自《燕都丛考》于“铁狮子胡同”注中刊载了《增旧园记》，即有人怀疑志和宅是否和增旧园有关，或为增旧园的后半部分。这从志和宅和增旧园的建筑体系不难看出。

志和宅位麒麟碑胡同路北和路东，路北宅虽亦华好深邃，仍属于一般住宅。而路东住宅则属其主宅，正门三间向西，中启广亮大门，门前左右列雕云马的上马石一对。穿堂门三间南向，此后厅事五间，进垂花门属内宅部分。此为正中一院。又有东、西两院。西院是民国年间根据用途另行改建的大型四合院，原建制不详。东院则属原建，虽已大部改建、添建，尚可窥原貌。属花园部分，花厅、静室敞厅犹存，穿廊亦已恢复。据《天咫偶闻》住宅后尚有土山，山上有树数园，后墙外即顺天府学。纵观此宅，建制规格较高，非一般士夫所能有。正门的形制，上马石的设置。更有厅事的建制，在清朝是非一、二品大员所不能有的。清朝晚期虽然纲纪不振，法制松弛，但若建筑逾制，不究则已，若有人举报弹劾，仍是难逃罪责。如《春明梦录》载光绪年间，内务府郎中庆宽家门口设下马石，按

品级须三品以上才能设置，而郎中只正五品，因而以违制，照例革职。志和宅有上马石、前院并有厅事，自应是在咸丰年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后的事，志和一直辗转于二品官员中任职，其中在内务府和兼崇文门税务监督时应属肥缺，积聚钱财也应以此时为多。因而此宅即属是继承了其父文蔚的旧宅，也是志和在咸丰、同治时新建或改建的。

由于此宅院东院之南和正院前庭之东和增旧园只一墙之隔，即认为此宅和增旧园曾属一宅是不确的。增旧园位于铁狮子胡同西口北侧，即孙中山逝世纪念地。关于此地晚报曾载冯其利君一文，述及始末。

《增旧园记》是该园主人富察敦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所记。文中有：“道光末年先考竹溪公由鸭儿胡同析居后，购以万金，因其基而修缮之。”“庚子之变、联兵入京”、“斯园也，以弹丸之地，居兵燹之中，虽获瓦全……”可知园建于道光末，也未遭八国联军的破坏。直至民国初年售出。志和宅不过比增旧园稍晚些年。光绪二十九年完稿的《天咫偶闻》和更晚成书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均言志和宅院落宽广、屋宇深邃华好。也是未遭联军破坏，完整无损。可知此二宅虽是一墙之隔，而是各不相干并存的两座宅第。

四、张勇宅辨

据《增旧园记》：“增旧园，名天春园，在安定门街东铁狮子胡同。乃康熙间靖逆侯张勇之故宅也。当明季之世，宅为田贵妃母家。”由于此记，误导人们认为增旧园原来即是清初张勇宅和明末田贵妃娘家宅，也就联想到只一墙之隔的志和宅当初可能和增旧园同属一体，均是张勇宅或田宅的宅地。是否如此，今分别述后以明之。

张勇本为明朝之副将，清入关后投降。为清朝转战南北，镇压农民军和明朝降将的叛乱，最后平定陕甘，战功颇巨，屡有封赏。官至提督加少保、太子太师封靖逆侯，

赐宅于京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卒于军,赐祭葬,谥襄壮。

《增旧园记》载其宅第在铁狮子胡同,却有不同说法。《天咫偶闻》载:“靖逆侯张勇第在西直门街,侯之勋,已具国史,后裔尚能守世业。”也是《天咫偶闻》另一条记载:“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以余所见,如续顺公沈氏、靖海侯施氏,皆数易其居,赁屋以处。至今未易者,唯佟府、福文襄后人、果毅公后人,张靖逆后人尚是旧第耳。”自以上可知《天咫偶闻》非常清楚的记载了张勇宅第位于西直门大街,直至清末其后嗣也未易第,仍居原处。

《增旧园记》作者敦崇和《天咫偶闻》作者震钧同是清末人物,同有著作问世(敦崇有《燕京岁时记》《皇室见闻》等书)。也同样留心北京掌故、风物,可能专注点不同,而震钧对北京历史、时事的了解则更丰富、翔实。诚如其本人所言:“世居京师,习闻琐事,”当有所得时,即“信手条记”。因而对当时世家兴衰知之颇多。张勇赐第在西直门街,应是可信的。另外,据《乾隆京城全图》,此带尚未形成今日所见的格局,也无较高规格的宅第。张勇后裔,世守其业,宅第并未变更,显然张勇宅第不在此处。从而证明增旧园与志和宅与张勇宅第毫无关系。

五、田弘遇宅辨

《增旧园记》又言其地为田贵妃母家宅第,更属无稽之谈。《天咫偶闻》受吴梅村所作《田家铁狮歌》的影响,以有铁狮为据,也怀疑田宅在铁狮子胡同。

田贵妃是在明崇祯皇帝即位后封礼妃,进皇贵妃,其父田弘遇官左都督。所赐宅第,自清初文人的一些记载可约略知其方位。

1.《明季北略》卷二十载:“贼尽放马兵入城,乱入人家,诺将军望高门大第,即入掘之,刘宗敏据田弘遇第。”(引自李自成入

宫条)

“宗敏之门立二柱,礲人无虚日,日便服入西华门。”(二十四日壬子条)

“共绑八百余员,五人一连,俱押锁田皇亲府中,著刘宗敏用挟棍拷打。”“牛金星点名会极门,用者从东华门出,不用者从西华门出,兵露刃排马,押系刘、李二贼私寓。”(拷夹百官条)

以上记载皆可证明田宅在西城,且距西华门不能太远,由刘宗敏每日便服入西华门可知。

2.《北游录》纪卹下记载:“辛亥,早发为海淀之游,入宣武门大街,火之,道侧铁狮二。元元贞十年彰德路造,先朝都督田弘遇赐第。狮当其门,今门堙而狮如故也。吴骏公堂作歌,寻策蹇出西直门。”

该记也说明田宅在西城,并在大街一直北行,始见路旁的田宅。

3.《旧京遗事》载:“田皇亲居第在西安门,即太监王体乾之旧宅,都人称为铁狮,故元贵家门前狮也,今在田家云。”此则具体指出田宅位于西安门一带。

从上述记载综合观之,即可判知田宅的大概位置,应自宣武门以北的大街,直至和西安门外丁字街相交处,即今甘石桥以北缸瓦市路东一侧。清初的巽王府和乾隆时的定王府,可能即在此基地上扩建。

田弘遇宅若在此,与东城的增旧园和志和宅无缘。

六、明代英国公张园

田弘遇宅在西城,那么此地又何属?

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铁狮子胡同位于仁寿坊,但铁狮子胡同有何名堂,文献无明确记载,直到晚清《天咫偶闻》记述志和宅时提及志和宅“后有土山,山上树数园,后墙外即顺天府学。《帝京景物略》谓‘英国公园北临柴市’疑即此地。”首先认作此地或是英国公宅园。

英国公是张辅的封爵,正统时随英宗北征也先,歿于土木堡之役。其子张懋历

掌营府，握兵柄四十年。

《日下旧闻考》只言东城有英国公园。但它引载了正德年间薛蕙《晏故英国公山亭，即文皇帝赐第诗》一首。有“东第君王赐，西园宾客来”之句。告知宅园乃太宗文皇帝朱棣所赐，住宅位东，园林在西。但对宅园的所在位置则未载明。《帝京景物略》不只描述了园内景物，对宅园具体方位也提供了线索。

《帝京景物略》英国公赐第“一高楼，南临街”。“台之望，古柴市，今文庙也。”古柴市指元代柴市，明人记载多以为府学胡同一带是南宋丞相文天祥就义之地柴市。明初于此建祠以奉祀。祠西即府学，凡府学均伴有文庙。言登台可望文庙，自是由南往北望，且须距离较近，始能尽收眼底。说明了宅园北侧即文庙，南临街自是铁狮子胡同。

《帝京景物略》载“亭北临水，桥之，水从西南入”。园中之水，从西南引入，水道或是今麒麟碑胡同的前身。《乾隆京城全图》尚无胡同的绘制（见附图），显见胡同形成很晚。清代明后，张园荒废，水亦断流，河道淹没逐渐夷为平地，随水道走向，两侧建房，形成胡同。胡同内曾有麒麟浮雕屏形石壁一座。有人认为是古宅门前照壁，不如说是张园遗留的镇物更贴切。它是汉唐以来天禄、辟邪的遗迹。浮雕为鳞身双角，似狮若麟，俗称麒麟碑。胡同亦由此得名。此石雕今保存于鼓楼大厅内。

《帝京景物略》又记园中“东圃方方，蔬畦也，其取道直，可射。”张氏武将世家，张懋更以善射名，自有演武习射的场所。蔬圃应在宅园后部东侧，为射箭而设直道，可知东圃范围之广。东圃占地非小，亦只是宅园中的小部分。宅园之大亦可想而知。占地面积，可东起剪刀巷，西止安内大街。南北如前述，南临街，北倚庙，是一座方正深广的宅园（参见标题图）。终明之世，张氏袭封国公皆居于此。

清代，此地带划为正白旗满洲官兵的居址。初时旗民房屋买卖有禁，嘉庆后，纲

纪松弛，房地交易渐增。志和宅与增旧园即晚清兴建的，两宅占地颇广阔，但它们只是原英国公园的一部分。

七、元代遗址

前述明代铁狮子胡同属仁寿坊，元代也有仁寿坊，二地是否相承，尚待求证。不过，可以肯定铁狮子胡同，是因有元代铁狮得名。麒麟碑胡同南口原有铁狮，据朱家溍夫人生前言是两对。40年代初，将一对较完整的铁狮移至鼓楼正门前，胸前铸有元代年号（普查档案当有记录）。由于日渐破损。60年代初又移至广化寺内保存，双方经手人均逝世，下落不明。同一地点又有石狮一对，80年代移至妙应寺内陈列。

元代，豪门、衙署门前已有列狮的风尚。元末著作《析津志》载：“都中显宦税课之家，解（廨）库门前，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凿成，亦如上安顿。”从而可知英国公园于元代非衙署即豪贵府第。

《帝京景物略》载张园内“亭傍二石，奇质，元内府镇也，上刻元年月，下刻元玺，当赐第时，二石与俱矣！”说明赐第与张辅时，宅内已有元代内府镇石。由此点更可证明此处是元代极高规格的府第，乃至王府。

赵其昌同志曾言及，在今文物局后院（即志和第前院）地表下发现元代堆积层有二三米厚，尚未见生土，存有大量的陶瓷砖瓦等残碎遗物。综上所述，足以证明英国公张园的前身于元代是一重要遗址。

以上所述，由铁狮子胡同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始，至府学胡同的广大地域，可上溯至元代，即为官署或府邸。到明代则属英国公张家的宅第。至清代此地带则荒芜，成为八旗的驻地。此后法禁松弛逐渐形成个人宅第。至于言其地于明代或清初属田威畹和张勇之赐第，纯属传说，未加深索。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退休干部）

谈

《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

和余棨昌

王晓静

1992年9月,我馆从北京市西城区德内西顺城街60号征集到一方刻石,石为嵌墙横石,其长、高、厚分别为84、40、10厘米。碑文楷书,首题“北平余氏宗祠记”,由洪谔撰文,陈继圣书丹。刻石部分文字漫漶,全文应存587字,每行17字,实存550字。

北京西城区德内西顺城街60号过去的建筑多已拆除,现为新建的仿古建筑。《北平余氏宗祠记》中记载的“构堂三楹,祠旁筑小楼……登斯楼也,泛湖烟景,近纳于槛楹,西山爽气,远挹于几案”的风貌已无从寻觅,文中又说:“乃卜净业湖太平庵旧址为□□余氏宗祠”(笔者按:净业湖即今西海),说明余氏宗祠即太平庵所在地,那么,德内西顺城街60号是否为余氏宗祠也即太平庵旧址呢?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记载,德内西顺城街东西走向,东起德

胜门内大街,西至西海西沿,全长640米,门牌为4—62号。清代称西水关,1965年改称今名,1981年新建德胜门西大街时,北侧房屋全部拆除,南侧尚留部分平房住宅,与德胜门西大街混为一体。明崇祯七年(1634年)的《重修太平庵碑记》说太平庵在“德胜门西不半里”,“背城临湖”,《北平庙宇通检》又提到太平庵位于“德内西水关五号”,从碑文和文献记载太平庵的景观和我们的实地踏勘可以推知德内西顺城街60号可能是余氏宗祠的原址,也即太平庵旧址。不过,太平庵虽说“庵小而洁”,^①规模应较仅有一祠堂、一小楼的余氏宗祠为大,这从《重修太平庵碑记》中记载的庵距德胜门“西不半里”,而余氏宗祠所在地的60号院约距德胜门一华里亦可推测出来。太平庵为明代王聚洲所建,称滇省香火院,相传草创经始,直塹回塘,掘出片石,勒“太平

庵”三字，因以名庵。崇祯七年重修，并有杨方盛撰写的《重修太平庵碑记》石碑一通。《日下旧闻考》辑录部分碑文，《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有此碑的拓片，惜原碑已无觅处。碑文记述了太平庵“背城临湖，可数顷许。每秋夏之间，接天莲叶，向日荷花，四顾送青，满波输绿”，^②当为北京内城一处胜迹。《顺天府志》、《畿辅通志》、《宸垣识略》、《燕都游览志》、《燕都丛考》等书均有关于太平庵的记载，但1936年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所记太平庵“今仅破殿二间”，已是残破不堪了，至1941年余燊昌在太平庵旧址修建余氏宗祠时，这座历明清两代有数百年历史的庙宇终不复存在了，而这一段史迹却罕有记载。《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恰可补充北京史志这方面的阙如。

北平余氏宗祠是曾任民国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的余燊昌所建，碑文叙述了余氏家族的源流及修建祠堂的缘起。由碑文可知余燊昌入仕前，余氏家族并不显赫，他的祖父宝甫于咸丰年间由绍兴迁居北京，迁居原因及其父祖从事职业未提及，只是讲余燊昌做官前“家贫无一瓯之植、一椽之庇”，“家贫”之辞应是自谦，余燊昌在《故都变迁纪略·自序》中说“幼时侍先夫人省觐先外王母于台湾，因依先舅维卿先生读书于台南北官署者数年，弱冠游学日本者又数年”，可知他的家境不会太困窘，但也由此推知他不大可能出身官宦家庭，否则碑文中及其它记载不会只字不提。而在碑文中反复提起与绍兴余氏同宗的诸暨余氏的一位远祖“浣公”，即余缙，字仲绅，号浣公，大观堂，为顺治年间进士，官至河南道御史，著有《大观堂集》。余燊昌由于偶然机缘从琉璃厂得到一份诸暨余氏祠堂碑铭，得知绍兴余氏乃诸暨余氏之分支，碑铭中提到余缙修建了诸暨余氏祠堂，他由是受到启示而萌生修建北平余氏祠堂之意。当然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出身寒门的余燊昌曾官至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如碑文所述“迨戟门大理起而门

乃大，于是京师论族望者必首屈余氏焉”，这样的身份足以光耀门庭，告祭乃祖了。

《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为我们提供了余氏家族的渊源及迁徙流布的简略历史，对研究中国的姓氏、谱系及近代人口流动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余燊昌这位曾在现代史上有过一定影响却为人忽略的人物。

余燊昌字戟门，游学日本十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清政府户部主事。民国成立后，他历任法制局参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官训练处兼法典编纂委员会顾问、大理院庭长兼推事、司法讲习所长、修定法律馆顾问。1923年至1927年任大理院长兼司法官惩戒委员长，还担任过修订法律馆总裁，并于1925年至1926年间起草了民律二草的总则。他还任过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政府成立后，余燊昌摒辍政事，开始了讲学著述生涯，曾任北平太学法学院教授，著述颇丰。主要有《民法亲属编》（1927年）、《票据法》、《民法要论物权》（1931年）、《民法要论亲属》（1932年）、《民法要论总则》（1933年）、《故都变迁纪略》（1940年）及与李祖虞、余绍宋合著的《实用司法令辑要》（1919年）等。

余燊昌受过系统的近代法学教育，又长期在司法部门供职，直至升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而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正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初创并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法制方面的反映亦十分深刻。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机关到司法机关，从根本法、选举法到商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建设，虽说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开榛辟樾、承先启后之功实不可没，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南京政府的立法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余燊昌是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位法学家，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主持民律二草的修订工作，并起

草其总则。

民国成立后,在北洋政府十六年的统治中先后设立了法典编纂会、法律编查会,民国七年(1918年)又改设修订法律馆进行法典的编纂工作。修订法律馆置总裁二人,不久改为一入,“董康、王宠惠、罗文干、江庸、马德润、余荣昌、石志泉诸氏相继任总裁”,“该馆参详前清民律草案,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①先后订定的法典草案有《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票据法草案》、《破产法草案》、《公司法草案》以及民律之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草案(即民律二草)。上述法典由于有清末各项法典草案作基础,又参考了国外的最新立法例,因此较清末立法为成熟,对嗣后南京政府的立法贡献尤大,是我国近代立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法是现代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之一,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北洋政府初期沿用清民律草案(即民律一草),1915年法律编查会编成亲属编,1925年至1926年由修订法律馆完成民律的总则、债、物权、继承、亲属各编,是为民律二草。余荣昌任过法律修订馆的顾问和总裁,参与了民法典的修订工作,并起草了民律二草的总则,虽然民律二草由于北洋政府的垮台而未能成为正式的民法典,但它较民律一草为完善,对南京政府的民法典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也由此窥见余氏在当时法律界的地位及对立法史的贡献。

其二,余荣昌曾任大理院院长数年。大理院是北洋政府最高审判机关,院长由总统特任,“总理全院事务并监督其行政事务”,“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审判”。^②大理院院长对法律有解释之权,可谓位高权重,民国成立后的十数年间,正是法律改良发展的时期,各级法院对于民事刑事案件疑义颇多,于是:“大理院之解释亦不厌长篇累牍,论述学理、引证事实,备极精

详”。^③民律二草的亲属、继承两编中曾加进了历年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的内容,南京政府的立法也参考和引用了大理院解释例,“于国民政府之下,除与现行法令抵触外,仍能一律援用”。^④可见大理院在近代立法史上所起的作用亦不可小觑。余氏任大理院院长凡五年,其间他曾处理过多少疑难案件,他的解释和判例对当时及以后的立法有过哪些方面的具体影响,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无论如何,余荣昌在近代立法史上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其三,致力于法学主要是民法学的教育与研究。余荣昌在民国初年即任职余暇在学校兼课,1927年以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摒谢政事,壹志于讲学”,^⑤主要教授民法学,“迄今从余学业成者约数千人”,^⑥可谓桃李满天下了。他还对民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当时中国的法律界重实行而轻理论研究,余氏把他在民法理论方面的研究所得按民法典的章节编次成书即“民法要论”,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等编,对当时的民法研究有一定的影响,时人“多引集鄙说,转惠士林,群和众擎,斯道日盛,筭路褴褛,余实首致力焉”。^⑦他可说是较早进行民法理论探讨的法学家之一。

此外,余荣昌于1940年撰写了《故都变迁纪略》,记述了1900年至1937年间北京的名称、城垣、旧皇城、内城、外城、郊垌等方面变迁的掌故,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北京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余荣昌是我国近代立法史上对民法的制订和研究都有较重要贡献的一位法学家,但有关他的记述很少,又无专门的记载,《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为研究余荣昌提供了重要线索。

①②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第85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③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95页,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

④余荣昌等编:《实用司法令辑要》(第一编·

官制·官规》，1919年汪仁宝刊行本。

⑤⑥郭卫编：《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编辑缘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1年版。

⑦见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北平余氏宗祠记》。

⑧⑨余肇昌：《民法要论总则·自序》，北平朝阳学院出版部，193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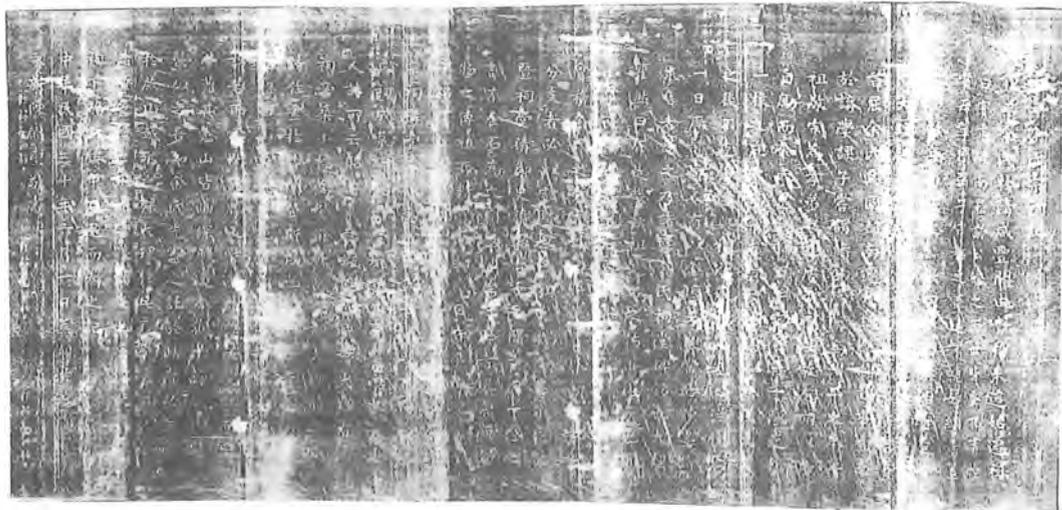
附：北平余氏宗祠记

北平余氏于清咸丰间由会稽来迁始迁祖曰宝甫公而崧龄公继之两世皆蚤孤育于贤母单门弱子宗祏之绵延不绝如线者盖五十余年自崧龄公举四子而族始繁迨戟门大理起而门乃大于是京师论族望者必首屈余氏焉国都南迁大理摒谢政事壹志于请学课子当谓修身齐家为治平之本尊祖敬宗为孝弟之□居常以此教人亦以此自励而余氏□□师百年家贫无一陇之植一椽之庇家□□未立大理每以身从大夫之后不克□□典礼以□祀其先心滋愧焉一日厂肆贾人有以金坛王□常给谏墨迹求售者读之乃诸暨余氏祠堂碑铭也大理瞿然曰有是哉□祖浣公之佑启

小子也则小子所以继先□而追孝道者其在斯乎盖会稽余氏之□□曰诸暨来迁则为会稽之分支者必以诸暨为远祖矣浣公创勅建诸暨祠堂清御史讳□者□□闻□人一念之诚有金石为之开□神为之降者况宗庙文物之傅祖孙精□□□感召者乎大理既得碑铭乃卜净业湖太平庵旧址为□□余氏宗祠构堂三楹为位□诫士公以下□建祀焉祠成摹碑铭于堂□□其□□以□示后人讳所云昭兹来□绳□□武□大理有焉祠旁筑小楼为祭余饮餽□□大理时时吟诗作画于其间登斯楼也泛湖烟景近纳于槛楹西山爽气远挹于几案镛昔当游会稽访若耶云门诸胜又当游诸暨泛浣江而望芒罗其溪山皆幽深旷远今观于敬业湖髣似之吾知余氏先灵之托于此者必无感于燕山越水之殊大理于此不啻拜祠宇于诸暨会稽也不亦踴躍满志也乎镛既瞻拜祠下觴咏楼中乃特而为之记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一日芜湖洪镛敬撰
永新陈继圣敬书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北平余氏宗祠记》石刻拓片

白塔寺

周围环境整治纪实

王辅宇

白塔寺始建于元朝，原名大圣寿万安寺，明朝天顺元年重修，改称妙应寺，寺内因有一座元朝巨大白塔，所以又俗称白塔寺。寺由寺院殿堂和塔院两部分组成。

1961年3月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文物部门在塔上安装了避雷针，1965年对塔进行了修缮。1969年白塔寺的门被拆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使白塔的顶部被震坏。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元朝著名建筑，1978年秋，国家对白塔及4座殿堂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全部维修工程于1980年夏季结束。

1980年9月成立了白塔寺文物保管所，白塔寺正式对外开放，曾先后举办了《白塔寺文物展览》、《北京民俗展览》等等。1987年9月16日，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前来礼塔，看到白塔保存完好，十分高兴。他们兴致勃勃地绕塔观看，在白塔寺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一、白塔寺整体格局的被破坏

在1969年—1970年9月，为建“西城区白塔寺副食品商场”，拆除了白塔寺山门和钟鼓楼。商场于1971年建成，占庙产地

约 2000 平方米,这不仅使白塔寺变得格局不全,而且也给开放和接待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由于没有山门,只好从胡同里临时开了个偏门进寺,而胡同口的通道,经常因商场的货车装卸货物而不通。这样,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不是找不到入口,就是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严重地影响了白塔寺的参观人数。

寺院东西配殿和其两侧的厢房(约 1300 平方米)及塔院两边耳房,全被居民占用。据 1980 年统计有 43 户。寺内筑一临时围墙,围墙内侧紧靠着陈列珍贵文物的殿堂,外侧密集着居民自盖的小厨房,成为白塔寺火灾的重大隐患。

白塔寺只剩下中轴线上四个殿堂和一座白塔,完全不成格局。

二、周总理关心白塔寺的维修工作

1972 年 3 月 28 日,周总理在外交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建议修复广济寺佛教庙供外事活动使用的补充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修复广济寺,重修尼泊尔工程师为我建筑的西城区白塔寺,不作庙宇,只作古迹看待,专供游览”。1973 年 12 月尼泊尔国王访华时,曾提出要到白塔寺礼塔,当时寺庙既无通道又极残破,无法接待贵宾。周总理只好对客人讲:等修好后,请你们再来。据西城区白塔寺副食商场的同志讲,1975 年周总理又提出过修白塔寺之事,后来因总理病重未能实现。

三、白塔寺周围环境的整治

(一)问题的提出

1980 年 1 月 19 日市文物局给市政府写报告,提出白塔寺作为旅游点开放,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白塔寺两廊为西城区房管局安排的 43 户居民住用,山门被拆除,新建了一个副食商场,因而给开放带来极大的困难。短期内搬迁副食商场和安置

43 户居民比较困难。但东廊的 13 户居民应在 1980 年 3 月底以前由西城区予以安置迁出。以解决对外开放所需要的起码用房。二是西廊的 30 户居民和堵在该寺门口的副食商场应由西城区人民政府逐步安置迁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1980 年 3 月 11 日批复中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白塔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加强保护,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市人民政府同意整修开放。由市文物局负责办理。第二,当前影响开放的主要问题是住在寺内的居民和寺门口的副食商场需要搬迁。由市文物局会同有关区、局共商解决办法和步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做好搬迁工作。第三,今后,不得再有新的机构、住户进驻和扩大使用寺内房地。

同时,白塔寺作为一个旅游点,经过检查发现紧靠白塔西侧的豆制品厂建有一座烟囱(烟囱高达 30 米,仅距白塔 20 米),每日生产排出大量黑烟,将白塔熏黑了,且严重污染附近的环境。

市计委 1980 年 10 月 23 日给市二商局下达西城豆制品厂迁建计划任务书。决定该厂搬迁另行建设。新建厂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4500 平方米以内,总投资控制在 170 万元以内,其中市统筹投资 100 万元,自筹投资 70 万元。1980 年先进行选址、征地、规划设计等施工前准备工作。原址作为白塔寺游览配套绿化用地。望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尽早实现搬迁。

(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1991 年 11 月西城豆制品厂的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原厂址的移交工作却根本没有进行。原豆制品厂的生产车间变成了库房,原办公楼改成了职工宿舍,市政府搬迁豆制品厂的决定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据现场调查,豆制品公司于 1991 年 9 月份将 30 多户职工迁入本应腾退的豆制品厂原址内,并私自建 7 处厨房还对部分厂房进行了翻建。

(三) 促进问题解决的方法

1992年2月19日下午,市文物局会同西城区规划局检查科、西城区文化文物局、西城区文物管理所、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和北京市豆制品公司就位于白塔寺西侧原西城豆制品厂的搬迁整治问题,在白塔寺文物保管所内召开了现场座谈会。会上对豆制品公司私自新建和翻建房屋,在市政府已明确要腾退、拆除的建筑里迁入新住户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市原豆制品公司负责人表示要尽快与文物部门商定豆制品厂的移交问题。

(四) 领导支持使问题得以逐步解决

1992年4月24日,市文物局将豆制品公司将职工家属迁进原厂房,原厂址无法全部移交文物部门的情况向市政府做了汇报。1992年5月16日何鲁丽副市长当即批示给市二商局:“首先请该厂停止搬迁居民,协助该厂解决搬迁腾退中的问题,尽快完成腾退工作为好”。

1993年4月11日,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邀集市食品工贸集团(原市二商局)、西城区政府、市规划局、市文物局有关领导,就落实西城区豆制品厂搬迁问题的提案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尽快腾退白塔寺西侧豆制品厂,是落实北京市总体规划的重要一步,各方面应本着团结、协作、积极主动的原则作出努力。会议决定:1. 由市豆制品公司尽快向西城公安分局提出冻结宫门口东岔道24号、28号院的户口,西城区政府、市食品工贸集团协助督促办理,于1994年3月15日正式冻结两院户口。2. 市规划局于1994年3月22日前商请有关部门提出为腾退宫门口东岔道24号、28号而在市豆制品厂内建搬迁楼的规划方案。3. 搬迁费用及建搬迁楼资金原则由市食品工贸集团负责,如果资金不足报请市政府予以

解决。4. 搬迁和腾退宫门口东岔道24号、28号院的全部工作应于1995年底完成。市食品工贸集团负责监督、检查搬迁工作的具体实施。市文物局负责组织24号、28号院的接收工作。

北京市人民政府1995年批准的《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中对白塔寺提出的保护要求,是市文物局和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逐步整治白塔寺周围环境,搬迁有关单位及居民,恢复山门,开辟防火通道。使白塔寺面临阜成门大街,重现历史风貌,便于国内外游人参观游览。

在市政府及各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市文物局和西城区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对白塔寺地区的改造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注。西城区政府于1997年1月成立了由常务副区长杨胜博任组长的白塔寺小区改造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李炳华书记和王长连区长也曾多次听取汇报,参加项目实施中有关问题的研究。

(五)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西城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调下,在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和帮助下,历经六个月的连续奋战和艰苦努力,成功地进行了白塔寺一期居民搬迁和白塔寺副食商场接收与拆除的实施。

为了全力支持市文物局对原白塔寺山门的复建工作,西城区人民政府现将已搬迁腾退后的白塔寺东夹道甲21号、23号、乙21号院内,共计:古建房屋21间,其它房屋15间,临建房屋28间,占地约1373平方米,建筑面积909平方米;已拆除后的原白塔寺副食商场场地,占地约1686平方米,全部移交给市文物局。市文物局将进行白塔寺山门的复建工程。

恢复山门,亮出白塔,这一多年来的愿望,即将变成现实。

北京市人民

北京市
西城
(1992)京文物

北京市计划委

(80)京计基字第

关于
应立即停止

关于西城豆制品厂迁建计:

市文物事业管理)

市文物事业 市政府:
白塔寺是全
游点需解决寺
市政府领导 地”。
一、在 西城豆制
事业发展 完成。但工厂
从而使市政

市二商局,

你局(80)二商(基储)字63

品厂对白塔寺白塔的污染问题,根据市
关部门研究,决定该厂搬迁另行建设。

新建厂总建筑面积控制在四千五百平
十万元以内,其中市统建

白塔寺整治工作大事记

时间	内容	文号
1972.3.11.	外交部给北京市革委会发文告知周总理批示: “同意修复广济寺,重修尼泊尔工程师为我建筑的 西城白塔寺,不作寺庙,只作古迹看待,专供 游览。”	(72)部亚发字第234号
1979.5.16	市文物局向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进行白 塔寺二期修缮工程的报告。	(79)文物文字第48号
1979.11.24	市文物局向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议搬迁西 城豆制品厂烟囱的报告。	(79)文物文字第01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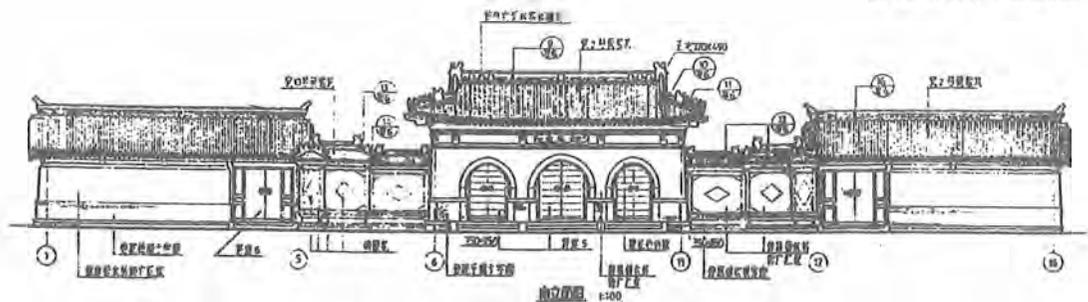
1980.1.19	市文物局向市政府发出关于开放白塔寺为旅游点需解决寺内住户搬迁问题的请示。	(80)文物博字第 8 号
1980.3.11	市政府办公厅向市文物局、房管局、西城区革委会就白塔寺搬迁问题发出批复通知。	(1980)厅秘字第 6 号
1980.7.8	市政府办公厅向西城区革委会、市房管局发出批复通知,白介夫副市长批示近期需要努力解决的是把白塔寺内几十户居民逐步搬出。	(1980)厅秘字第 24 号
1980.10.23	市计委向市二商局下达关于西城豆制品厂迁建计划任务书批复新建厂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4500 平方米以内,总投资控制在 170 万元以内,其中市统筹投资 100 万元,自筹投资 70 万元。	(80)京计基字第 636 号
1989.4.4	市文物局向市政府提出关于“白塔寺山门问题呼吁书”一事的调查报告。	(89)京文物字 130 号
1991.11.24	市文物局向市二商局二次发函,要求尽快落实京计基字 636 号文件。	(91)京文物字第 364 号
1992.1.23	市文物局向市二商局再次发函,要求尽快落实京计基字 636 号文件。	(92)京文物字第 026 号
1992.2.18	市文物局文物处、法制处会同西城规划局检查科、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城建科检查豆制品厂延迟搬迁及违章建房,回迁居民问题,并请市豆制品公司领导到场召开现场座谈会。	座谈会纪要
1992.3.30	市文物局孔繁峙副局长约市二商局豆制品总公司领导到白塔寺谈判西城豆制品厂搬迁问题。	
1992.4.1	市二商局基建处、工业处处长及市豆制品总公司经理来我局商谈腾退西城豆制品厂址问题,提出该厂困难,要求缓办,补资金不足,强调新厂因环保部门验收不了,旧厂无法腾退。	
1992.4.8	市二商局向市政府上报《关于我局豆制品厂迁建存在问题和意见的报告》。	(92)二商基字 157 号
1992.4.24	市文物局、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向市政府上报《关于要求市二商局所属豆制品公司应立即停止向原西城豆制品厂迁进住户的请示》。	(92)京文物字第 115 号
1992.5.15	市政府 1992 年第 108 期“昨日市情”刊登反映白塔寺豆制品厂搬迁工作历时 10 年未能解决问题。何鲁丽副市长为此批示:“郭力、金鲁同志,请共同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此信息由西城区人民政府上报并反映,详见“昨日市情”

1992.5.16	何鲁丽副市长对市文物局、西城区政府联合请示作出批示。原文如下：“郭力同志，首先请该厂应停止搬入居民，您局应按80年市府的决定，协助该厂解决腾退中的问题，尽快完成腾退工作为好……”	市政府办公厅公交批办单
1992.6.29	市文物局向市政府办公厅上报《关于5月15日第108期“昨日市情”〈市政府全面开放白塔寺的方案应尽快落实〉前一阶段工作办理情况的报告》。	(92)见京文物字第223号
1993.6.3	市文物局陪同市政协部分委员在张明义、张廉云主席主持下视察白塔寺及豆制品厂。再次要求该厂尽快落实市政府1980年京计基字636号文件，并要求清查1992年重新搬进院的17户居民是怎样搬进去的，重申拆除寺前副食店，恢复原有格局。	李志坚同志对199期转报的批示
1993.7.3	市政协《诤友》第45期发表《解决老大难问题要“老大”说话——部分市政协委员对全国重点文物白塔寺保护工作提出批评》	《诤友》45期
1993.7.15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立《关于西城区豆制品厂应尽早把白塔寺西路地区腾退出来案》封明为同志在提案批办单上，作出批示（以党派提案立案）。	见批办单
1993.8.21	市文物局答复市政协委员视察白塔寺所提意见建议。向市政协上报《政协委员对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建议的报告》同时抄报何副市长。	(1993)京文物字第297号
1993.9.21	我局再次与市食品工贸集团联系并收到该集团上报市政府的《关于北京市豆制品厂迁建及存在问题的情况报告》的抄送件及市豆制品公司附送的《关于市豆制品工厂迁建存在问题和意见的报告》。	食工贸(办)发(93)302号及93京豆工(办)字第117号
1993.9.23	针对食品工贸集团抄送我局的上述两个文，我局向市政府上报《关于解决市豆制品工厂整治搬迁问题的请示》。	(1993)京文物字第326号
1993.10.7	市领导何鲁丽、孟学农对市文物局上报的326号文下达批示：“请郭力同志阅，并直接和王金鲁同志交换意见上报”。	10.7市政府办公厅公文批办单

1993.11.5	为落实孟学农、何鲁丽副市长的批示,市文物局王金鲁局长到市二商局会商白塔寺豆制品厂腾退问题,市食品工贸集团总经理郭力及书记王九龄等参加会商,双方共同议定:由市豆制品总公司在海淀区市豆制六厂院里割出一块地,由市文物局协助建职工宿舍,以解决白塔寺豆制品厂职工搬迁问题具体问题尚待与市规划局协商。	
1993年底	根据11月5日王金鲁局长与食品工贸集团总经理郭力同志会商精神,我局同市规划局就利用市豆制品六厂后面空地建楼一事进行了联系,市规划局提示,该厂位于西三环路旁,前部厂区包括现状办公楼及锅炉房均在规划红线以内,为了弥补将来马路拓宽造成该厂的损失,特予留这块地作为迁建红线内的建筑所用。从用地性质上看不应建宿舍楼,目前划地正式手续尚未办理。市豆制品公司现已表示除此在其它地方无地可选,方案亦无调整可能,故此方案暂时搁浅。	
1994.3.11	市政协封明为副主席主持召开协调会,解决白塔寺西侧豆制品厂搬迁问题,市政府、西城区政府,西城文化文物局、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二商局等参加会议,最后封明为提出:1.请规划局尽快在市豆制品厂规划出解决白塔寺西侧38户居民的搬迁用地问题(十天之内解决)。2.由市二商局负责的西城区公安分局提出冻结户口的申请报告。3.由市二商局负责解决搬迁居民的建房和资金问题。	详见“会议纪要”
1994.6.20	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向市政府发出《关于解决搬迁西城区豆制品厂建设商业住宅楼资金的请示》。	食工贸(基)发(1994)207号
1994.7.4	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就上述文批示:“查清报市政府后落实情况和问题告我”。	批示
1996.4.18	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向西城区计经委、建委发出《关于白塔寺地区危房改造立项的请示》。	金建开报(1996)第38号
1996.9.13	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给陈书栋秘书长发出《关于白塔寺地区危房改造立项的请示》。	金建开报(1996)第115号

1996.9.25	陈书栋秘书长就上述请示批示：“百发同志此事西城区政府很重视，我会同李炳华及市计委、建委、规划委等听取过一次汇报，拟同意立项，当否，请审批。”	批示
1996.10.3	张百发副市长就上述请示批示：“同意”。	批示
1996.10.8	陈书栋秘书长就上述请示又批示：“请市计委协助立项，规划局协助办理规划手续。”“请张燕生同志尽快与市委商定办理立项手续。”	批示
1996.11.12	北京市危旧房改造办公室批准白塔寺危改小区立项。市文物局参与了白塔寺危改小区方案的研究、审定工作。	
1997.1.22	市文物局致函西城区人民政府，要求在制订白塔寺危改地区总体规划方案中应先期研究解决道路红线问题，以保证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1997)京文物字第 029 号
1997.2.25	西城区计经委、建委就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关于申请白塔寺危旧房改造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批复：“白塔寺地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要充分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性质，按市、区政府要求，‘九五’期间要完成白塔寺等国家级重点文物景点的保护利用，力争取得明显进展。”	西计基字(1997)第 8 号 西建基字(1997)第 5 号
1997.2.28	西城区委副书记李雅清、常务副区长杨胜博、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等召开白塔寺地区旧城改建规划研讨会，讨论了“白塔寺地区旧城改建详细规划”方案。	会议纪要
1997.3.14	市文物局致函市规划局请协助尽快办理白塔寺危改小区腾退文物用地的有关手续。	(1997)京文物字第 109 号
1997.5.8	西城区人民政府、市文物局联合向市政府发出《关于办理白塔寺庙内腾退文物用地拆迁手续的请示》。	西政报(1997)11 号
1997.10.23	市文物局致函市规划局商洽关于白塔寺危改小区规划建设高度事。	(1997)京文物字第 547 号
1997.12.2	西城区区长刘志华与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双方签署《移交白塔寺已腾退建筑和用地的备忘录》。	(备忘录)
至此，恢复白塔寺山门、钟鼓楼，再现其历史原貌的理想开始变为现实。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干部)



略谈复建中的白塔寺

王春城

妙应寺白塔是我国现存较早较大的一座藏式佛塔,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9年西城区副食管理处将山门钟鼓楼拆除,盖建副食商场。导致成一次建设性的破坏。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打开山门,亮出白塔”工程,由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承办。1997年6月17日西城区人民政府组成的搬迁办公室进入白塔寺文物保管所,由此拉开了白塔寺复建工程的序幕。11月初居住在正式房19间,临建房45间,建筑面积909平方米的39户居民全部搬迁完毕。接着又拆除了占地约1686平方米的白塔寺副食商场。12月2日在白塔寺山门遗址上召开了西城区人民政府向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移交白塔寺已腾退建筑和用地共3059平方米的现场会。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梅宁华,西城区区长刘志华代表承接和移交单位签署了备忘录。

为了此次复建工程的顺利进行,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于1997年9月20

日依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6月妙应寺平面测绘图,山门、钟楼、鼓楼历史照片,设计出了白塔寺山门、钟楼、鼓楼设计图纸。并在居民搬迁及白塔寺副食商场拆除完毕后又进行了一次次的实地测量,获得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当然复建工程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山门的具体位置在哪?有人提出修建白塔寺山门要在今后阜成门内大街的改造利用留有余地,所以山门要在原位置基础上后退12米左右。还有,白塔寺副食商场拆除后的地面比寺内地面高约1.7米,要是在现有地面上复建山门,从街面上看山门会显得雄伟壮观,但在寺内看山门高于天王殿极为不协调。另外,山门两侧的倒座房长度是多少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研究解决。为此12月8日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进入白塔寺后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地探明地下埋藏山门遗址、倒座房以及钟、鼓楼的具体方位。12月13日原有地基轮廓基本找出来,前面地面距台明1.1米,后面1.3米,前后台明至后台明边5.8米,开间面宽3.3米,

稍间3.1米。两天后原有山门基础基本查清,台明长12米,宽6.05米,后台明至地平的坡长73厘米,前台明到地平的坡长30厘米。礅磋前后基本完整,前面原有基础地平与现有地面差1.15米,后基础地平比原地面低2.1米,马路与基础落差1.6米。为复建工程提供了准确的数据。12月30日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白塔寺组织召开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参加的现场论证会,就山门复建工程存在的三个问题,(一)现有地坪与院内地坪高低差;(二)马路规划;(三)排水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按原址、原貌、原建筑高度进行复建,关于排水问题可以采用提升井的方式解决。会议确定了按原址复建、工程队进行保护性挖掘多余的土方,尽力保护地下埋藏文物的方针。

1998年1月8日工地上大规模地使用机械起土,倒座房、钟、鼓楼遗址相继也挖了出来,并在山门遗址发现了元、明、清的瓷器标本,如元代钧窑碗,明宣德青花瓷砖以及大量建筑物件和重达2吨左右的青石四眼井口。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发现“敕赐妙应寺禅林”的石额,为此我们走访了50多位居住在白塔寺周围几十年的老住房,始终未找到敕赐妙应寺禅林的石额。

在实际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工程与设计图纸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山门西侧倒座房的西山墙被西边的白塔寺百货商场楼房所叠压。东侧的倒座房的东山墙被白塔寺东夹道所叠压。为此2月24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技术交底会,根据出土遗址的现状对照设计图纸进行了又一次修正。①山门图纸设计进深5.2米,面阔12米,现存地基进深5.4米,面阔12.03米,应按现存尺寸复建。②山门倒座房两端被路面及建筑物所叠压的部位相应进行了减少,如:西侧倒座房四间改为三间半,东侧倒座房因为要考虑到消防通道的因素由四间改为1间半。③钟鼓楼尺寸按现存尺寸进行调整后出图方可施工。④保持原山门遗址前的礅

磋比山门后的礅磋高的现状。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在复建白塔寺山门时,阜成门内大街路面已高于白塔寺地面,当时的山门就采用前后礅磋坡长度不等方式解决路面与寺庙的落差问题。

在这次妙应寺山门、钟鼓楼的复建施工中为确保复建工程的质量,各项工程技术指标均采用传统工艺,对各项技术也有很高的要求:

1.大木:要选用黄花松自然干燥木材。凡砌入墙体的木构件均涂刷两道防腐剂。大木榫卯部位要严密,严禁外严内松,抱头梁露出柱身部位紧贴柱身加铁穿锁锁定。……

2.地面:山门条石铺墁,钟、鼓楼及倒座房方砖细墁。

3.墙身:高度从东夹道地坪以上2.9米。砖雕花内容采用传统式样。吻兽按明清式样烧制成形。

关于白塔寺东路修缮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长期为居民使用,受到人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建筑物本身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檐口全部糟朽,弯垂下沉,室内大木脱榫,檩有滚动现象,柱根糟朽严重,天王殿两侧倒座房已荡然无存,东夹道比寺内地坪高2.06米等。为使东路建筑保存长久,我们制定了后檐柱采用混凝土柱,其它各柱仍为木柱的方案。为探寻天王殿倒座房的原貌,我们采取了挖掘地下遗址与参照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师全图中白塔寺平面图相结合的方法,为设计单位提供了准确的科学依据,从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憾。

此次复建工程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挖掘土方和拆除临时建筑的渣土5,000立方,所用木料350余立方,仅山门上的挑檐石料就用了45立方,重20余吨。

目前白塔寺复建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

(作者为白塔寺文物保管所所长、副研究馆员)



漫谈《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

秋 石

北京的白塔寺，是一座元代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寺内的“意珠心境”殿，展陈的《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为这座古刹再添异彩。

跨进《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的门槛，顿时令人置身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那雪域高原的激情与古朴厚重都被融汇在这近万尊的藏式佛像中。这次展出的佛像，是首都博物馆历年收集整理。庞大的造像数量及不同的铸造年代、地域和风格，构成了这座举世罕见的佛教造像艺术宫殿。

一、藏传佛教的来源及发展

密宗是藏传佛教的最重要标志。在释迦牟尼时代，佛教是相当理性化、哲学化和伦理化的。释迦牟尼当时主要宣传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等，这些都是关于人生的道理，所以，原始佛教，尚不能算宗教。

进入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其教义各有所发挥，到了晚期，它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一些观念，并结合佛教高层次的教义理论，形成了早期密教，史称“杂密”。七世纪中叶以后，形成了中期和晚期密教，史称“纯密”和“左道密”。

密宗传入西藏有确切史料可证的是赞

普赤松德赞(公元742—797年)时期,当时印度的大咒师莲花生,把密教引入西藏,可称开山之祖,并最终使佛教压倒西藏地方教——苯教,取得正统地位。最后,朗达玛继赞普位,并开展灭佛运动(公元841年),史称的前弘期结束。

公元987年,西藏佛教再度兴起,这时的佛教更具有地方特色。后因修行方式、传承等不同,产生了许多派别,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等。十三世纪以后,各派纷争,真学实修者日少,至十五世纪,史称“后弘期”结束。

十五世纪,西藏宗教领袖宗喀巴大师,实行改革,创立格鲁派,西藏教风又为之一变。格鲁巴集团形成后,独立的寺庙经济发展膨胀,打破了地域界限,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教派,取得了西藏的政治领导权。格鲁派的创立与执政,标志着藏传佛教发展的高峰,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的布局

如上所述,释迦牟尼在世,佛教尚不能算宗教,也就不会产生供人膜拜的佛像。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佛像也大量出现。七世纪,密教传入西藏后,因其教义的玄奥和西藏地域的特殊性,使藏传佛像显得千姿百态。这项展览的陈列面积为100多平方米,陈列的佛像分别为元、明、清三代所造,地域包括藏、蒙、汉、尼等地。

展出的目的,使观众在参观之初,对佛像的类别有一个基本了解,对佛、佛母、菩萨、度母、明王、护法等基本形象和简单特点有一个初步印象。为了尊重佛教的习惯,设计者对佛像的位置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展厅北墙,总体为如来相。正中心为仿金刚宝座主尊为明代铜鍍金释迦牟尼佛像,高135公分。背后格子龕中陈列28公分的三世佛、五方佛、三十五佛等。西侧中心上方主尊为明代铜鍍金阿弥陀佛像,高约60公分,两肋龕中亦为阿弥陀佛像,阶

梯上分别摆放释迦佛主像、五方佛及无量诸佛。东侧中心主尊明代铜鍍金弥勒佛像,高约60公分,左右肋龕为燃灯佛和弥勒佛像。阶梯上分别为佛陀说法相和弥勒佛。

西墙为秘密佛像。正中心为明代金剛萨埵像,高52公分。两肋为莲花生和宗喀巴像。四周环绕金剛萨埵像。左侧中心为明代金剛持像,两肋为大黑天、忿怒莲花生像。四周环绕金剛持像。右侧中心明代文殊菩萨像,高45公分。四周环绕为文殊像。三组上方陈列为三方佛、五方佛、下方陈列各种护法神像。

东墙为莲花净土众圣。正中心为明代无量寿佛像,55公分。两肋为尊胜佛母和白度母,合称长寿三尊,四周环绕各种无量寿佛。左侧中心为清代十一面观音像,除左侧有一层十一面观音像外,余皆为白度母像。右侧中心为明代四臂观音像,高约35公分。下为明代绿度母像。除上方和右侧中有一层四臂观音像,其余均为绿度母像。

南墙分为二部分。西侧为佛造像的种类,东侧为造像的地域风格。西侧中心展台分别展示为:佛、祖师、本尊、秘密佛、明王、护法等;背景部分,中心最上方为五方佛,依次而下为三十五佛,小型佛造像,四周边沿为释迦佛像。南墙东侧大体分成尼泊尔、尼——藏、藏西、藏中、内蒙古、外蒙古和北京风格。其它部分与西侧布局类似。

展厅四角有二种形式。东南和西南角用一种类似藏密坛城的形式,表现佛、菩萨等在密教中的地位。西北和与东北角为阶梯式陈列,西北角主尊为明代长寿佛像,余皆五方佛三世佛等;东北角主尊为明代不动佛,其下台阶除五方佛、三方佛外,余皆释迦佛、不动佛和药师佛等。

殿内共8根大柱,依柱作成六面体仿塔式柜,分9层和13层两种,每层面大多陈列佛像3尊。以前后左右为序,内容是护法;祖师和本尊;观音菩萨;佛母、空行母

和菩萨；佛造像的常见手印；长寿佛；造像的常见姿态、标识、坐骑等。

布局结构大致如此。

三、藏传佛造像的艺术特点

《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所展出的藏传佛像。由于密法的秘不可知，深不可测，佛造像又作为其载体，所以，佛教徒除致力于此项研究的专家之外，很难明白其奥义。但较外在的内容还有其规律性。最简单的如造像的种类：

如来相(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等)菩萨相(观音、文殊、普贤、长寿佛菩萨装)比丘相(罗汉、祖师、弟子等)护法神相(大威德金刚、大黑天、不动明王等)天人相(四大天王、梵天、帝释、摩利支天等)

其他还有人间相、各种神怪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十分独特的形象：

寂静相和忿怒相。

密教认为，佛、菩萨可呈现三种身，即自性轮身、正法轮身、教令轮身。

自性轮身：本地之佛体，为法身。正法轮身：现菩萨之身，为真实报身。这二种身为寂静相，容易让人接受。如佛陀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等等。

比较特殊的是忿怒相。它是佛、菩萨现明王相，用以吓退外敌，警醒众生，摧毁一切烦恼令入如来体性。它的形象复杂，面目吓人，含义也十分广，并且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怖畏金刚，为阿弥陀佛的教令轮身，一说法力无边文殊化身。佛经记载，它又是释迦牟尼在须弥山的再现，据说南方出现了极其凶暴的阎王，因而佛呈现出凶恶的怖畏金刚形象去镇压它。其含义为，9个头代表9类佛法；每个头各有3只眼，代表洞察三时的慧眼，无所不见之意，头发上指代表向着佛地，34臂，代表菩萨成佛除身、语、意外，还有34条修持法，16条腿代表16种性；遍体披人骨珠串，象征一切善的功德都全了，佩带人骨骷髅，一方面

象征世事无常，另一方面象征战胜恶魔和死亡等等。再进一步还有其它许多含义。

另外，象救主像、吉祥女以及显示镇慑之法，面呈水牛头模样的阎罗“法王”；脚踏“作恶者”具有四头的“四面怙主”等等，这些都是各种样子的忿怒相，或者说是密宗教义的充分展示。

其次，双身佛像，俗称欢喜佛。一般认为，由于密宗受到印度的性力派影响，以男女双身大乐为成佛捷径，称双修法。女像被尊称佛母、空行母、汉译明妃，但双身像并非全是呈忿怒相，有些表情也很愉悦。密教徒认为，双身法是密宗大法，到第三灌方可实修(密宗修持的等级)也有的仅用观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佛教发展史的寓言。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印度有四大种姓十个等级。释迦牟尼虽出生刹帝利贵族，却有相当的平民思想，他一生宣传破除一切不平等。这必然与统治者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及其结果表现在双身佛像上。具体地说，古印度贵族所崇奉的婆罗门教寺院，名叫“大自在天宫”，而佛经把足踏那对夫妇称为“大自在天夫妇”；怀抱的少妇都是面貌清秀，修肩细腰，珠宝满身，贵族气十足，这些都是对婆罗门“异教徒”的影射，但并不是说把异教徒的男性杀掉，妇人供淫乐，相反，它是用表示和平亲爱好感的手段向俘虏施行说服教育，劝其皈依，大有化“干戈为玉帛”之意，如果不从，则把他的头颅割下挂在脖子上，显示自己的勇猛，如“金刚勇士仁乐王佛”，把头颅穿成顶链，挂在脖子上。这些都形象地反映出与婆罗门斗争的情景。

上述情形是否就是谜底，尚不得而知，仅供参考。

纵览藏传佛像的造型，可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虽然都是虚无缥缈，本质却是社会生活现实的写照，反映着藏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也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智慧的结晶。

(作者为白塔寺文物保管所副所长)

妙应寺白塔与具六神通殿

伯祚

京城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有一座庙宇，元代称“大圣寿万安寺”，明代改称“妙应寺”，因寺内有一座闻名于世的白塔，寺因塔名，妙应寺也就随之被人们称为“白塔寺”了。

进入白塔寺山门，漫步前行，便看到一座以红墙围成的单独院落——塔院。拾级以登，门额曰：“敕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这是一座幽深静谧的小院，院内苍松翠柏，古楸参天，气象庄重。雄伟高大的释迦舍利灵通宝塔位于院中央偏北，闻名遐迩，引人神往。为供奉神祇和法器，在白塔四角又各建一座角亭。白塔的前面有一座三世佛殿（具六神通殿），镂花门窗、朱红涂抹、贴金彩画，古意盎然。

白塔始建于元朝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由当时入仕之朝的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奉敕参加修建。这座白塔，既为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又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而“坐镇都邑”，当它凌空而起时，京师的市容为之生辉，“金城玉塔”的盛名轰动一时。释迦舍利造塔八万四千，据佛经载，世界八万四千塔之中，大者有八，北京白塔为世界八大塔之一。

白塔的形制渊源于古印度的窣堵波式佛塔，是一座典型的藏式佛塔，气势雄伟、古朴浑厚、巍峨壮观。塔体为砖石结构，通高 50.9 米，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塔基地座面积 810 平方米，分三层折角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体，有 7 条大铁箍紧紧环绕在塔身上。塔身与塔基的结合处，雕有 24 个突起的莲瓣围成莲座，莲座上有内迭 5 道环带形的金刚圈，使方形塔基自然过渡到圆形塔身。塔刹的底座是一层小须弥座，上面是一个硕长的下大上小 13 道水平轮圈的圆锥体刹身，即所谓的“十三天”，也称相轮。顶层是一个直径为 9.7 米的厚木衬底的铜质华盖，又名宝盖、天盘，其周沿垂挂着 36 片带有佛字等图案的铜质透雕的华鬘，下面各悬吊着一个风铃。刹顶是一个铜鎏金空心小型喇嘛塔，将窣堵波这种佛教信仰的标志作了极高的表现，其高

度与坡度恰好与“十三天”成为一个整体，制度之巧，古今罕有。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划界为寺址，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占地约 20 亩（约合 16 万平方米），建起了“一如内廷之制”的众多殿堂，后来寺院遭雷火焚毁，到明代天顺元年（公元 1457 年）重建寺院，占地缩小到 1.3 万平方米，形成了前寺后塔的以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建筑格局，昔日面目皆非，又经多次重修，最终形成了清代的建筑艺术风格。历史上，白塔寺香火旺盛，庙会闻名，是老北京人所喜爱的游憩

去处。

塔院内的三世佛殿，因在大殿内有一块清代乾隆皇帝手书的匾额“具六神通”，故大殿又被称作“具六神通殿”。这是一座面阔三间灰筒瓦调大脊歇山顶式的建筑，古朴肃穆，雄伟庄严。大殿内供奉着三尊清代乾隆时期雕塑的木质金漆三世佛像。东西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幅佛教密宗的布质绘画，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叫作“唐卡”，上面绘制着佛菩萨及其为救渡六道众生而变化的各种形象。无量寿佛、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绿度母、大白伞盖佛母、狮面佛母、大威德金刚、马头明王和白马神等八



具六神通殿外景图



具六神通殿内景图

幅画像均为清朝宫廷藏品。大殿左右两侧的供桌上有两座佛龛，龛内供有金铜藏传佛像两尊：一尊是明朝末年铸造的无量寿佛，另一尊是元代铸造的金刚萨埵。大殿释迦牟尼佛前供桌的左侧，放置一只供寺庙主持落座的朱漆扶手椅，甚为庄重，另外还有五供、铜铃等法器。整个大殿内的陈设，多为清代乾隆时期的法物、法器。在大殿正中上方高悬乾隆皇帝的御匾“具六神通”，匾上刻有篆体“乾隆御笔之宝”六字玺印，笔势遒劲，风格洒脱，是一件珍贵的书法、篆刻艺术作品。

据佛教经书记述，神通，也作神力、通力和神通力，指通过修持禅定所得到的—种神秘灵力。六种神通的内容有：

一、神足通，身能飞天入地，出入三界，变化自在。

二、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死此生彼”、苦乐境地及世界的一切种种形色。

三、灭耳通，能闻听六道众生的苦乐忧喜语言和世间的种种声音。

四、他心通，能知晓六道众生心中所念之事。

五、宿命通，能知晓自身和众生的一、二、三世乃至百、千、万世的宿命和所作之事。

六、漏尽通，得此通力，即断一切烦恼惑业，永远摆脱生死轮回。

佛教经书载：“圣者修三学（指戒学即戒律，定学即禅定，慧学即智慧）而得六通，外道仙人修禅定而得五通”。“虽六通中第六唯圣，然其前五异生（指凡夫）亦得”。这就是说，三乘（引导教化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或教说，一般称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圣者才能具有六种神通，其余六道众生，虽然经过修持禅定，也只能得到前五种神通。为何得到第六“漏尽通”不容易呢？这里的“漏”，竟为烦恼，指的是贪欲、瞋恚、愚痴，是根本的或者说是主要的烦恼，佛教称之为“三毒”，也是产生诸“苦”的原因，因为有烦恼惑业，并贯串于“三世轮回”的始终，故使得众生都“留住”在三界

内而不能摆脱“生死轮回”。所以，要想断灭世俗诸苦，脱离生死轮回，离开三界，就要进入佛门，按照显宗说法，以经、律、论三藏去修持禅定，转变认识，断绝欲望，才能断灭一切烦恼，求得解脱，直至涅槃。看来人世间的凡夫俗子，要想得到前五种神通，不知要经过多少劫难，修持到何年何月，而要想得到第六种神通“漏尽通”，成为圣者，几乎为不可能的了。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大约在我国春秋时期孔子的生卒年代），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在这悠悠两千年、迢迢数万里的传播与发展中，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社会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释迦牟尼住世及佛灭不久的原始佛教时代，佛教尚不能算是宗教，只是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大乘佛教的兴起，释迦牟尼才逐渐脱离了历史的人格性，较变为宗教的崇拜的偶像，并将其推向了超历史、超人格化的地位，由是导出释迦牟尼佛、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并排列组合出了过去七佛、三身佛、三世佛、五方佛等等诸多如来。按照佛教神祇的身份，四圣六凡的等级，创造出了释迦牟尼佛陀的一大家族。譬如，属于菩萨一级的有文殊、观世音、普贤、地藏、大势至等，而佛母、明王、明妃、度母、罗汉、金刚、护法神等均属于这一大家族的范畴，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并对他们赋予了种种传说与神话，在佛传经典中有着大量的记述。

从最早原始信仰，到后来传入的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宗教、历史和艺术多重价值，而且又在不同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我们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一定要提高人们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佛教信仰者不仅要行善却恶，向上进取，还要爱教爱国，支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

（作者为白塔寺文物保管所业务干部）

读觉生寺《大钟歌》质疑

——浅析明“永乐大钟”成因

赵润华

悬挂于北京觉生寺大钟楼内的永乐大钟,以其铸造年代久远,铸造工艺精湛,形体巨大,铭文浩繁,音韵雄浑,文化内涵丰富而被称为“世界钟王”。

在论述永乐大钟成因的众多文章诗歌中,尤以清朝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御制觉生寺《大钟歌》最为突出。《大钟歌》为歌行体诗,全诗共计 58 句,从钟的成因到钟的迁徙都有描述:

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
都城百尺燕飞入,齐黄群榜为奸凶。
成王安在乃定案,夹辅公旦焉可同。
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
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诘赖佛氏钟。
……

“忏悔诘赖佛氏钟”,即是乾隆皇帝通过诗文表达的对“永乐大钟”铸造成因的论述。这一观点也被一些研究人员所认同,但本人对乾隆皇帝的结论有不同的认识,下面作者即想通过本文说明这一点。

一、觉生寺《大钟歌》与“靖难之役”

乾隆皇帝《大钟歌》开篇即为“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晁谋”指西汉景帝时晁错所献的削藩之策,此处借指明初建文帝时的削藩之举。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于 1368 年建立明朝,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他的统治。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所有权力统归皇帝掌握。但他还是不放心,总认为将帅之官不是朱家皇室的人靠不住。为了朱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他决定分封诸王,屏藩王室。于是在洪

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将其儿孙分封各地,使北方重镇和全国著名城邑几乎都在诸王的控制之下。

在诸藩王中尤以北平的燕王军权独重,燕王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和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朱元璋曾敕左军都督杨文曰“……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住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参军士,随燕王往开平堤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兵悉听节制……。”^①

朱元璋大封藩王,曾有叶伯巨直言上书曰:“……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其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②

然而,矛盾并未经过数世,而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后便出了问题。

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就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确立了皇位的继承人,不料,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太子朱标因病亡故。太祖不得不立朱标才 16 岁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太祖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定年号建文。

建文帝在做太孙时就曾深感藩王对帝位的威胁,他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③即帝位后,针对“诸王多不逊”的迫切问题,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实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为了削弱燕王力量,建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就削去了五个藩王。对于燕王,也采取了削弱其兵力,并予严密监视的措施。

“建文元年，周、代、湘、齐、岷五王相继以罪废。七月，燕王举兵反，师名〈靖难〉，指秦、子澄为奸臣。”^④

建文帝及其亲信大臣在统治不稳，没有掌握军事实力的条件下，冒然削藩，引起帝室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并酿成战火。这就是乾隆皇帝在《大钟歌》中写到的“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意指“削藩”之举没有成功，出现激化对抗的局面，此处指“靖难之役”中以朱棣为首的“燕师”与明朝廷军队在金陵城下的决战。

朱棣起兵之后，迅速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年。建文四年，燕军自瓜州渡过长江，下镇江，进围南京，这时，建文帝已毫无抵抗能力。燕军进南京城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是月，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乾隆皇帝在诗中记述“靖难之役”这一史实，即写到“都城百尺燕飞入，齐黄群榜为奸凶。成王安在乃定案，夹辅公旦焉可同？”

朱棣进南京后，分别将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捉拿，对这些人大大加诛杀，首先提出削藩的齐泰、黄子澄都被整族地杀掉。而株连最广的却是方孝儒案。也就是乾隆皇帝在《大钟歌》中所提“成王安在乃定案，夹辅公旦焉可同？”方孝儒因拒不为永乐皇帝书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还不算，又将他的朋友门生作为一族，也全杀掉。

“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瓜蔓连抄”即“瓜蔓抄”。景清，建文时曾任北平参议，很受永乐赏识。永乐入金陵，景清假意归顺，永乐大喜，命为御史大夫。一日早朝，景清暗藏利刃，谋行刺，被搜出。“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⑤

“京观”，在古代战争中，战胜一方的统治者命人把战败者的尸体聚于一处，码放成垛，外面用泥涂抹封闭，叫做“京观”，其目的在于对敌起到震慑作用。乾隆皇帝此时不过是借此典故形容“坟墓遍地”，永乐

皇帝“杀人无数”。

至此，乾隆皇帝据以上史实，为“永乐大钟”的铸造成因，断然下了定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诘赖佛氏钟。”

乾隆皇帝其意为永乐的行为不会逃过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永乐皇帝为其行为所做的忏悔，岂能依靠铸造这口满是佛经的大钟来平复。

二、永乐皇帝对其行为并无悔意

乾隆皇帝断语永乐皇帝对其行为“忏悔”而铸“佛钟”，笔者有理由认为永乐皇帝对此并无悔意的，其原因如下：

(1)继承皇位，是永乐皇帝在做燕王时就早已有心的事情了。据记：“初，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传之。僧姚广孝，知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当奉一白帽子大王戴。’盖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文皇帝遂言于太祖，乞广孝，得之。”^⑥做为皇嫡子，朱棣经常奉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多有建树，其文材武略深得太祖赏识、宠爱。据记“皇太孙生而头颅稍偏，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文皇帝，语乃佳，太祖大喜。尝有意易储，群臣多谏阻之。”^⑦太祖的上联为“风吹马尾千条线”，皇太孙朱允炆对下联“雨打羊毛一片膻”，而燕王朱棣对下联“日照龙鳞万点金”。两下联虽都对得工整，但无疑燕王朱棣却显得大气非凡。

太祖赏识燕王，在他去世前十天颁诏朱棣曰：“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国防边患，以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⑧朱元璋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厚望。这些都增强了朱棣的自信之心。《明太祖实录》虽被永乐皇帝两次改修，其真实性被史学家质疑，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永乐皇帝的用心，即继承皇位乃“众望所归”。

对早已有称帝之心，并随着自己实力不断的增强，由“王”成“皇”终成事实。这种早已有心，并为此所做的努力，使永乐皇帝绝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而“忏悔”。

(2) 永乐皇帝曾说：“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诸王，藩屏宗社，传序万年，与国同久。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⑧

这番话充分体现了永乐皇帝对其行为所寻理由，“靖难”意为朝中有奸臣当权，皇帝有难，起兵为解除皇帝的危难。“靖难”乃正义之师，是“清君侧”，是“周公辅成王”。因为这种“正义”的行为杀人，怎能“忏悔”？

永乐皇帝在其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即佛所谓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杀可杀，刑可刑。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⑨，“谗间君臣，诬毁善良”俱指齐泰、黄子澄等等，皆为“不忠不孝之人”，即佛所谓“有罪不得不杀之人”，这种道理，绝不是“忏悔”的意思。早已有称帝之心的永乐皇帝，在各种机会均标榜自己起兵称帝为“靖难”、“清君侧”，这种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的行为，我们可以称为“辩解”亦可贬之为“狡辩”，但这绝非“忏悔”，忏悔是一个人对自已行为后悔而请人宽恕。这与永乐皇帝的言行是相悖的。

为达到自己一统天下的目的而杀人，永乐皇帝不会因此而请人宽恕。

(3) 总结永乐皇帝的统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教并存，儒学为主，重在利用。

对于佛教，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称帝后颇为崇佛，永乐皇帝基本上继承了朱元璋的做法，但极有分寸，崇佛而不佞佛。允许佛教有一定发展，他不仅有时让臣下唱佛曲，而且将佛曲颂之于塞外，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

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御制《佛名经》树立僧人形象。但是，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神权必须服从皇权。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守卫官在皇城下诵念佛经，明成祖见到后将他训斥一通说：“尔爵禄自诵经得之耶？……若暇之际，口欲诵念，则太祖皇帝御制《武臣大诰》等书，……尔取读诵，亦于身家有益矣。今后若仍于宿卫之所诵经者，必罪不宥”。^⑩当皇权与神权发生矛盾时，皇权至上。

乾隆皇帝在其《大钟歌》中说永乐皇帝“忏悔诘赖佛氏钟”，似乎永乐皇帝要凭仗佛力而忏悔，而佛对永乐皇帝来说，不过是为巩固其统治，所利用的工具。由此也可认为：对于不佞佛教的永乐皇帝来说，铸佛钟“忏悔”实为迁强。

三、乾隆皇帝的目的何在？

清经过了数十年的残酷战争，推翻明王朝，建立了满清王朝的。以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诺大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国，不仅需要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方面进行统治，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统治他们。对于被自己先辈打败的一个王朝，乾隆皇帝更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明朝政府予以诋毁、蔑视。

如乾隆皇帝在为《四库全书》收录的北宋时李若水撰《忠愍集》题诵时，对该书做出评论并引申对明永乐皇帝的义愤。北宋时李若水于金兵围攻开封时，随宋钦宗往金营，被拘，不屈而死。乾隆写道：“……若水历志不屈，捐躯以成其志，克全臣节，亦其生辰之不幸，然大金当革命之时，自非若水之所得而抗，杀之以全其名，亦即以申己之义。其事本非得已，第解颐断舌，处之太惨，金将尼玛哈不免过当。夫金宋在当时犹敌国也。若明永乐篡逆，于不附己者横加诛戮，则皆其本朝臣子，且洪武所留貽者，乃俱戕戮不颐，其于天理渐灭殆尽，甚且投铁铉于镗，剥景清之皮，则残忍惨毒，尤非人类所为，向每为之不平，兹论及李若

水之事，因并及之”。^⑭

乾隆皇帝将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做相提并论，足见其对永乐皇帝成见颇深，究其原因，我认为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虽然都是一国之君，但是，两人在通往帝位所走过的道路却是截然不同。

乾隆皇帝登上皇位可谓一路顺风。雍正元年八月，雍正皇帝秘密建储，便选定乾隆。并从雍正元年起对其进行精心培养。到雍正皇帝去世时，乾隆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须的文化素养和理事能力。雍正死后，乾隆毫不费力即皇帝位，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统皇帝。

而同为皇帝的永乐，却是通过战争、杀戮从皇侄手中夺权而走上皇位。

在正统的乾隆皇帝的眼中，永乐皇帝是为臣不忠，为君篡逆的不忠不孝之人。

“忠君”是乾隆皇帝做为正统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对臣下的极其重要的要求。乾隆曾下令国史馆编写一部《贰臣传》，所谓贰臣，即是明末清初之时，无论有何原因，有何功过，在王朝易代之际，兼任两朝的大臣，均被列入该书。乾隆皇帝为《贰臣传》做谕旨写道：“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乃遭际时难，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腆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⑮

从永乐大钟引申永乐皇帝，更感慨而发若不忠君而叛逆，必定“难逃南史之笔”。乾隆皇帝借永乐皇帝发挥，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统治，告诫本朝官员臣下，要“忠君”不可“叛逆”。

四、析永乐皇帝铸钟原因

以上文章，我们的论述只说明永乐皇帝绝非因“忏悔”而铸钟，那么，永乐大钟究竟为何而铸那？我们亦可分析为以下几个原因。

(1)有学者为永乐皇帝做过如下评价：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历史上能干成一件

大事业就可以声名赫赫，例如修筑长城，张骞通西域，开凿大运河等等。以这类公认的重大事业来衡量的话，永乐皇帝几乎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差。且不说别的方面，仅设立奴儿干都司，营建北京，浚通大运河，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几件事来看，干成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可为他树立一座丰碑。因此，当我们全面衡量明永乐皇帝的功过时，就不难得出结论：明成祖是第一流的封建帝王，在第一流的封建帝王中，他也算是杰出的。

通过永乐皇帝所做的几件大事，我们还可分析出一个原因，那就是以“篡逆”行为登上皇位的他，竭力表现得比其他的帝王更加杰出，以显示自己乃天命之所归，希望人们记住他的丰功伟绩。作为皇帝的永乐勤于政事，他说：“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司既久，亦忘其劳。……盖勤于思则理行，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⑯他治国得力，使明王朝进入鼎盛时期。铸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希望人们记住他，并可以向人们诏示自己的功绩，这应当是永乐皇帝下令铸大钟的一个主要原因。

(2)永乐大钟上的文字共计有 230184 个字，其中外壁上部铸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前 20 卷，达 137000 字另有汉文经咒十六种，梵文咒语一百多种。永乐大钟所铸经文、咒语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永乐皇帝为这些经撰写过序言。由此可见永乐皇帝与这口钟关系密切。根据钟上经文《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的序和后序，我们可以了解，此经是永乐十五年御制的，如此，永乐大钟的铸造年代应当是在永乐十五年之后。此时恰逢明永乐迁都北京前后。以永乐大钟为载体，以御制佛经为内容，做为定鼎北京的纪念。这也是铸造永乐大钟的又一原因。

最近研究人员在钟的铭文《大明神咒回向》中发现这样的词语：“敬愿大明永一

统”“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治世长太平……”^⑭这正代表了永乐皇帝“皇朝永固”、“斯民小康”^⑮的美好愿望。

(3)据研究表明：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直径3.3米，重约46.5吨。它不仅钟体庞大，而且钟声洪亮。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钟身上下内外铸满了文字并且字字清晰，到目前仍是世界上铭文最多的大钟。可以想象，精湛的铸造工艺，就是今天的专家也为之赞叹，表示永乐大钟的铸造工艺可谓登峰造极。

另外，永乐大钟还具有科学的力学结构。永乐大钟是通过二块“U”型青铜连接件，上下挂住钟纽的。二块“U”型连接件中间横穿一根不大的连接销，把它们穿在一起，实现钟体悬挂，这个连接销承受了巨大的剪切力，但这个挂钟的连接销横断面只有6.5厘米，长14.2厘米。与之巨大的钟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推算，这根连接销的二断面平均剪应力为2.5公斤/平方毫米，足以承受大钟的重量。永乐大钟的制造者们还考虑到，一旦连接断面的应力不均匀，个别地方如有表面不平的现象，应力就会提高，于是在连接销的中央铸了一根钢芯，起到了增加强度的作用。这种高超的力学工艺水平，令人亦为之叫绝。

铸造一件无论从设计、铸造到力学水平都极高超的永乐大钟，展示给人们，用以证明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永乐大钟，代表了明朝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的水平，我认为这也是铸造永乐大钟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几种铸钟原因并不矛盾，我认为诏示功德；定鼎纪念；展示科技水平是铸造永乐大钟的真正成因。而所谓“忏悔拒赖佛氏钟”的说法，我认为，首先不符合一代帝王的性格及经历。其次，就铸钟的年代来看，《明史·食货志二》描述永乐时的景况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

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⑯我想永乐皇帝不会在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忏悔”。至于乾隆皇帝的评说，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借题发挥利用永乐大钟罢了。

①《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武汉出版社版第531页。

②《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版第3990页。

③《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黄子澄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版第4015页。

④《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版第4013页。

⑤《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景清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版第4027页。

⑥《鸿猷录》卷七·封国燕京。[明]高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45页。

⑦《鸿猷录》卷七·封国燕京。[明]高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44页。

⑧《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武汉出版社版第531页。

⑨《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明太宗实录》卷十二。武汉出版社版第112页。

⑩《名经》现藏于北京广济寺。

⑪《典故纪闻》卷七。[明]余继登撰，中华书局版第122页。

⑫《国朝宫史续编》卷七十八·书籍四。[清]庆桂等编纂 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738页。

⑬《国朝宫史续编》卷八十八·书籍十四。[清]庆桂等编纂 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8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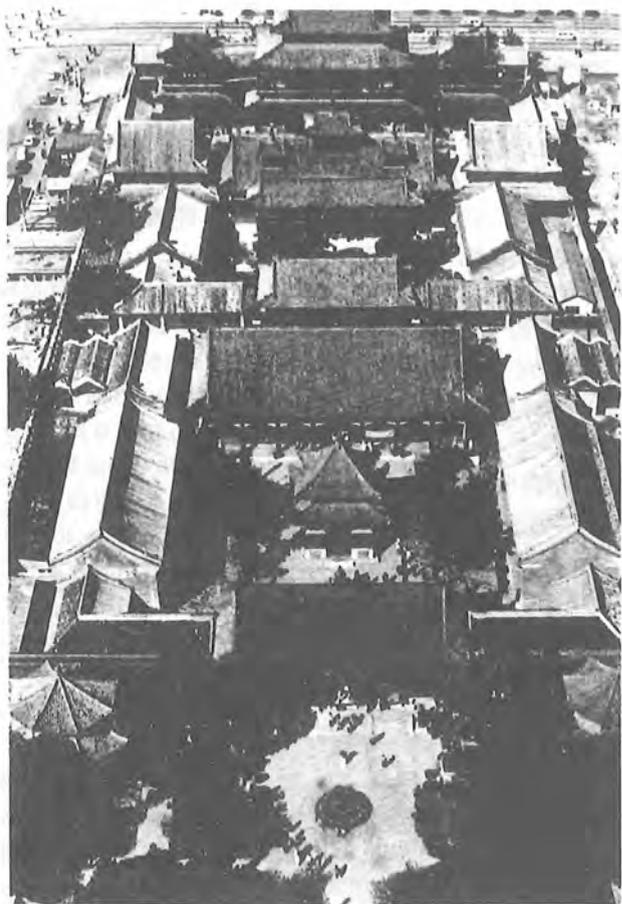
⑭《典故纪闻》卷六。[明]余继登撰，中华书局版第119页。

⑮《永乐大钟研究又获新发展》。作者夏明明，1997年6月10日《北京日报》·文物收藏版。

⑯《典故纪闻》卷六。[明]余继登撰，中华书局版第104页。

⑰《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版第1895页。

(作者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助理馆员)



雍和宫鸟瞰图

雍和宫

藏传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 主题和特色

黄崇文

苏东海先生在《中国博物馆管理学引论》中指出：“80年代，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新的时期，博物馆的政治使命相对弱化了，而文化使命相对的加强了。”



“一百多年的博物馆建设中,从突出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到突出政治斗争的政治使命,再到突出两个文明建设的文化使命,这个过程是博物馆办馆宗旨的演变”。雍和宫博物馆正是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紧紧抓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主题,弘扬宗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和时代主旋律,以其独具的特色和魅力,每天都吸引着大批中外观众。

雍和宫的整体建筑设计,完全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而设置,具有满、汉、蒙、藏的民族特色,也堪称一座露天的宗教建筑博物馆。全部建筑计有房一千二百余间,不仅在京城寺院中首屈一指,而且冠绝华北。整体构思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路为庭园部分,称为东书院,原为清帝乾隆诞生和其它各帝到雍和宫礼佛时小憩之所。西路原有一座关帝庙,是雍和宫的护法寺院。中路则为雍和宫的主体建筑,由三座精致的清式三门四柱七楼样的宝坊,自南而北六进崇宏大殿组成。依次是雍和宫门殿、雍和

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绥成殿。这种建筑格局构成了雍和宫的中轴线,在其两侧,还分别设有钟、鼓楼、重檐八角碑亭、方亭、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药师殿、时轮殿)、班禅楼、戒台楼等多所研习经学、导循宗教轨仪的建筑物。严谨有序、次第上升、极富节奏感,与古城中心的紫禁城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景山、颐和园等和谐统一,或远或近地簇拥着这座悠久的历史名城。

雍和宫博物馆的陈列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基本的殿堂陈列,另一部分是“藏传佛教与雍和宫”、“清帝御用珍品”、“清代西藏礼品贡品展”三个专题陈列。在中轴线的殿堂和两侧殿堂内,条案上分别摆放着大量珍贵的质地不同的法器 and 供器;各殿都供奉着造型优美、形象生动的佛像,这些佛像展示出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异教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独特风格。这些密宗佛像对于博物馆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是研究蒙藏少数民族



族历史、宗教、文化、人体科学、性心理学、佛像艺术等的实物资料；密宗的修炼方法等教理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展室殿堂内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各类佛像外，还悬挂着很多具有西藏雪域风格的唐卡、绘画、大型壁画等。这也是藏文化的精华，所以可以从中品味藏文化的独特神韵和美感。其唐卡，系一种特殊的卷轴画，是藏文化中最著名的一种宗教艺术，题材广泛，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佛经，一是西藏的历史传记、藏医藏药、天文历法、重大宗教活动等。透过唐卡那湛然的寂静与永恒，可让观众荡涤污浊，归于平静；无限丰富的色彩与画图，表现了中国崇尚简约自然的美学观。

在中轴线的殿堂外还陈放和矗立着极为珍贵的宗教文物，其中有乾隆皇帝为安塞固疆，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亲自撰写的《雍和宫碑文》和《喇嘛说》碑，有巨型铜

鼎炉，有按佛教宇宙观设计、铸造的铜须弥山，在显、密宗殿前台阶上还陈放着刻有藏传佛教“六字真言”的“转经轮”，这是藏密至上的“真宝言”，也是包罗万象的祈祷咒语，参观者可随意转动，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意识。雍和宫博物馆无论是建筑还是殿堂内外的陈设，都充分体现了清初国力的强大，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也表明了清帝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这也是今天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形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大一统局面的历史渊源。

雍和宫博物馆的专题陈列“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览，是为了纪念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 250 周年而举办的。展厅则利用 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乾隆特为其建的班禅楼。步入殿堂，迎面的屏风上高挂着 1954 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在一起的巨幅图片。整个展览展线约 200 延长米，表现了雍和宫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地位，和为多民族国家统

一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整个展览共分五个单元：第一单元“藏传佛教五大派系”，着重介绍了藏传佛教的起源和发展、各派的创始人、主要寺院及杰出领袖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第二单元“藏传佛教的主要特色”，由于藏传佛教主要在蒙藏地区形成和发展，其主要特色有两点：第一，从教义上弘倡显密兼容，从修行次第上要求先显后密。第二，活佛转世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特有的传承方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展览中突出了雍和宫珍藏的掣签金瓶。第三单元“达赖喇嘛世系”，第四单元“班禅大师世系”，通过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说明西藏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大量展品既说明了清中央政权和西藏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也说明了西藏地方神权势力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第五单元，“高僧大德与雍和宫”，重点突出了雍和宫总堪布章嘉·若必多吉国师，他遵照乾隆皇帝的御旨，主持雍和宫改为喇嘛教寺庙；并创立雍和宫祈愿大法会的业绩。同时也详尽展出了六世、九世、十世班禅大师，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等大活佛，在雍和宫传经弘法的动人场面，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这里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

现在陈列的另一个专题展览“清帝御用珍品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雍和宫金刚驱魔神舞的程式和道具；二是清乾隆皇帝的坐禅图、持戒像、四体合璧的大藏经、木兰秋獮的武器及生活用品。通过这个展览表现了藏传佛教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清帝

尊崇佛教的思想表现，以及乾隆皇帝一生赫赫的文治武功。

第三个专题陈列是在雍和宫最北的建筑——绥成楼的东顺山楼下举办的“清代礼品贡品展”。展线100余延长米，利用30余个展柜展出了铜鎏金宗喀巴大师，四世班禅大师、佛祖释迦牟尼、文殊菩萨等像15尊，另有法器、供器、金银曼扎、铃、杵及人头骨摇鼓、藏刀、氍毹等各种珍贵文物66件，均为贡品中的精华。在南北墙上悬挂40幅图片，则表现了礼品中的上乘之作。其中，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世达赖喇嘛为表示对乾隆皇帝的诚笃之情，特送给雍和宫《释迦源流图》唐卡，乾隆十年（1745年），西藏郡王颇罗鼐为敬贺雍和宫改为喇嘛庙落成典礼，特将佛祖释迦牟尼像请至雍和宫大经堂——法轮殿供奉。在东西两面山墙上，尤其突出悬挂着两帧巨幅彩照，一幅是拉萨布达拉宫雄伟的雪域风光，一幅是汉藏文化交融的雍和宫鸟瞰全景，对应得是那样和谐美妙。整个展览不仅表现了博大精深的藏文化，同时也表现了西藏宗教上层人物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这个展览从1996年8月底正式对外开放，仅半年时间，就接待了中外宾客1000人次，并在观众中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总之，按照我国博物馆学的性质和任务，雍和宫博物馆以其特有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一方面做好宗教文物的收藏、科学保管和合理使用；同时积极充实、调整和提高原有的陈列水平；努力开展藏传佛教涉及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拓展思路、发挥优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作者为《民族与宗教》编辑部副主编）

漫谈古代博局纹铜镜



历史悠久而又独具一格的铸镜工艺是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一枝奇葩。不仅镜类繁多、造型精美,而且镜背图案构思奇巧,题材广泛新颖。大凡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及人们思想意识,往往在铜镜的装饰纹样和镜铭中反映出来。秦汉时期,博局纹铜镜是镜鉴艺苑中重要品类,倍受专家、学者的珍爱、重视与研究。

一、规矩纹与博局纹

“规矩”一词,原为画图正方之工具,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将这种规(□)矩(T)的木工工具的样式作为铜镜装饰纹样,称之为规矩纹。对此称谓众说纷纭。日本梅原末治先生对中国的汉至六朝铜镜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与研究,并将这种纹饰称之为“方格规格镜”;梁上椿先生《岩窟藏镜》中将“规矩(TLV字母式)”纹镜之名引到了中国,并在很长时间为我国学者所接受,至今有的论著中仍沿用。有人认为规矩纹、草叶纹镜源之草叶;或认为与山字镜之“山”字有关;或认为源于占星盘,与天文学有关。不论此纹饰源于何类,与孰有关,我都认为是牵强附会的,都是单纯地依据这“TLV”三种字母式符号来冠名,却忽略了“TLV”之间的整体性、规律性,故命名为规矩纹镜是无依据,也是不科学的。探寻铜镜博局纹,要从时代的文化大背景去窥

视,可能更容易把握。

六博是中国古代流行的娱乐形式,秦汉时期博戏已成为人们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上至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皆酷爱博戏。博戏是汉代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如同现在搓麻一样。

六博也是古代流行的艺术主题,从考古发现中与六博有关的博局图案的文物,见诸于著录的有:

1970年河北平汲中山国 M₃ 中出土一件六博局玉石板(盘),是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战国时期六博局(图1);

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地均出土了仙人六博图案的画像石或画像砖(图2、3);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 M₁₁ 和 M₁₃ 出土的博局(图4);

湖北云梦大坟头汉 M₁ 出土的木博局;

广州汉 M₄₀₁₃ 出土的木博局(图5);

广西西林汉墓出土的四足铜博局(图6);

湖南长沙马王堆 M₃ 出土的木博局(图7);

从考古发现博局图案的资料反映,汉代是博奕最盛行期。不仅人们自己酷爱博戏,还将博局和神人博奕图案设置于铜镜背面。郭玉海《故宫藏镜》图48中抚琴跳舞纹镜背四组图案中便有仙人博奕一组(图8);《中原之物》八四年1期《古镜艺术、二》图版十,汉代宴乐六博画像镜中亦有神

人博戏一组,这表明汉代还寄寓天山神仙亦酷爱博戏。

博局为博戏所用的棋盘。《晋书·天文志》引用髀家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博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以木制居多。局面分为“TLV”共十二曲道,棋子则依曲道而行,中间为一个方框,方框四角外或四个圆点,或四个花,或四个鸟,以象征四方。秦汉时期规矩纹铜镜背面的图案与博局完全一样,故将规矩纹铜镜改称为博局纹铜镜是理所当然的。

1979年熊传新先生《谈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中,依据M₃出土木博局的十二曲道而将规矩纹镜改称“博局纹镜”;1986年傅举有先生在《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见解:“铜镜上的十二曲道(即所谓规矩纹)的排列组合是固定的有规律的,与博局的曲道完全相同……”。“博局纹铜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是和博戏的存在、发展以及兴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点见解更有力地说明规矩纹铜镜改称博局纹铜镜是确定无疑了。1987年周铮先生在整理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时发现一面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图9)。此镜的规矩纹与八乳、四神、四兽相间配置,中心区方框内是十二乳与十二辰铭相间配列。外区有铭带一周,铭为“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口为口,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具博局去(祛)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周铮先生指出,“刻具博局”即为镜背上“TLV”的规矩纹。“TLV”的规矩纹之“规矩”一词,在铜镜的铭辞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而“博局”一词竟然在新莽时期铜镜铭辞中出现,意味着“博局”不是后人硬给“TLV”起的名称,当时匠人便是依据博局而刻于镜背上的。因此,周铮先生将“规矩纹铜镜”改称为“博局纹铜镜”的论据充足、确切,是不容置疑的。

二、博局纹镜类型及时代特点

秦汉时期,是中国镜鉴史上第二个鼎盛期,汉镜浩如烟海,新型的博局纹铜镜一然崛起,博局便作为汉镜的主要装饰纹样,新莽托古改制期尤甚。从考古资料来看,博局纹铜镜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也多。笔者认为,博局纹镜的类型应以博局的十二曲道及博局与相配组合的纹饰而划分:

(一)、依博局十二曲道中“L”之方向,可分为:

1. 镜背上博局图案十二曲道中“L”,绝大多数为右旋方向,即“L”。它流行时间久远,从博局兴起至衰落。屡见于镜之图案,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M₃出土的博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M₁₃、大坟头西汉M₁出土木博局、广州4013号汉墓出土木博局的十二曲道之“L”方向相同。

2. 镜背博局图案十二曲道中“L”,有的为左旋方向,即“L”正方向。与1972年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中出土的四足铜博局之“L”方向相同。《历代铜镜纹饰》中图54·东汉禽鸟博局镜(图10)和《浙江出土铜镜》图版16·东汉规矩四神禽兽镜之博局图案便是如此,惟图54东汉禽鸟博局镜中一个“L”却少了半笔,呈“□”,可能是工匠刻模时之笔误。日本福永伸哉先生《规矩镜汇术计可特异博一群》和《青龙三年镜上三角缘神兽镜》共收录了七面博局纹铜镜,每镜之博局十二曲道中“L”均为左旋方向(图11)。

3. 铜镜博局图案十二曲道中,“L”方向既不是右旋,也不是左旋,而是两个“L”为右旋,两个“L”为左旋,也就是两两“L”相对,即呈“L、□”和“□、L”,与山东微山县两城画像石和江苏铜山台上村汉画像石上的六博图中博局相同。《历代铜镜纹饰》图24·西汉草叶纹博局镜(图12)中“L”的方向即如此,但此镜博局十二曲道中“T”与众不同,只保留了“一”,却省略了“1”,而以此铭占此位置,同时中心区方框四隅又顺接小

的四方形。湖北云梦睡虎地秦 M₁₁ 出土的博局,则为三个“L”为右旋方向,另一个“L”为左旋方向(图 4)。

不管博局十二曲道中“L”方向如何,但十二曲道都是专供行棋使用的。什么情况下,依“L”哪个方向行棋,却无从可知。

(二)、依博局与相组合的装饰纹样,可分为八类:

1. 蟠螭纹博局镜,流行于秦末至西汉早期。此时期博局十二曲道均以窄细的弦(三或四弦)纹构成,且大而细,同时每个蟠螭皆绕过 T、L、V。蟠螭纹博局镜多为三弦或四弦钮。博局的方框皆为双线,线间多以“大乐贵富,延年益寿”和“一鱼纹”填充。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绶墓、湖南长沙月亮山西汉 M₁ 出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数面此镜类(图 13)。

2. 草叶纹博局镜,多见于西汉早期的内向十六连弧纹镜缘内。此镜类博局十二曲道大而粗壮,方框四“T”形曲道间夹以篆书铭八字:“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阳)”,或“长毋相忘,长乐未央”,或“心思美人,毋忘大王”等,“L”“V”形曲道多数与外圈无连。此镜类多为四叶钮座。《四川省出土铜镜》中收录两面草叶纹博局镜(图 14、图 15)。

3. 四虺纹博局镜,多见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以圆钮和圆钮座居多,博局十二曲道规整清晰。但此类镜子一般较小而厚重,四虺均居于“T”与“L”之间(图 16)。

4. 几何纹博局镜,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时期。博局十二曲道间有规律地布满三角形、菱形、长方形及各种线条,以禽鸟等动物的纹样填充。河南洛阳烧沟东汉 M₁₆₀ 出土一件(图 17)、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几何纹博局镜(图 18)。

5. 四神纹博局镜,流行期从新莽至东汉早中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四灵)之位异同。新莽时期,四神多居于“L”与“V”间,各神之尾一般不过“T”;东汉时期,四神多居于“L”与“V”之间,但各神之尾皆过“T”,四神亦有居于“T”与“L”之间,同时四神之间还常以鸟兽、羽人及云气纹相

配。四神博局镜多以外圈铭居多(图 19、图 20、图 21)。

6. 鸟兽纹博局镜,流行于西汉时期至东汉晚期。这类博局镜不是以四神相组合,而是以鸟、兽相配,但其构图与四神博局镜相类似(图 22、图 23)。

7. 渔猎纹博局镜,仅见于东汉时期。此类镜的构图与四神、鸟兽纹博局镜类似。惟四神之位置被撒网捕鱼和射箭狩猎所占居,其间布以树木、禽鸟、云、水等纹样。《故宫藏镜》图 34·东汉·渔猎纹博局镜中四组图案——弩弓射虎、张网捕鸟、撒网捕鱼、仙女踞坐和玉兔捣药。这四组图案描绘了田园诗般的渔猎生活情景(图 24)。

8. 散云纹博局镜,仅见于《故宫藏镜》中 35·东汉·昭明镜(图 25)。此镜博局十二曲道均以纤细双线构成,其间填以散云纹。铭文位置排列与众不同,甚特殊。铭为“视珠取无极,昭明镜口防,淫去乐沫念,远虎日有福”。

9. 龙虎纹博局镜,与四神纹博局镜构图形式基本相同。博局间是以龙虎相配合,唯龙虎间无其他鸟兽纹,而是云气纹(图 26)。

(三)、铜镜图案中,完整的博局纹应为中央设置一个方框,其外为“TLV”十二曲道。方框四角与“V”间或置四个乳丁,或置四个四瓣花,或置四个鸟。还有的博局“T”两侧各置一个乳丁,或一个连弧式乳丁,可能与铭文“八子九孙治中央”之“八子”有关。在东汉晚期至三国两晋时期铜镜中常常出现博局十二曲道不全或变样图案,我们称之为“简化博局镜”或“变形博局镜”。

1. 简化博局镜,即是博局十二曲道中,或无“L”;或少“V”;或“L”和“V”均无;或“T”曲道只有“一”,却将下部省掉,以铭字或纹饰代之;或“T”与“L”皆无(图 27、图 28、图 29)。不管博局十二曲道中,缺少哪个曲道,博局都是不完全的。

2. 变形博局镜有以下几种情形:

a、博局十二曲道完整,惟中央位置非方而圆(图 30),多见于东汉时期。

b、博局中央非方而圆，然博局非十二曲道，而为十或八曲道，曲道中只有“T”、“L”，惟缺“V”(图 31)，多见于三国时期。

c、博局十二曲道中，或缺“L”，或缺“V”，但中央位仍非方而圆(图 32)，多出现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

从以上几种不完整博局纹铜镜来看，按理说，它已不是博局图案，但它毕竟是由博局演变而成。铜镜中的博局只是一种装饰图案，而不是真正作为博戏用的博局，因此博局纹就不那么严格，仍可归入博局纹镜类。

博局纹铜镜产生于秦汉之际，盛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衰落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始至终，博局纹镜就以它独特的风格，精美的图案，受到达官贵族所青睐，至今仍为收藏爱好者所欣赏。

参考资料：

1.《中华历代铜镜鉴定》，周世荣，紫禁城出版社。

2.《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周世荣，湖南美术出版社。

3.《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陈佩芬，上海书画出版社。

4.《浙江出土铜镜》，王士伦，文物出版社。

5.《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文物出版社。

6.《五岛美术馆·中国纪年镜特别展》37。

7.《故宫藏镜》，郭玉海，紫禁城出版社。

8.《“规矩镜”应改为“博局镜”》，周铮，《考古》1987年12期，科学出版社。

9.《馆藏铜镜选辑(二)》，杨桂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8—19。

10.《中国方术考》，李零。

11.《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及博局纹镜》，傅举有，《考古学报》1986年1期。

12.《论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熊传新，《文物》1979年4期。

13.《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文物》1978年9期。

14.《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

16.《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历代铜镜纹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美术出版社。

18.《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文物》1979年1期。

19.《古镜艺术·二》，文众，《中原文物》1984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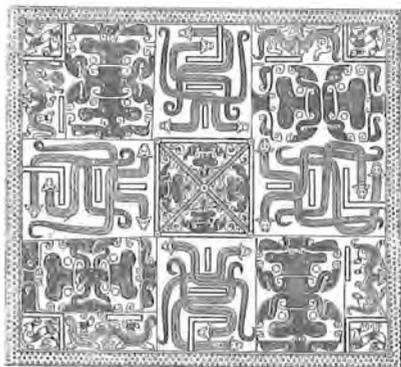


图1 河北平汲中山国出土的六博局玉石板



图2 江苏铜山台上村汉画像石上的六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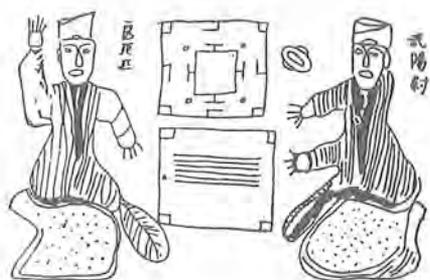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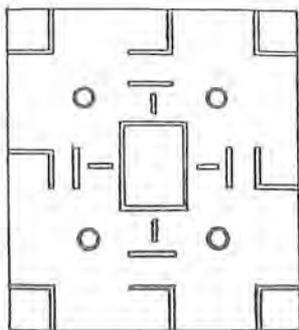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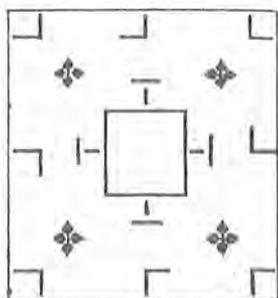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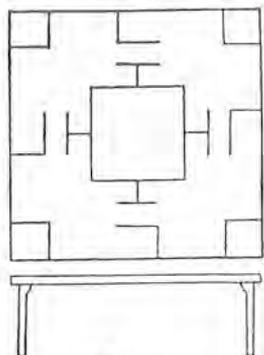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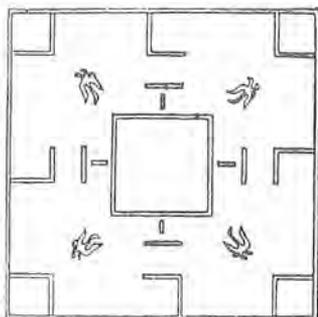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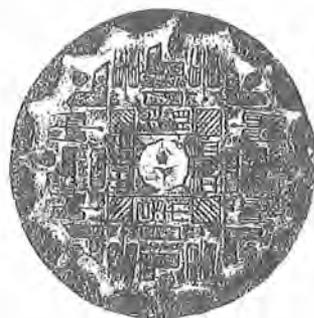


图 12

- 图 3 山东滕县西户口画像石上的六博戏图
 图 4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 M11 出土的博局
 图 5 广州 M4013 汉墓出土的木博局
 图 6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的四足铜博局
 图 7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出土的木博局
 图 8 抚琴跳舞纹铜镜
 图 9 四神纹博局镜 新莽
 图 10 禽鸟纹博局镜 东汉
 图 11 四神纹博局镜 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
 图 12 草叶纹博局镜 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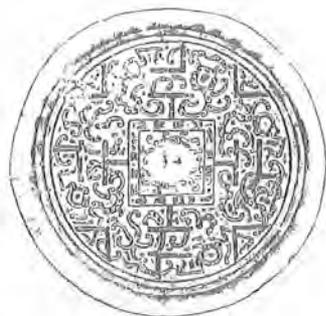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22

- 图 13 蟠螭纹博局纹镜 西汉
 图 14 草叶纹博局镜 西汉
 图 15 草叶纹博局镜 西汉
 图 16 四虺纹博局镜 东汉
 图 17 几何纹博局镜 东汉
 图 18 几何纹博局镜 新莽
 图 19 四神纹博局镜 新莽
 图 20 四神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1 四神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2 鸟兽纹博局镜 新莽



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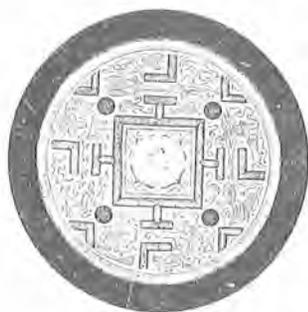


图 24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图 29



图 30



图 31



图 32

- 图 23 鸟兽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4 渔猎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5 散云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6 龙虎纹博局镜 东汉
 图 27 简化博局镜 西汉
 图 28 简化博局镜 新莽
 图 29 简化博局镜 东汉
 图 30 变形博局镜 东汉
 图 31 变形博局镜 三国
 图 32 变形博局镜 东汉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溥心畬

绘画艺术及鉴定

陶继红

在近代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溥”盛誉的溥心畬，他的绘画作品清逸灵秀，简淡萧疏，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又因他擅长诗词、书法，更拓展了绘画的意境，使他的作品广为世人喜爱。当代著名的画家、鉴赏家谢稚柳先生曾著文说：“观其画如视其人，其性淡泊不好利禄，故其风格人格具成一体，吾爱其画，更敬其人”（《溥心畬书画集》序）。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也著文“……先生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卉、鞍马无不涉猎，画风简淡、韵致雅逸，题画诗文，写景寓情，切题点睛，诗书画相得益彰，以深重的传统墨彩，潇洒自如地描绘出文人画的鲜明特色，他的遗作亦将作为这一时期最具文人画特色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世代相传，永以为宝”（《溥心畬书画集》序）。

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于非闇先生在北京《晨报》著文倡言“南张（大千）北溥（心畬）”以来，二位大师的作品一直被世人推崇，公认为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的杰出画家。只因二人皆于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移居台湾，几十年来我们介绍、研究的文章少了一些，特别是对溥心畬的研究更是空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两岸文化交流频繁，溥心畬的绘画再度引起了艺术爱

好者、评论家及艺术品收藏家的瞩目。

溥儒（1896—1963）字心畬，号西山逸士、又号旧王孙，清代恭忠亲王奕訢的孙子，是宣统皇帝的堂兄。做为清室贵胄的溥心畬从小便接受严格的教育，“余从七岁学作五言诗，十岁作七言诗，十一岁始作论文。”“我时年十五岁，奉上谕入贵胄法政学堂读书。”“因德国亨利亲王之介绍，游历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时年余十九岁。”后又考入柏林研究院“在研究院三年半，毕业得博士学位。”（《心畬学历自述》）

“辛亥革命”后的溥心畬只得避隐西山读书习画。至于他的习画经历他说道：“画则三十左右时始习之，因旧藏名画甚多，随意临摹，亦无师承，又喜游名山，兴酣落笔，可得其意。书画一理，因可以触类而通者也。盖有师之画易，无师之画难；无师必自悟而后得，由悟而得，往往工妙。惟始学时难耳！”（《心畬自传》）

溥心畬学画是无师自通的，这取决于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幼苦练书法，“书则始学篆、隶，次北碑、右军正楷，兼习行草。十二岁时，先师使习大字，以增腕力，并习双钩古帖，以练提笔。时家藏晋、唐、宋、元墨迹，尚未散失，日夕吟习，并双钩数十百本，未尝间断。”（《心畬自传》）因此打



溥心畲山水(真迹)

笔法沉着静穆,富有儒雅的“逸气”

下了深厚的笔墨基础。二是“旧藏名画甚多”,他可以“随意临摹”,直接向古代的名家名迹学习,反而不受庸师所累,以自己的聪慧直接步入神奇的绘画艺术殿堂。从古画中他学会了立意、构图及各类物象的表



溥心畲山水(赝品)

笔法狂乱、燥动,少“书卷气”

现方法,完善了绘画的基本功。三是游历名山大川,师法自然,广增见识,陶冶性情,并不为前人的成法所束缚,自成一派,形成了溥心畲绘画的艺术风格。

对于溥心畲绘画艺术,专家们以“画风

简淡，韵致雅逸”，八字来概括，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溥心畬一生淡泊功名，与世无争“自比于陶潜，故号羲皇上人。”（《心畬自传》）又自号“西山逸士”更表明了他的创作心态，溥心畬绘画艺术的精髓便是“简淡雅逸”这一点从他的绘画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充分地印证。纵观溥心畬绘画艺术风格形成的心路历程，应当说他的生活经历在他的绘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溥心畬处在由清入民国的交替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原为贵胄的溥心畬沦为以字画自给的画家，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道中落，财产散失，使得对此无可奈何的溥心畬只得直面生活，造就了他不求功名，不计钱财，一心陶醉于艺术的闲散性格。

溥心畬的画属于“阳春白雪”一类，不为时尚流俗所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儒雅的气质，追求着出尘绝世，游心物外的潇洒，因而创作了大量的杰出的绘画作品。但溥心畬内心深处的隐痛又使他无法轻松与超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解读出孤寂，郁闷，以及世事苍凉的感慨。

对于社会大量地需求溥心畬的绘画，他也以此为生计的现实，在溥心畬的内心中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溥心畬借绘画寄托情思，浸注了毕生的心血，创作了无数的艺术精品，另一方面他又自嘲书画自给的境遇，有时甚至有些玩世不恭，当买画人络绎不绝之时，他便组织门人为其代笔，制作了大量的艺术质量不高的“溥氏商品画”以此作为应付。这给后世研究和鉴定溥心畬绘画带来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再加上名家名作历来都有人仿制，署溥心畬名字的绘画赝品也呈泛滥成灾之势。

溥心畬先生作品的真伪情况历来比较复杂，从现存情况看，真迹多为小品，尺幅也较小，用笔灵动、萧疏、意境深远，一些画面上还配有大段的诗题或文字。而代笔之作以青绿山水为多，笔致刻划琐碎，山头皴法呆板，松针和屋宇的线条也缺少变化，给人

以机械式的感觉。还有一种浅降山水，过于精密细致，文人气不足。另一种情况是门生把大部分稿子画好，然后请溥先生略加点染，修饰一番，再配上诗文印章，谓之半代笔之作，这些画多为立轴，有的尺幅还很大。

前一时我在整理文物库房时，看了几件溥心畬先生的作品，其中一件为其三十八岁时所作山水，潦潦数笔，满纸荒寒，落墨极简淡，而意味深远，题识为“木叶振空谷，秋风落高林”，整幅作品充满了士大夫式的情趣。用笔潇洒飘逸，落款也很精到。另有两件作品用笔较繁复，山石的点苔略显平板，松针的画法也比较机械，但落款飘逸，用印也不错，疑为半代笔之作。

溥儒的书法很有特色，他十二岁习双钩古帖，遍临家藏晋唐宋元诸墨迹，楷书得欧、柳韵味，行书秀俊飘逸，人称“衡山以来第一人”。其行书喜用小笔硬毫，行笔疾迅，往往一气呵成。杭州文物库房中有一副对联，上款是“乐山先生雅属”，作于戊子仲秋，当为溥儒先生五十三岁之作，通篇行气连贯，墨色干枯适宜，行笔爽劲迢逸，足见其深厚的书法功底。

溥儒先生对书画材料的挑选也非常考究，他特别喜用日本绢，这使其作品具有了很显著的特征，以区别于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书画家，这种日本绢细密而富有弹性，笔墨上很不容易控制，因而同时代绝少仿品。

近几年随着书画拍卖市场的兴起，溥心畬先生的仿作大量涌现，这些大多来自天津，多为青绿山水，工整细密，从画面看多仿代笔一路，但比代笔画更显单薄，人物山水之间缺乏整体感，笔力也更柔弱，好像是故意夸大溥儒画中细碎的一面。落款仿的更差，行气不贯，结体松散，笔力浮软。不过仿的水平较高的也有，应当警惕。

当今人们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溥先生的绘画也越来越多地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所认识和收藏，因此我们一定要多研究，多鉴别，以求物有所值，藏有所宝。

（作者为杭州文物商店代销部经理）

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十)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

范承勋墓志并盖

首题：“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军功加七级又加六级眉山范公墓志铭” 62行 行56字 100×103

盖篆书题：“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军功加七级又加六级眉山范公墓志铭” 6行 行5至3字不等 100×103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二十二日葬于“密云县北之清溪庄”

王棧撰 汪士铎行楷 李涛篆盖 朱圭刻字

1958年于密云县太子务出土

李思盛妻高氏墓志并盖

首题：“皇清诰封一品夫人李母高太夫人墓志铭” 30行 行28字 66×67 周围刻云鹤纹

盖篆书题：“皇清诰封一品夫人李母高太夫人墓志铭” 5行 行4至1字不等 66×67 周围刻云鹤纹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望日葬于“红门之北距郭十里”

汪士铎撰并行楷及篆盖

1959年于南苑大红门北出土

王燕妻袁氏墓志并盖

首题：“皇清诰封夫人王母袁太君墓志铭” 40行 行42字 86×85 周围刻云龙纹

盖篆书题：“皇清诰封夫人王母袁太君墓志铭” 4行 行4至2字不等 82×84 周围刻云龙纹

清雍正十三年(1735)葬于“宛平县之香山庄”

史貽直撰 兰生行楷并篆盖

1954年于西城出土

张楷墓志并盖

首题：“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特赠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蒿亭张公墓志铭” 41行 行17字 三列刻 88×88

盖篆书题：“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特赠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蒿亭张公墓志铭” 5行 行7至3字不等 90×90

清乾隆十年(1745)葬于“广宁门外柳巷”

张廷玉撰 董邦达楷书 陈世馆篆盖

胡煦及妻陈氏合葬墓志并阴

阳无首题 46行 行59字 79×75

阴刻续志 13行 行60字 79×75
清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二十八日
“合葬于清龙河之原”

彭启丰撰志 彭元瑞撰续志 王杰行
楷 董诰篆盖 袁治瑾镌
于宣武区出土

施宗焯及妻严氏范氏墓志并盖

首题:“皇清敕授登仕佐郎历任山东恩
县山西襄陵县典史覃恩晋封大夫知州衔候
选知县施公暨配诰封太宜人严太宜人范太
宜人合葬墓志铭” 29行 行29字 53×
52

盖篆书题:“皇清敕授登仕佐郎历任山
东恩县山西襄陵县典史覃恩晋封大夫知州
衔候选知县施公暨配诰封太宜人严太宜人
范太宜人合葬墓志铭” 8行 行8至4字
不等 56×53

清咸丰元年(1851)八月二十三日“葬
于京都永定门外管家村西花椒树村”

陈庆松撰 潘馥楷书 杨沂孙篆盖
1963年于丰台区马家铺花椒村出土

李立祖墓志盖

盖篆书题:“皇清特赠迪功郎显考西庵
府君同特赠儒人显妣李太君立祖墓志” 6
行 行6至1字不等 42×62
清

1958年于南苑大红门北出土

民国

赵瑄母杨太夫人志

首题:“故叔母赵母杨太夫人圻志”
27行 行27字 62×61

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十六日“葬于
京西四平台之东麓”

赵世骏撰并楷书
于丰台区八大处西下庄出土

林寿曾墓志

首题:“林生寿曾墓志” 23行 行24
字 60×57

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十五日“葬于
明袁督师墓东侧”

张鸿莱撰 丁金藻行楷
于崇文区出土

李母黄太淑人墓志并盖

首题:“清诰封淑人李母黄太淑人墓志
铭” 25行 行25字 53×52

盖篆书题:“清诰封淑人李母黄太淑人
墓志铭” 4行 行4至2字不等 53×52

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十一日“葬于
西直门外大柳树村”

陈宝琛撰并楷书 林开霁篆盖

王筱汀妻赵蓉轩墓志

首题:“王母赵夫人墓志铭” 32行
行32字 68×68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二十一日
“葬于北平西山普觉寺之东”

李时灿撰 夏寿田楷书 徐德虹篆盖

高继宗墓志并盖

首题:“铁岭高君友唐墓志铭” 32行
行32字 67×67

盖篆书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君友
唐墓志铭” 4行 行4至3字不等 67×
67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卜葬于旧都西
山之麓”

陈夔龙撰 高凌霸楷书 于右任篆盖
1965年于海淀区邵家坡出土

(孔繁云、王大成整理,孔繁云执笔)

大事记

3月28日~4月26日 由市外办组团,市文物局和市园林局圆满完成了“埃及世界公园中国园”的建园工作。

4月1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达岭南一、二楼、北三楼紧急抢险加固工程开工。

4月2日 市文物局陪同市政协委员视察平安大街市政道路改建工程中文物保护的情况。

4月3日 市文物局对违章出租天宁寺山门的问题进行查处,要求产权单位市宗教部门与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协商,尽快将居于山门的民工迁出。

4月4日~6日 市文物局协助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对韩建集团在宣武区平渊里施工工地唐井破坏事进行调查,并进行处罚。

4月7日 市文物局与古玩城工商所、古玩城市场服务中心联合对古玩城市场旧货经营户进行了执法检查。共检查了120户,对其中4户进行了处理,没收超线经营的文物6件。

景山雨望楼修缮工程开工。

4月8日 军调部1946年中共代表团驻地翠鸣庄大修工程开工。

国子监敬一亭抢险加固工程开工。

4月10日~6月初 市文物局对北京各区县的田野石刻文物的保护情况进行

检查,并将检查情况上报市政府。

4月21日 市文物局会同宣武区政府、区文化文物局调查李鸿藻故居、会同馆情况,并协商保护措施。

4月22日 市文物局陪同市政协文史委部分委员视察宣武区会同馆、过街楼等文物保护情况。

4月24日 市文物局陪同市人大文卫体委员会部分委员视察居庸关。

4月 市文物局局属单位北京市文物公司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荣获一九九七年度《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4月~6月 市文物局对17个局属单位和32个局外的文博单位的576根避雷装置接地点进行了检测,对10个单位提出了整改建议。

4月下旬~6月 市文物局配合市公安局二处对法华寺须弥座被盗案及系列文物倒买倒卖案进行了侦破。并对涉案文物进行了清理鉴定,就案犯处理问题向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提供了咨询,召开了全市文物安全工作现场会。

5月8日 钟鼓楼钟楼抢险加固工程开工。

5月11日 绒线胡同四合院(四川饭店)修缮工程开工。

5月12日 东岳庙修缮工程竣工。

5月18日 第21届世界博物馆日纪念活动在宣武区北京戏曲博物馆东门外广

场举行。今年的活动主题为“与文物的非法贩运和交易行为作斗争”，共有近 30 个博物馆参加了宣传活动。

5月14日~21日 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对中国古植物馆、昌平李冰凤山现代美术馆、王维田轩池酒文化馆、门头沟丝绸之路美术馆进行了考察。

5月23日 市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刘敬民副市长在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舒小峰副局长陪同下到智化寺、国子监、首博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5月26日 市文物局在丰台饭店召开文物安全工作现场会。会议表彰破获我市建国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倒卖案件的公安干警和举报人员。刘敬民副市长与各区县主管文物工作副区长签订了《文物安全责任书》。

5月26日~6月2日 市文物局组织局属单位保管部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参观考察库房管理及藏品计算机管理软件系统。

5月~6月 市文物局完成了对 37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巡视检查任务。

6月2日 俄罗斯政府代表团莫斯科市文物局两位专家在俄罗斯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礼哈洛夫先生和参赞夫人的陪同下，与市文物局主要领导进行了座谈，双方就北京与莫斯科两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交换了意见，并对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6月3日 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一行四人，参观商周遗址博物馆，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并对现在还在进行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感兴趣，通过参观，使俄罗斯客人对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6月5日 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孔繁峙副局长到中国剧院参加刘敬民副市长召开的解决万寿寺东路火险隐患问题的现场会。

6月22日 市文物局与市旅游局召开联席会议，就博物馆如何与旅游业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6月29日 在长河工程的施工中，在位于紫竹院西北门附近的河道南岸，发现了一座清代御用码头遗址。经市文物局现场调研后，决定原址保护。

故宫筒子楼改造工程宇墙项目开工。

6月 市编办批准市文物局保卫处加挂安全督查处牌子。

市文物局对颐和园邮局在颐和园附属建筑——储秀宫内擅自进行装修工程的事件进行了处罚。

7月20日 市文物局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示，完成北京市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名单调研及标志碑选址工作，并上报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分。

(作者王辅宇为市文物局办公室干部)

市文物局属博物馆
'98 二季度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位简称	总人数	成人人数	学生人数	外宾人数	其中免费人数
艺博	31063	27477	3586		27734
辽金馆	1066	746	50	270	870
古建馆	4310	750	2940	620	2800
正阳门	65946	63846	2000	100	2000
首博	75000	25000	30000	20000	30000
大觉寺	21501	18751	2659	91	871
大钟寺	23295	13092	8320	1883	471
石刻馆	5322	4032	808	482	
徐馆	18000	9000	5700	3300	3000
德胜门	16609	15105	1504		1881
西周馆	2794	2356	353	85	
大葆台	3214	2896	308	10	318
智化寺	433	377	36	20	
团城	3411	2166	1147	98	2094
总计	271964	185594	59411	26959	72039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1998 年第 3 辑/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

ISBN 7-5402-1124-5

I. 北… II. 张… III. 历史文物-北京-期刊 IV. 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440 号

北京文博(1998 *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 782 信箱

煤炭印刷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00 元

中埃友谊地久天长

——中国援建埃及工程开罗世界公园“中国园”落成记



○ 利用土办法安装、测量石亭



○ 落成后的“中国园”一角

但能够在这个遍布古埃及灿烂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展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风韵，是我们每一位成员、特别是我们每一位文物工作者的骄傲和自豪。

1998年5月19日，以市人大常委会、市外办、市文物局、市园林局等领导同志组成的北京市代表团，应埃及开罗省政府的邀请，赴开罗出席了盛大的“中国园”落成典礼仪式，中外来宾在参观“中国园”后，对中国园林独特的园艺风格和一流的施工水平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通过“中国园”的建设，使中埃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为北京文物外事工作打开国门、迈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中埃两领导为“中国园”剪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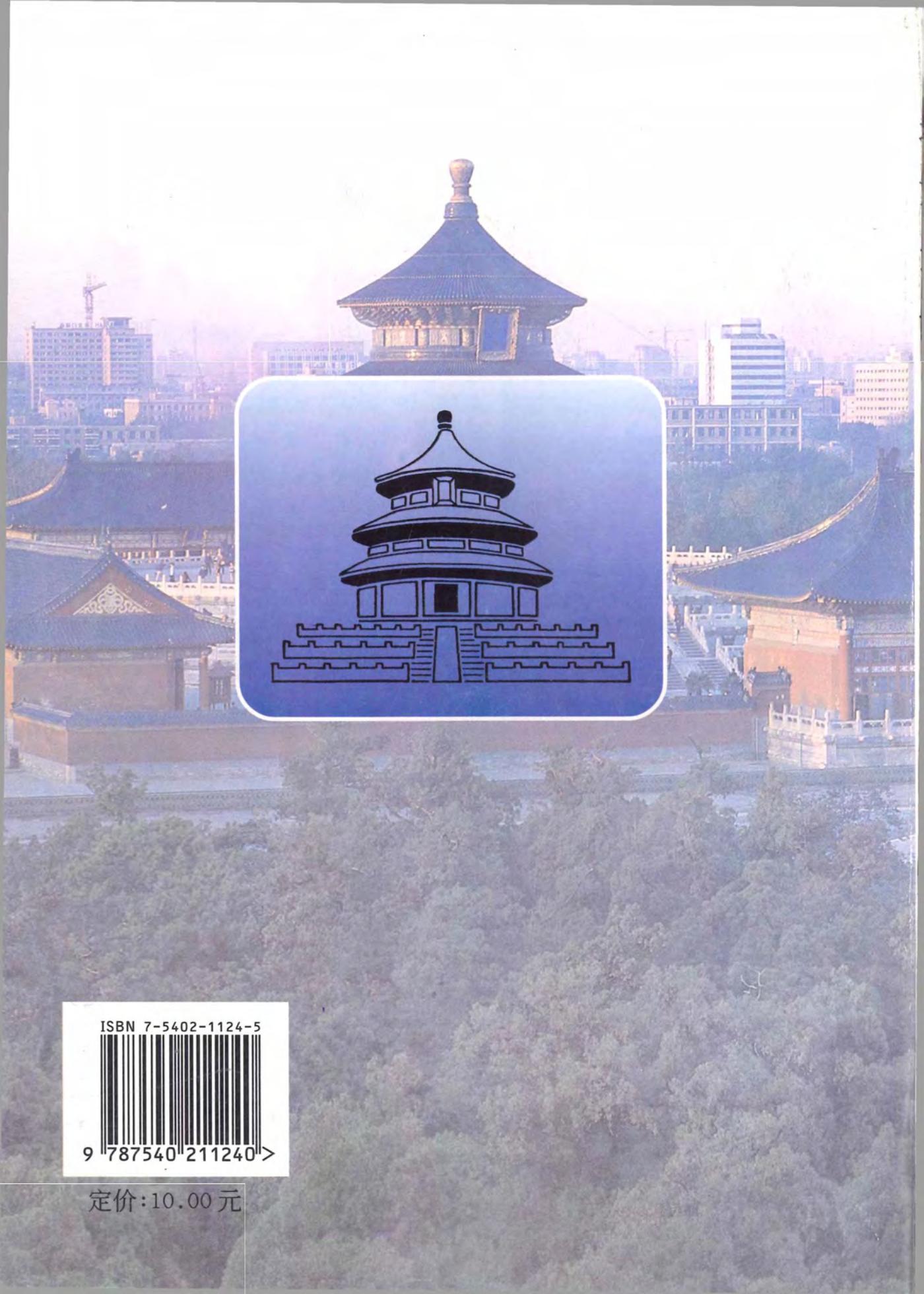
○ “中国园”纪念碑

为加深中国与埃及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推动北京与开罗两个友好城市间的发展，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市文物局、市园林局联合为开罗世界公园建造一“中国园”。于1998年3月28日，开罗世界公园“中国园”的建设者一行九人，踏上了埃及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在开罗市纳塞尔城的世界公园中修建的“中国园”，标志性建筑为一座石质重檐六角亭，亭前铺设小广场和园中甬路，周围栽种树木花草。

由于施工时间紧、任务重，全体团员在到达埃及后的第二天，克服了由于时差带来的身体不适及高温酷暑等困难，积极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中。在施工过程中，园林局派出的同志主要是设计人员及花木工程师，文物局派出的是古建工程人员，工作中大家不分你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彼此积极配合，奋战了二十六个日日夜夜，“中国园”建成了。

“中国园”的独特魅力，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的赞誉。开罗省卫生与城市美化总局管委会主席、公园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各迪·巴斯尤尼少将，代表埃及开罗省政府为每一位中国团员颁发了用独特的埃及古老的纸莎草纸制作的感谢信。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白色青白石质的重檐六角亭将永远地伫立在开罗世界公园中。虽然“中国园”的面积很小，



ISBN 7-5402-1124-5



9 787540 211240 >

定价:10.00 元

1966年 10月 10日